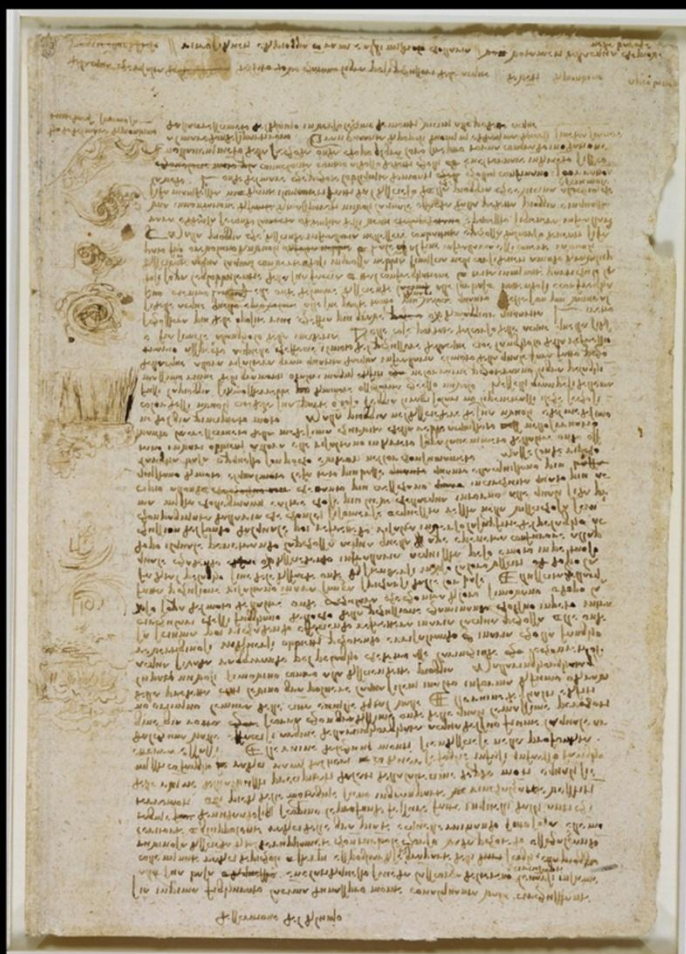


遗嘱是伪造的



罗伯特·卡萨诺瓦斯

小说



简介

皮埃尔·贝尔捷教授在法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空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曾获得过用以将其作品遗赠他人所必需的“归化证书”。1519年他去世时，由于缺少这份文件，适用于外国人的“绝产没收权”迫使王室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著名画作《蒙娜丽莎》。本书基于经过细致重构的真实史实，讲述了梅尔齐与萨莱——这位艺术家的两位弟子——在王室清点财产之前盗走重要作品，随后伪造遗嘱以证明其合法占有的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故事讲述了这场骗局如何延续了五个世纪。这部小说游走于历史惊悚与科学考证之间，叩问犯罪与英雄之间的界限：梅尔齐与萨莱究竟是窃贼，还是拯救了无价文化遗产的英雄？

作者

罗贝尔·卡萨诺瓦是荣誉高级教师（agrégé）暨法国文人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会员。作为一名对艺术收藏史充满热情的法学家，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侵占问题。他现任非政府组织“国际归还”（International Restitutions）主席，并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遗嘱是伪造的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送存：2025年11月——电子版与纸质版

© 2025 卡萨诺瓦斯。版权所有

ISBN : 978-2-488999-58-8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仿真复制件，意大利艺术协会，2020年

中文版

根据修订校订本译出



同一作者作品：

《被窃的房间》

说明

本小说是一部基于真实研究的历史虚构作品。文中提及的大部分文献确实存在，所指出的种种矛盾属实，而归化信函的缺失也确有其事。但书中的场景、对话以及人物的动机均属虚构。达·芬奇的遗嘱至今仍是一份存在争议的文献。从未发现过任何法文原件。归化信函未见于任何王室登记册。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确实曾适用于外国人。

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是否真的窃取了这些作品？他是否伪造了一份假遗嘱？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完全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作品得以留存至今。而这也许就是最重要的事。这部小说的原版以法文写成，已被译成多种外语。译本中可能存在语言上的错误、误解或不够精确之处。

读者若欲作更深入的探究，可参阅作者发表于「莱布尼茨社会科学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 für Sozial Wissenschaften*）的学术论文。

<https://www.ssoar.info/ssoar/handle/document/94357>

目录

序幕

第一章：克洛·吕斯庄园的主人

第二章：国王的密探

第三章：欺瞒的岁月

第四章：谎言的构架

尾声

遗嘱是伪造的

序幕

巴黎，法国国家档案馆，2023年10月

皮埃尔·贝尔蒂耶盯着这句话已经看了十分钟。

「因他持有最基督教国王陛下的诏书，准其立遗嘱……」

一个细节。仅仅是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一五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往来书信中的一个细节。三年的研究，把他引向了这行令人困惑的文字。此刻，当他第一百次重读它时，它仍旧不停地嘲弄着他。

“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诏书，”他喃喃自语。

“什么？”

安托万·马尚刚走进原始文献阅览大厅，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这位法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贝尔蒂耶的研究工作。他们之间结下了一种知性上的默契，其间不乏热烈的交流，也有着雷打不动的午餐之约。

贝尔蒂耶从摊在面前的复印件上抬起眼来。

“就是那些据说弗朗索瓦一世颁给达·芬奇的著名归化信函。我刚刚翻遍了《敕令目录》全部九卷。一五一五年到一五四七年间颁发的所有敕令。您知道我找到了什么吗？”

马尚放下咖啡，坐了下来。

“什么都没有？”

“绝对什么都没有。王室登记册里没有达·芬奇的一丝踪迹。”

马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却迟迟不敢说出口。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达·芬奇从来不可能合法地遗留他的作品。没有归化，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便适用：他一死，一切都归国王所有。”

贝尔蒂耶把卢浮宫官网打印出来的说明推到他面前。

“看看博物馆是怎么说的：一五一八年，蒙娜丽莎由其弟子萨莱「赠予君主」。在大师去世的前一年。您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一个学生，把一幅还不属于自己的画送给国王？”

“正是如此。官方的说法是，达·芬奇提前安排好了身后事。但没有归化信函，这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

马尚喝了一口咖啡，目光紧盯着那些文件。

“皮埃尔，您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贝尔蒂耶靠回椅背，斟酌着字句。

“我想告诉您的是，达·芬奇的遗嘱——他作品传承的整个历史所依据的那份遗嘱——只存在意大利文版本。法文原件呢？从未寻获。昂布瓦兹的公证人呢？他们一直拒绝出示自己的档案。”

他顿了一下。

“我还要补充一点：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也许伪造了一份假遗嘱，以侵占那些依法本应归属王室的作品。”

墙上的钟摆滴答作响，回荡在这间寂静的大厅里。马尚看着对面的这个人，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他。

“您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确实进入了王室收藏。可完全不是人们讲述的那样。不是通过购买，也不是通过赠予。而是通过没收，依据一项无人愿意正视的、饱受争议且不合法的封建权利。这在今天造成了严重的法律问题。不仅涉及蒙娜丽莎，也涉及陈列在我们博物馆中许多其他这位画家的作品。”

马尚走向那扇俯瞰苏比斯府邸内院的窗子。窗外，行人们悠然往来，浑然不知这些档案守护了五个世纪的秘密。

贝尔蒂耶缓缓收拾起他的文件。

“我接下来要讲给您听的，不会出现在任何教科书里，任何官方说明里。这是我们最著名的杰作背后的秘史。一段贪婪、伪造与欺骗的历史。一段事实与传说交织、文献有时也雄辩地撒谎的历史。”

他抬起眼，望向这位馆长。

“您准备好去了解蒙娜丽莎的真实故事了吗？”

第一章：克洛·吕斯庄园的主人

克洛·吕斯庄园，邻近昂布瓦兹

在他去世前两年半，达·芬奇第一次跨进了克洛·吕斯庄园的门槛。六十四岁的他，已被在意大利各地漂泊的岁月所耗尽——三十年来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宫廷，从米兰到罗马，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寻觅能理解他多变才华的赞助人。他始终碰到同样的阻碍：嫉妒、王公们的不解、委托人的不耐烦。

从里昂而来的这段旅程令人疲惫不堪。乘轿越过阿尔卑斯山，尽管有软垫与毛毯，也还是让他关节的旧疾重新发作。可如今，当他凝望着这座掩映在都兰葱郁之中、由粉砖与白色石灰华砌成的庄园时，一种奇异的宁静却悄然袭上心头。也许，他终于要在此地寻得安宁。

这位因马里尼亚诺一役而声名大振的法兰西年轻国王，终于给了他在意大利从未得到过的东西：彻底的自由。没有紧迫的委托，没有束缚人的义务。只有「*国王首席画师、工程师暨建筑师*」的荣衔，每年一千枚金埃居的丰厚年金，以及这座距王城不过几百步之遥的庄园。

“大师，”他的首席弟子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一边扶他下轿一边说道，“这就是您的新居所了。难道不壮观吗？”

达·芬奇打量着这座将成为他最后归宿的建筑。它由路易十一的司库财务官艾蒂安·勒卢在半个世纪前建成，两层的建筑铺展开来，风格上和谐地融合了行将式微的哥特式建筑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初影响。石制十字椽的高窗依稀可见内部宽敞明亮的房间。一座八角形的塔楼耸立在一侧，顶部覆着一座胡椒罐状的石板瓦屋顶。四周，精心打理的花园以阶梯状层层向阿马斯河畔延伸而下。

“它很美，”老人承认道。“可它也离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太遥远了。”

他想起了佛罗伦萨，他出生的城市，他曾在安德烈亚·德尔·委罗基奥的作坊里学艺。想起了米兰，他曾在那里为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效力十七年，设计战争机械，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食堂里绘制《最后的晚餐》，暗中在停尸间研究解剖学。想起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对他的接待远不如他所期望的那般热情，更青睐年轻而热情洋溢的拉斐尔。想起了威尼斯，想起了曼图亚，又一次想起佛罗伦萨——他始终在寻觅一个不断从他身边溜走的安宁港湾。

第二个弟子，绰号「萨莱」，本名吉安·贾科莫·卡普罗蒂。他正监督着卸下装有创作与手稿的箱子，用他惯常的随意口吻插话道：

“至少在这里，师父，不会有人来责怪您干得不够快。弗朗索瓦国王让您随心所欲地创作，不受拘束。”

达·芬奇点了点头。法兰西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但他也隐隐感觉到，这同样是一段尾声。自从一年前那次发作以来，他的右手已部分瘫痪，他知道自己作为画家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也许他还能画些草图，还能思考，还能写作。但那些宏大的画作，那些恢弘的壁画，都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用于安顿。达·芬奇选择了二楼那间朝北的大厅作为画室，好让光线终日恒定明亮。他的两位同伴布置着这个空间：画架靠窗放置，工作台居中，笔记本柜沿墙排开。

他带来了自己最珍视的创作：当然有《蒙娜丽莎》——尽管有过诱人的出价，他却始终不愿出售；还有他打磨了十五年、尚未完成的《圣安妮》；目光令人不安的

《施洗者圣约翰》；以及那幅感官魅力令卫道之士震怒的《丽达与天鹅》。尤其还有几十本记满了他研究成果的笔记本：基于秘密解剖得出的研究、飞行器的图纸、关于流体流动的论述、关于透视与光影效果的思考。

拆封这些珍宝花了好几天。每一只箱子都小心翼翼地打开，每一幅画都恭敬地展开。弗朗切斯科和萨莱早已习惯了这种搬运工作，但他们始终以极度的谨慎行事。一次碰撞，一道划痕，都可能毁掉数年的心血。

《蒙娜丽莎》被安置在主窗旁的一个画架上，那里清晨斜射的阳光将会显露出晕涂法的每一个细节。达·芬奇花了许多时辰凝视着它，思忖着自己是否还该修饰，抑或终于可以视其为完成之作。十五年了，他一直在打磨这幅肖像，十五年了，他不断回到画前，这里添上一层难以察觉的透明釉彩，那里改动一处阴影。丽萨·格拉迪尼，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早已辞世多年。可她的容颜依旧萦绕在这位画家心头。

手稿被有条不紊地归置进柜子里。梅尔齐已经建立了一套分类体系：解剖学研究放在第一只柜子，关于水与水道的研究放在第二只，关于飞行与机械的观察放在第三只，关于绘画与透视的思考放在第四只。每一卷都贴了标签，能标注日期的都标注了日期，还附有简短的说明。

正是这份知识的宝藏，使达·芬奇远远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画家。他是一个全才，一个囊括各种知识形式的心灵。他偷偷进行的解剖工作，向他揭示了索邦大学的医生们所不知道的秘密。他对鸟类飞行的观察，令他构思出一些飞行器械，也许有朝一日，能让人类飞升于空中。

可他死后，又有谁会关心这一切呢？谁会明白这些潦草涂写的图纸、这些镜像笔迹、这些复杂图表的重要性呢？达·芬奇感到肩上压着传承这份学识的责任。但传给谁呢？弗朗切斯科聪明而忠诚，却缺乏必要的科学视野。萨莱手巧，却不擅理论。这两个弟子，是否有能力守护这份遗产？

尽管长期疲惫不堪，达·芬奇仍旧起得很早。他喜欢从卧室的窗口眺望黎明，看着晨光如何一点点改变着眼前的景色，先是显出树木的暗色团块，接着是叶片的细节，最后才是色彩。

用过简朴的早餐——面包、水果、少许乳酪，从不吃肉，因为他早已多年奉行素食——之后，他便下楼到画室去。上午专用于创作性工作：修饰画作，在笔记本上绘图，思考他的各种论著。接着是午餐，随后是他这个年纪必不可少的午睡。下午则留给花园中的散步，或是与两位门生的谈话。晚上，他借着烛光阅读，翻阅他随身带来的书籍：老普林尼、维特鲁威、阿尔贝蒂，还有他做了批注的圣经。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住在与师父相邻的房间里。萨莱在花园里另有一间小屋，他把它布置成了自己的私人工作室。他们的职责是多方面的：既是画室里的助手，又是往来书信的书记，还是庄园日常事务的管家。国王为他们配备了几名仆人——一名厨娘、两名侍女、一名马夫、一名园丁——但凡与达·芬奇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们仍宁愿亲自操持。

三人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达·芬奇待弗朗切斯科几乎带着一种父辈般的柔情。这位年轻的米兰贵族，父亲曾是公爵民兵队长，十六岁时便舍弃一切追随他而去：家族、财产、前途。十一年后，二十七岁的他，已远远超

越了一个单纯助手的角色。他是一位知己，一个朋友，一个精神上的儿子。

与萨莱的关系则不同。吉安·贾科莫十岁时被收留，原本是个偷窃成性、桀骜不驯的街头顽童。达·芬奇教育了他，塑造了他，把他变成了一位得心应手的艺术家。可两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由怜爱与恼怒交织而成的暧昧游戏。如今三十六岁的萨莱，依旧任性、不受管束、迷人。他有时会消失数日，回来时不作任何解释。达·芬奇对他的责备总是软弱无力，内心深处却总是原谅了他。

三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达·芬奇是那位睿智而有时心不在焉的家长。弗朗切斯科是那个有条不紊、忠心耿耿的管理者。萨莱则是那个为他们勤勉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丝轻盈气息的自由灵魂。

达·芬奇热衷于探索自己的新天地。尽管患有风湿，他仍喜欢步行。每天，他都在庄园的花园里走一走，然后再到周边去探访一番。

克洛·吕斯庄园经由一条地道与王城相连。这条凿于石灰华中的地道，令达·芬奇惊叹不已。他多次下到地道中，研究其建造技术，记录湿气如何从壁面渗出，思考着改善通风的办法。他做了笔记，画了图。也许他会向国王提出一些改进方案？

即便在这深秋时节，花园依然美不胜收。层层台地向种满果树、蔬菜与香草的河畔延伸而去。那位园丁，一个名叫雷米、寡言少语的男人，怀着满腔热爱悉心打理着这片园地。达·芬奇花费许多时辰观察自然的劳作：叶子如何从树上飘落，鸟儿如何筑巢，水如何在灌溉沟渠中流淌。

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有一天，他花了三个小时观察一只蜗牛沿墙攀爬，为其运动的机理所着迷。又有一天，他解剖了一只青蛙，研究其蹼足的结构，弄清了它们如何在水中推动动物前进。每一次观察都被记录在他的笔记本里，配以精确得令人惊叹的图画。

昂布瓦兹村庄，连同俯瞰卢瓦尔河的王城，构成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达·芬奇经常在弗朗切斯科的陪同下前往那里。他们穿过地道，从王城的花园中冒出来，然后在城中狭窄的街道上闲逛。这位托斯卡纳人喜欢看工匠们干活：铁匠锤打铁块，木匠拼接木板，面包师揉着面团。每一种行当都揭示出他的心智可以即刻剖析的机械原理。

卢瓦尔河本身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研究对象。达·芬奇在河岸边度过了许多时辰，凝视着水流，记录水位的变化，观察桥墩周围形成的漩涡。水一直令他心醉神迷，他本就是在亚诺河畔长大的。他在水中看到了一种普遍的原理，一种雕琢大地、滋养生命、净化肉体的原始力量。他对液体动力学的研究，是他最为成熟的成果之一。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王便前来探望他。弗朗索瓦一世当时二十二岁，正处于热情与野心相交融的年纪。他高大、体格健壮，狭长的面庞上蓄着一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棕色胡须，是这一代热爱人文、既钟情艺术与文学、也钟情战争与狩猎的君王中的代表。

一天早晨他来了，随行的是一小队人马：他的密友，海军上将博尼韦；他的首席内侍，圣波尔伯爵；当然还有他的秘书纪尧姆·古菲耶。他们取道地道，如同一群密谋者般，从克洛·吕斯庄园的花园中冒了出来。

达·芬奇身着他最华美的黑色天鹅绒长袍，在一楼的大客厅里等候他们。弗朗切斯科和萨莱退居一旁，随时准备端上美酒和点心。

“达·芬奇大师，”弗朗索瓦操着带浓重法语口音的意大利语说道，“能在我们的王国接待您，是莫大的荣幸。自我们幼年起，便对您的创作充满钦佩。我们的老师，克里斯托弗·德·隆格伊先生，曾给我们看过您的画作摹本，向我们讲述您的天才。”

弗朗索瓦确实敬慕达·芬奇。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国王。这是一笔投资。每年一千埃居，正是一支雇佣兵团的价钱。他能得到什么回报呢？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留在宫中的威望。守护意大利所摒弃之物的荣耀。但也——弗朗索瓦并不向他的谋臣们隐瞒这一点——寄望达·芬奇能为他设计战争机械、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新式武器。慷慨与算计可以并存。

达·芬奇恭敬地行礼，但国王以一个友好的手势制止了他。

“不，不，大师！该我们向您鞠躬才是！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甚或所有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不过是个还有许多要学的年轻国王罢了。”

这份令人着迷的谦逊，或许多少有些算计的成分，却也是真诚的，打动了这位老人。他见识过太多傲慢的王公，太多居高临下的赞助人。而这一位，与众不同。

“陛下，您以驾临与言语令臣蓬荜生辉。可正是我该感谢您，在我自己的祖国将我拒之门外之际，将我接纳进您的王国。”

“意大利是一块由彼此嫉妒的小邦国拼凑而成的马赛克。法兰西则是一个统一在同一王冠下的王国。在这里，您的天才将得到应有的认可。”

弗朗索瓦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一个手势示意达·芬奇也照样做。他的随从们仍站着，但气氛已然放松了下来。

“大师，我希望您在这里感到自在。彻底自在。您没有任何创作的义务。随心所欲地生活、创作、思考吧。您的存在本身，便已是一份无可估量的礼物。”

“陛下，您实在太过慷慨了。”

“恰恰相反，还不够呢。您知道吗，自幼年起，我便梦想着让法兰西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新中心。罗马有它的米开朗基罗。佛罗伦萨有它的美第奇家族。威尼斯有它的画家们。而法兰西，将拥有达·芬奇。”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畅谈艺术、科学、建筑。弗朗索瓦想要改造自己的王国，建造能与意大利宫殿一较高下的城堡，招揽最杰出的艺术家……

“我有一个会令您振奋的计划，”他一边在桌上展开图纸一边宣布道。“我们想在离这里几里格之外的尚博尔建一座新城堡。这座建筑将融合意大利的创新与我们法兰西的传统。我们想到了一座双旋楼梯，两人能同时上下而永不相遇。您觉得如何？”

达·芬奇仔细端详着图纸。这个构想很巧妙，但其技术设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陛下，这个构思很有独创性。但结构必须以极高的精度来计算，才能在维持曲线流畅的同时承受住石料的重量。请容我研究一番，再向您提出解决方案。”

“尽管花上您所需要的一切时间。美不是命令出来的，美是等待出来的。”

国王终于离开时，达·芬奇感到一种奇异的振奋。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遇到一位真正理解他所做之事的王公，

一位真心对他的想法感兴趣、并不将他视为一个有用的工匠、而是尊他为一位富有远见的思想者的王公。

冬天降临都兰，带来一片寒霜与晨雾。克洛·吕斯庄园以其宽大的壁炉与厚重的挂毯，为抵御寒冷提供了一处舒适的庇护所。一向饱受米兰冬天之苦的达·芬奇，很欣赏这里较为温和的气候。

弗朗切斯科负责打理他们安顿生活的各种实际事务。有人窃窃私语说，一种特殊的情谊将这两个男人联系在一起，但弗朗切斯科总是耸耸肩，把这些闲言碎语一挥而去。

“我的孩子啊，”达·芬奇常常这样说，“你为我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你本可以像你父亲那样做个队长，娶个富家女继承人，在米兰过上舒适的生活。可你却终日为我整理笔记本，调配颜料。”

“我在您身边学到的东西，胜过我做十辈子米兰廷臣所能学到的，”弗朗切斯科总是这样回答。“是您教会了我用崭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去质疑既定的成见，去在科学中寻找美，在美中寻找科学。我又怎么可能后悔这个选择呢？”

画室看上去像一个阿里巴巴的宝库。墙上钉着几十幅图画：头部研究、衣褶、风景、机械、解剖图。桌上摆着科学仪器：圆规、直尺、角尺、星盘。柜子里则塞满了几百张散页，上面布满了那种特有的镜像笔迹，从右往左书写，仿佛在逆着时间的流向而行。

达·芬奇同时进行着好几个项目。他不知疲倦地修饰着《蒙娜丽莎》，添上一层层难以察觉的透明釉彩，以完善那种令肌肤质感如此逼真动人的晕涂效果。

但他的右臂开始背叛他了。医生们谈到一种「中风」，一种令他右半身部分瘫痪的发作。他还能作画，但细腻的动作对他来说需要付出极大的力气。油画，连同其中细致入微的细节，变得让人筋疲力尽。

“我老了，”他有时会喃喃自语。“我的身体不再听从我心智的指挥了。感觉自己被囚禁在自己的血肉之躯里，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弗朗切斯科试图宽慰他：

“师父，以您的年纪，您依然强健得惊人。您的思想依旧那样富有创见，您对这世界的目光依旧那样敏锐。您的手微微颤抖，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什么要紧？弗朗切斯科，我是个画家。我的手就是我的工具。倘若它背叛了我，我又算什么？”

“您远远不止是一个画家。您是一位思想者，一位科学家，一位工程师。您的心智抵得上一千双手。”

这样的对话时常发生，表明达·芬奇清醒地衡量着自己体力衰退的程度。但他拒绝承认自己已被打败。每一天，他都坐在《蒙娜丽莎》前，试图完善一处阴影，调整一处光泽。结果常常令人失望——他的右手已不再听使唤——但他仍以固执的毅力坚持着。

弗朗索瓦一世信守了他的诺言：他常常前来探望达·芬奇。有时带着他的宫廷——他的王后法兰西的克洛德、他的姐姐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他的谋臣与廷臣。有时则独自一人，或几乎独自一人，只带着他的好友博尼韦，作一番私密的交谈。

这些王室来访都是大事。仆人们忙碌起来。弗朗切斯科留意让画室看上去体面，把散乱的纸张收拾好，为家具掸去尘埃。萨莱颇有布置场面的天赋，会把几幅最美的画作陈列显眼处。

但达·芬奇厌恶这种忙乱。他更喜欢那些不事声张的来访，那时国王会毫无仪式地从地道走来，坐在扶手椅上，像朋友而非君主一样开始交谈。

二月的某一天，弗朗索瓦就这样悄然而至，发现达·芬奇独自一人待在画室里，凝视着《蒙娜丽莎》。

“这位夫人还是让您魂牵梦萦吗？”

“陛下，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们二人中的哪一个更让另一个魂牵梦萦……十五年了，我一直在琢磨这幅肖像。十五年了，我不停地追寻着完美。而我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它。”

“完美主义到了荒谬的地步，”国王一边走近画作一边喃喃道。“但也许正是这一点，成就了您的天才。这种对绝对之境近乎不可能的追寻。”

“或许这是我的诅咒。您知道我留下了多少未完成的画作吗？我辜负了多少委托？人们责怪我拖沓，责怪我犹豫不决。人们说我更愿意思考，而不愿动手。”

“人们也说，您完成的每一幅作品，都抵得上另一位大师的十件创作。”

弗朗索瓦站到《蒙娜丽莎》面前，默默端详着它。

“您是如何做到，赋予这位夫人如此强烈的存在感的？看上去她仿佛随时会走出画框，与我们说话。”

达·芬奇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陛下，我花了无尽的时间反复描绘这幅肖像。我研究了人体皮肤上的光影游戏，暗部是如何渐渐融入亮部的。这就是所谓的晕涂法，一种消融轮廓、以营造出生命感的艺术。”

“晕涂法，”弗朗索瓦重复道，“津津有味地品味着这个意大利语词。”

「烟熏过的」，某种意义上如此。仿佛您是隔着一层薄雾在作画。

“正是如此。自然不识轮廓线。一切都是过渡，都是从一种形态或色彩向另一种的转变。画出分明轮廓的画家，是在背叛自然。应当去暗示，而非去断言。”

国王在倾听。他本希望达·芬奇再创作出别的杰作，但他也明白，如今的他已太过疲惫，被部分瘫痪削弱得太多。

“不要为我们而耗竭自己去创作，”他带着一种少见的温柔补充道。“您在这里的存在，本身便已是一份无价的礼物。与我们交谈，为我们出谋划策，与我们分享您的智慧。这才是我们对您所期待的。”

这份体恤令达·芬奇深受感动。有多少赞助人曾对他表现出如此的理解？有多少人接受过一位日渐衰老的艺术家不再那么高产这一事实？

“陛下，您是位难得的君王。我曾侍奉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切萨雷·波吉亚、教皇利奥十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如此以尊重与自由待我。我将永远感念于您。”

“该心怀感激的是我们才对。已经有其他意大利艺术家，为您的先例所吸引，正陆续加入我们。不久，我们也将拥有自己的佛罗伦萨，自己的罗马。”

但在这一政治抱负的背后，弗朗切斯科察觉到了某种更为真切的东西：年轻国王与老迈大师之间一份真挚的友谊。一份跨越了世代与身份等级、建立在相互敬慕之上的、不太可能存在的友谊。

一五一七年春，弗朗索瓦一世将尚博尔工地的艺术监督之责交托给了达·芬奇。这座城堡的奠基石将于九月安放，理应体现出法兰西君主制的伟大及其对意大利影响的开放态度。

达·芬奇以一个三十岁人的活力投入到这个项目中。他的右臂虽已衰弱，心智却依旧敏锐。他绘制图纸，构想创新，为建筑上的种种难题提出技术解决方案。

那座双旋楼梯，这未来城堡的瑰宝，令他挂怀不已。要如何建造一座结构，能让两个人上下而永不相遇？其几何原理很简单：两条相互缠绕的螺旋线。但要用巨石实现它，却带来了令人生畏的静力学难题。

达·芬奇花了数周计算荷载，绘制拱顶，构思中央核心。他写满了整整几本笔记本的图表、批注、计算。弗朗切斯科在一旁协助，将潦草的草图誊清，核对计算，整理文件以便呈给国王。

“师父，这座楼梯是一件巧夺天工的杰作，可您确定它能被建造出来吗？”弗朗切斯科有时会忧心忡忡地问道，“唯恐看着师父在一个也许根本无法实现的项目上耗尽自己。”

“凡能被思考的，皆能被建造出来，”达·芬奇信心十足地答道。“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怎么做」。而我，将向他们展示怎么做。”

尚博尔并非唯一的项目。弗朗索瓦一世对他的王国还怀有其他抱负。他想要现代化边境城市的防御工事，开凿运河以便利商贸，在他的各处城堡中营造意大利式花园，发展王家炮兵。

在所有这些议题上，他都要请教达·芬奇。而这位老人也慷慨作答，分享着他四十年的思索与实验所积累下来的浩瀚学识。

关于防御工事，他提出了星形棱堡的构想，比起旧式的中世纪城墙，它能更好地抵御炮弹的轰击。他绘制了精细的图纸，展示经过精确计算的角度将如何令炮弹发生偏折，而非正面承受其冲击。

关于运河，他建议了一条连接卢瓦尔河与索恩河的路线，让货物无需取道危险的道路即可穿越法兰西。他设计了一套船闸系统，既能节约用水，又能加快船只的通行。

关于花园，他构想了壮观的喷泉水景、人造洞窟、以及能令来访者惊叹的自动机械。他曾在意大利见过埃斯特庄园的花园，深受启发，他想创造出比那更加雄心勃勃的东西。

他的两位弟子尽己所能地协助他。弗朗切斯科凭着他的工程学功底，能理解那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萨莱则凭他一双巧手，制作出模型，让达·芬奇那些抽象的构想活了起来。

克洛·吕斯庄园的画室成了一个观念的实验室，人们在这里试验、检验、改进。桌上堆满了机械的缩小模型。图纸铺满了墙壁。论著在架子上堆叠成摞。这是一种井然有序的混乱，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杂乱，见证着这里所弥漫的旺盛创造力。

一五一七年春，达·芬奇的健康开始每况愈下。风湿病日益加重，令行动变得痛苦。他右侧的瘫痪逐渐蔓延，扩展到前臂。有些日子里，他甚至连一支笔也握不住了。

医生们从王城赶来。他们为病人做检查，问一些问题，触摸那些麻木的肢体。他们的诊断毫无转圜的余地：大师遭受了一次脑部发作，损伤了控制身体右侧的神经中枢。瘫痪是不可逆的，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我还剩多少时间？”达·芬奇以一种令医生们感到意外的清醒问道。

“这在天主手中，”布尔让西斯医生谨慎地答道，“他是国王的私人医生。您或许还能活上好几年，或者……”
“或者明天就死。我明白了。多谢你的坦诚。”

医生们离开后，达·芬奇沉默不语，凝视着搭在扶手椅扶手上、一动不动的右手。这只曾绘出《最后的晚餐》、雕出大理石天使、解剖过数十具尸体、描画过成千上万幅图画的手。这只不再听命于他的手。

“师父，”弗朗切斯科喉头哽咽，喃喃道，“别失去希望。也许……”

“弗朗切斯科，我的朋友，希望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美德。可现实主义有时更为有用。我的身体正在离我而去。这是事实。我必须接受它，并适应它。”

“如何适应呢？”

“把精力集中在我还能做的事情上。我不能再作画了，好吧。可我依然能思考，能用左手写字，能口述我的想法。我依然能够传授。”

这份斯多葛式的坦然接受，令两位同伴印象深刻。

达·芬奇不是一个喜欢哀叹的人。他以对待一切事物时同样的科学好奇心去正视逆境：分析症状，理解机理，寻求解决之道。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画室随之调整。弗朗切斯科成了达·芬奇的双手。当师父想要修饰一幅画时，他口述指示，弗朗切斯科则在不断的评点指引下执行。这对两人来说都令人沮丧，但他们别无选择。

萨莱这边，则承担起了达·芬奇再也无法独自应付的所有日常事务：为他穿衣、为他刮脸、为他切食物。这个「小魔鬼」在这些卑微的琐事中，展露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柔情，一种谁也不曾料到他会有的耐心。

一五一七年夏带来了一段消遣的插曲。弗朗索瓦一世为庆贺他儿子——王储的洗礼，组织了盛大的庆典。一连数周，昂布瓦兹成了比武、舞会、宴饮、演出的舞台。

国王请达·芬奇为其中一些娱乐节目做设计。尽管疲惫不堪，达·芬奇还是答应了。这是一个证明自己创造性的天才并未减弱、即便身体正在衰退的机会。

他设计了一头机械狮子，它向国王走去，随后打开胸膛，从中涌出百合花——法兰西君主制的象征。这台自动机械的制造，令弗朗切斯科和萨莱忙碌了数周，几位当地工匠也从旁相助。达·芬奇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指挥这一切，口授指示，纠正错误，完善机械装置。

展示的那天，整个昂布瓦兹屏息以待。这头体型巨大的狮子伴着机械的轰鸣声开始行走。它走向国王，在他面前停下，随后胸膛开启，露出一束美得摄人心魄的人造百合花。

在场众人报以掌声。弗朗索瓦一世大为感动，走向坐在一处台子上观看这一幕的达·芬奇。

“大师，您再一次令我们叹为观止。”

“陛下，这不过是一件玩具。但我很高兴它能令您喜欢。”

“它不仅仅是一件玩具。它是一个象征。这头狮子，是您所来自的佛罗伦萨的象征，开启身躯，露出法兰西的百合花。这正是我们联盟的化身，意大利与法兰西在艺术与美之中合而为一。”

达·芬奇原未想到这层象征意涵，但国王能从中读出如此深刻的意义，令他感到欣慰。

庆典持续了好几天。卢瓦尔河上举行了水上比武，还有水中芭蕾，烟花表演。达·芬奇因太过疲惫而无法全程参加，只满足于听弗朗切斯科和萨莱每晚归来时的转述。

但这段欢愉的时光更使他精疲力竭。构思机械狮子的心力消耗、展示时的神经紧张、周遭普遍的兴奋，都掏空了他的力气。八月，他不得不卧床两周，被一场顽固的高烧击倒。

秋天带来了雨水与初寒的回归。达·芬奇越来越多的时间卧床，或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度过。他的双腿已不能很好地支撑他了。楼梯成了一场折磨。

弗朗切斯科让人在画室里安置了一张床，好让达·芬奇不必再上上下下地爬楼。画室既成了卧室，又是书房，也是客厅。大师在这里接待来访者，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便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度过他的夜晚。

这几个月里，他陷入了深刻的自省。达·芬奇一向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种种计划与发现的人，如今却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反思自己的遗产，反思自己身后将留下什么。

他重读旧日的笔记本，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图纸，二三十年前写下的注记。有些方案至今仍以其大胆而令他惊叹。另一些则显得幼稚，不够成熟。但所有这些，都见证着一生对知识的追寻。

“弗朗切斯科，”一天晚上，当他们一起翻阅一本旧笔记本时，他说道，“你看看这一切，我想过的、构思过的、画过的一切。数以百计的机械，数以千计的观察，成卷成册的论著。可我却感觉自己仿佛不过是触及了知识的表层。”

“您用一生所成就的，是别人十辈子也未必能成就的。仅凭您在解剖学上的发现，就足以改变医学。”

“若它们能被公之于世的话。若它们不会因我这一手笔迹无人能读，而永远埋没在这些卷册之中的话。若它们不会在我死后散佚、遗失、被人遗忘的话。”

这份忧虑常常萦绕心头。达·芬奇忧心忡忡地衡量着自己毕生心血付诸东流的风险。有谁会在意这些潦草涂写的笔记本呢？有人会花时间去破译它们呢？

“我会确保您的心血得到保存，”弗朗切斯科郑重承诺道。“若有必要，我会用我的一生，去让世人认识您的天才。”

“你是个好孩子。比我所配得到的还要好。”

“问题在于，这些笔记本只有对那些能够读懂的人才有价值。对一个商人来说，那不过是旧纸上的一堆涂鸦罢了。若无人愿意购买它们，弗朗切斯科又怎能保存得住？”

萨莱这番粗率却也实在的话，触动了这位大师。弗朗切斯科说得没错。他死后，谁会想要这些笔记本？谁会出钱购买？谁会去研究它们？

“那便得将它们赠予一些机构，也许是巴黎大学，或是一些能理解其价值的博学显贵。”

“大学只关心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教父们。您的种种观察，您的飞行器，这一切在他们眼里都会显得可疑，甚至可能被视为异端。”

达·芬奇不得不承认弟子说得有理。他所积累的知识，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也许要等上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才会有人理解他这些发现的价值。

“那么，至少保存好那些画作吧，”他疲惫地叹息道。
“画作，人人都能欣赏。《蒙娜丽莎》、《圣安妮》、
《施洗者圣约翰》。正是它们，将让我得以存续下去。”

冬天十分严酷。大师越来越多的时间卧床，或裹着羊毛毯子待在壁炉旁。医生们来来去去，开着放血、草药煎剂、膏药之类的处方。可什么都不见真正的效果。

尽管天气恶劣，弗朗索瓦一世仍继续前来探望他。

一五一八年春，达·芬奇的病情恶化了。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轮流守在他的床边，为他擦拭发烫的额头，喂他喝水，日夜守候。焦虑攫住了他们。他们是否将失去他们的师父？那个多年来既是父亲、又是朋友、又是导师的人？

“他要死了，”一天晚上弗朗切斯科噙着泪水对萨莱低声说。“他要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却什么也做不了。”

“别这样说，”萨莱反驳道。“师父很坚强。他熬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他还会活下去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达·芬奇竟康复了。一五一八年五月，高烧退去。他能起身，能走几步，也重新有了几分食欲。医生们称之为奇迹，两位同伴则感谢天意的眷顾。

“我看见了死亡，”达·芬奇在克洛·吕斯庄园的花园里散步时向弗朗切斯科吐露道。“它就在那里，近在咫尺。我感觉到它冰冷的气息拂过我的后颈。可有什么东西将我留住了。我还有事要做，有东西要传授。”

“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可等时机到来时，我会知道的。”

尽管为病痛所削弱，达·芬奇还是重拾了他的种种活动。

一五一八年的夏天过去了，秋天随之而来。他已恢复了部分体力，重新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执着投入到工作中，仿佛想要在他所感到日益逼近的大限之前，尽可能多地完成心愿。

他绘制着一座理想之城的图纸，设想多层街道以将行人与马车分隔开来。他研究着水的湍流，画满了整本整本的笔记本，记录着漩涡与涡流。

秋天也带来了对他各项创作前途日益加深的忧虑。达·芬奇观察着他的两位门生，暗自思忖他们是否有能力守护他的遗产。

弗朗切斯科聪明、忠诚、有条理。可他是否有必要的威望，向一个无法理解这些笔记本的世界证明其价值？他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把这些画作留存下来，而非将它们贱卖给随便什么商人？

萨莱手巧、机灵，但也古怪，有时不太讲究原则。

达·芬奇不止一次撞见他说谎，占用不属于他的东西。这样一份珍贵的遗产，能放心交由他管理吗？

这些疑虑折磨着他。十月的一次探访中，他向弗朗索瓦一世谈起了此事。

“陛下，我的两位同伴都是好孩子。但我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应对我死后将面临的种种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

“那些前来索讨莫须有债务的债权人。那些不择手段、企图欺骗他们的艺术品商人。两个在法兰西孤立无援的年轻意大利人，又如何抵挡得住这一切呢？”

弗朗索瓦把手搭在达·芬奇的肩上。

“我会照看他们的。这我向您承诺。您去世之后，我会确保他们不缺衣少食，也会确保您的创作受到应有的尊重。”

“多谢陛下。可当激发这份承诺的人不在人世之后，国王们往往很快就会将诺言抛诸脑后。”

“我不会忘记的。我以王者之言向您担保。”

达·芬奇想要相信这位国王。但内心深处，他明白，即便是御言，也会随时光流逝而消散。

一五一八至一五一九年的这个冬天是最后一个。达·芬奇能感觉到这一点，两位同伴也心知肚明，却仍不愿承认。

一五一九年一月，病痛又一次袭来。持续的咳嗽，呼吸困难，全身虚弱。这一次，医生们的看法悲观了。这具已然耗竭的身体不再对治疗有所反应。放血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草药煎剂也全然不见效果。

弗朗索瓦一世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他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轻声与他交谈。这些王室的探访令整个家宅上下都为之动容。法兰西的国王竟愿花费这么多时间陪伴一位垂死的老人，这本身便证明了他对他所怀的真挚情谊。

“陛下，”一天，在一个神志清醒的时刻，达·芬奇说道，“我要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昂布瓦兹的这些年，是平静的。”

“该道谢的是我，”弗朗索瓦动情地答道。“您的存在照亮了我们的宫廷。您教会了我们用崭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我本想为您做得更多。完成尚博尔，开凿那条运河，绘制我们曾谈起的那些壁画。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

“您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您向我们展示了何为天才。这是一份无价的礼物。”

二月与三月间，达·芬奇的病情时而缓解，时而反复。有些日子，他感觉好些，能够起身，坐进他的扶手椅，几乎能正常地交谈。另一些日子，他则一蹶不振，气息短促，说不出几个字来。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不再离开画室半步。他们睡在铺在师父床边的草垫上，随时准备在他略显不适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挺身而出。他们的忠心是彻底的。

三月与四月间，达·芬奇与他的门生们有过好几次将永远铭刻在他们记忆中的对话。

有一天，他把弗朗切斯科叫到身边，向他吐露道：

“待我离去后，你必须独自继续下去。这会很艰难。你会感到迷失，感到被弃。可你会找到自己的路。你身上有一种力量，是你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到的。”

又有一天，他召来的是萨莱：

“我的「小魔鬼」，你从十岁起就一直跟着我。我收留你的时候，你不过是个街头顽童。如今，你已是个成熟的人，一位得心应手的艺术家。可你也依旧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古怪的调皮鬼。”

萨莱含泪微笑。

“我从来不懂得如何正经起来。这不是我的天性。”

“我知道。也正因如此我才爱你。我悲伤时你给我带来欢乐，我过于持重时你给我带来轻松。别改变。保持你自己的样子。”

“我向您保证。”

还有一些更为实际的谈话。达·芬奇想确保他的两位同伴知道他重要文件的存放之处，知道如何处理他的债务，知道哪些创作具有价值。

“橡木箱子里，有几张佛罗伦萨银行家的债权凭证。我死后，你们可以兑现这些债权。这会给你们一点钱，让你们的在卖出几幅画之前维持生计。”

“我们什么也不会卖，”弗朗切斯科抗议道。“我们会将一切留存下来，以纪念您。”

“别傻了。你们需要钱来生活。该卖的就卖，但要卖得聪明。别把我的画贱卖给随便哪个商人。要等到遇上真正懂得其价值的行家。”

这些嘱咐，与关于人生、死亡、艺术、科学的更为深沉的思考交替出现。达·芬奇感到大限将近，想要把他六十七年浓烈人生所积累的智慧的精华传授下去。

“我的孩子们，”他反复说道，“我毕生都在寻求真理。在绘画中，在科学中，在对自然的观察中。你们知道我发现了吗？真理是无从捉住的。每当人以为握住了它，它便悄然溜走。人所能瞥见的，只是一些碎片，一些倒影。可这份追寻，即便是徒劳的，也赋予了人生以意义。”

克洛·吕斯庄园，邻近昂布瓦兹，一五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晨光透过克洛·吕斯庄园宽大的窗口洒了进来。在二楼那间大画室里，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凝视着正在打盹的师父。数日以来，他的病情已经加重。

但如今，大限将至，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些老人拖延了太久、始终不愿正视的可怕问题。

“师父，”弗朗切斯科走近扶手椅低声问道，“您今天早上感觉如何？”

达·芬奇微微睁开眼睑，仿佛从极远之处归来。他的双眼，尽管透着疲惫，仍保有那份曾令弗朗切斯科在初见之时深受震撼的敏锐。但年轻人也从中察觉到一种新的颓丧，一种令他心头一紧的听天由命。

“我感觉自己像一棵老树，根须开始与大地分离。每一次呼吸都需要巨大的努力，每一次心跳都仿佛是最后一次。”

他咳嗽起来，将他那只还能动的手按在胸口。

“别这么说。您已经熬过了那么多磨难！还记得您去年生的那场病吗，我们都以为您要离我们而去了，可是……”

“不错，达·芬奇打断了他。我熬过了切萨雷·波吉亚的阴谋，米开朗基罗的嫉妒，罗马廷臣的诽谤。可总有那么一刻，灵魂会明白，肉体已再不能承载它了。这一刻，已经到了。”

屋子的一角，萨莱正在一块大理石调色板上调色，他的动作精准，透着多年经验的痕迹。

“我的朋友，”达·芬奇有气无力地招呼道，“过来吧。我们三个人，得谈一谈。”

萨莱放下画笔，走到扶手椅旁，来到弗朗切斯科身边。他面容憔悴，是这几个夜里睡得不多的痕迹。整整一个星期以来，他们守在师父的床边，留意着任何好转的迹象，也惧怕着每一次病情的加重。

“我们从奥尔良请来的医生说，您的状况还能好转。他开了每日放血的处方，还有金鸡纳树皮的煎剂……”

“奥尔良的医生对我的病情，并不比我自己了解得更多。我解剖过足够多的人体，明白自己体内正在发生什么。我的心脏正在衰弱，我的肺在挣扎，我的头脑本身也开始与这个世界脱离。”

达·芬奇望着他的两位门生，带着多年来他一直对他们流露的那份父辈般的柔情。

“你们知道，临近死亡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不是肉体的痛苦，那可以用药物来缓解。甚至也不是对未知的恐惧，因为我一向对来世等待着我们的这一切满怀好奇。不，最痛苦的，是不得不离开自己所爱的人，让他们孤身面对人生的种种艰难。”

达·芬奇从未以如此动情的口吻对他说过话。

“我们已不再是孩子了。您把您的学识，您对艺术的热忱，都传授给了我们。我们会懂得如何珍视您的名声。”

“你没有意识到你们将要面对的困难有多大。有一些实情，我从未提起过，也许是出于疏忽。如今，是时候向你们揭示了。”

他集中起自己的力气，准备进行这场至关重要的谈话。

“扶我起来。我想最后一次欣赏我的创作，尤其是我的这位夫人。”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急忙上前搀扶他，将他扶到画架前——那幅肖像自他们抵达法兰西以来，从未离开过这间画室，此刻正由一层绣着金线的紫红色丝绸帷幔小心地掩护着。

“这位夫人，一直伴我走过了每一段路。走过我所有的漂泊，所有的放逐，所有的幻灭。我从未与她分离，从

未同意出售她，即便在我财力最为窘迫之时，即便有人愿以重金求购。”

他掀开帷幔，露出了《蒙娜丽莎》，神秘的美尽显无遗。透过窗子照进的晨光，以一种特有的柔和抚过那张画中的脸庞，显露出无限复杂的塑形。

“好好欣赏她吧。看看这个微笑，我在佛罗伦萨的第一段创作时期，花了四年时间才画出来，此后又花了整整十一年反复打磨。每一层透明釉彩，每一处阴影，都经过了反复的构思、反复的推敲、反复的修正。这个女子，已不再仅仅是丽莎·格拉迪尼，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一位我为几个佛罗林金币画像的佛罗伦萨市民女子。她已成为我关于女性之美、关于人类灵魂之奥秘、关于让绘画有生命的艺术，一切思索的化身。”

弗朗切斯科端详着这幅肖像。他记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蒙娜丽莎》的情景，那是在米兰的画室里，一五零八年。达·芬奇当时正在完善那种赋予肌肤以如此逼真质感的晕涂技法。他曾花上数小时观摩他作画，为他的技法所着迷，也为他的耐心所折服。

“这幅画是您绝对的杰作，”他断言道。“从未有人能以如此的强度描绘出生命。当人凝视她时，会有一种她将要开口说话，将要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的感觉。”

“生命……”达·芬奇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是的，正是这个，我一直在努力捕捉的。不是生命的外表，而是生命本身。你看这双手……”

他指着蒙娜丽莎那双叠放在一起、姿态优雅至极的手，其塑形之细腻，几近完美。

“为了找到这个姿势，我画了几十幅习作。这双手不仅仅是摆放在那里，它们表达着一种心境：一份微带忧郁的安宁，一份掩盖着内心紧张的平静。”

萨莱走近这幅肖像，一如既往地为此幅他亲眼见证其诞生、并在多年中不断演变的创作所倾倒。

“这件黑色丝绸长袍，这些飘拂在颈间的透明纱幔……您是如何做到让质料如此触手可及的？让人觉得几乎能摸到那块织物。”

“靠观察。不知疲倦地观察，怀着如抄经僧一般的耐心。你可知道，我曾花上数小时研究缎子上的反光，纱罗的褶皱，一张脸庞上的光影游戏？我画过数百幅预备习作，试过数十种颜料的混合。这幅肖像的每一处细节，都源自成千上万次的观察，成千上万次的尝试。”

达·芬奇欣赏着蒙娜丽莎身后延展开去的风景，那是一片虚构的景色，怪石嶙峋，河流蜿蜒，云雾缭绕、神秘莫测。

“而这片景色，世间并不存在。我是从对伦巴第阿尔卑斯山、托斯卡纳丘陵、蓬蒂内沼泽的记忆中汲取而成的。这是我内心世界的映照。那两条流淌于不同高度的河流，象征着时光的流逝，生命不可逆转的消逝。”

他更沉重地靠在两位同伴身上，疲惫感袭来。

“但技法与诗意谈得够多了。还有更为要紧的事情要谈，一些更为世俗，可惜也更为紧迫的现实。”

他们回到屋子中央，达·芬奇回到扶手椅上，长舒一口气。如今，仅仅走上几步，就已让这位老人筋疲力尽。

“你们知道，我死后将会发生什么吗？”

他们摇了摇头，在这段唤起那令人惧怕的大限的谈话面前，感到局促不安。

“我这就告诉你们，这堂法国法律课对你们会有用处，相信我。比我传授给你们的一切艺术教诲都更为有用。我，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治下的芬奇镇，是托斯卡纳

公爵的臣民，在法国的法律面前，我依旧是一个外国人。用这个王国的法学家们的话来说，是一个「异邦人」。而在法国，存在一条无情的法律，与卡佩王朝一样古老，人们称之为异邦人财产没收权。这条法律规定，一个外国人若未曾从国王手中获得归化信函便在王国的领土上去世，他名下的全部财产——毫无例外——将归属于王室。”

这番揭示之后随之而来的沉默，沉重而压抑。这个他从未设想过的前景，此刻突然以其骇人的全部真相呈现在他面前。

“您是说……说这一切……”梅尔齐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边指着屋子，“您所有的创作，您的笔记本，您的仪器……”

“这一切，都将在我死去的那一刻起归为王室所有。国库的官员，随行的还有书记官与公证人，会前来登记造册。他们会加盖封条，撰写笔录，为每件物品估值。而后他们会将我的画作、我的卷册、我的仪器、我的藏书悉数带走。就连我的丽萨夫人，也将离开此地，被纳入国王的收藏。”

萨莱瘫倒在一张小凳上，惊愕不已。

“这不可能！”他动情地喊道。“您是国王的画师！弗朗索瓦一世敬重您！他把这座庄园赐给了您，还给您一千埃居的年金！他绝不会容许这条可恶的法律得到执行！”

“你的忠诚令我感佩，但它也蒙蔽了你，让你看不清现实。你以为，即便是最仁慈的国王，也会为了一介艺术家，破例免除自己王国的法律吗？你以为他的谋臣们不会向他提及我这些财产的可观价值吗？”

他环视了一圈这间屋子，估量着此处所积累的这份艺术与科学的财富。

“多年来，我一直不够谨慎地积攒下了一份可观的财富。你们所欣赏的这些画作，你们所研读的这些笔记本，你们所操持的这些仪器，代表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一笔王室将毫不费力便能名正言顺没收的财富。”

梅尔齐重新恢复了神智，开始思索。

“可您所说的这些归化信函，您为何从未申请过呢？弗朗索瓦国王如此器重您，他一定会应允的！”

达·芬奇的嘴角浮起一抹苦涩的微笑。

“啊！你若知道这个问题几个月来是如何萦绕着我！我又是如何为自己的疏忽而自责！我当然想过，可总是想得太迟，总以为自己还有时间。这些手续复杂得如同地狱一般。首先要向王室大法官府呈递一份详尽的请愿书，陈述自己的功绩以及为王国所做出的贡献。这份请愿书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的形式撰写，用无可挑剔的法律拉丁文，并附上有影响力人士的证词。”

他停顿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接着说道：

“而后，倘若请愿被认定为可受理——这从来不能保证——它便会被转交给国王的枢密院审议。谋臣们会商议，核查申请人的过往，探问其品行，其宗教立场，其对王国的忠诚。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很多的时间。”

弗朗切斯科听着这番列举，愈发感到沮丧。

“所有这些手续，需要多长时间呢？”

“若一切顺利，若没有哪位谋臣提出异议，若没有哪个书记官弄丢了卷宗，若没有哪个心怀嫉妒的对手在权贵耳边说些坏话……至少也要六个月。更常见的是整整一

年，有时甚至更久。我曾询问过国王的秘书。他向我证实，这道手续既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

达·芬奇神情凝重地补充道：

“可这还没完。一旦信函获得批准——若真能获批——还需交由审计院核查，以确保不损及王室国库的权益。而后还要经议会登记备案，议会可能以形式瑕疵为由驳回。最后，还需经国库司予以核准。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信函颁授之后一年之内完成，否则便告失效。”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迷失在噼啪作响的壁炉火焰之中。

“看看我。我的身体告诉我，我已没有六个月了，也许连六个星期都不到。我等待得太久了。如今再着手办理这些手续，为时已晚。太晚了。”

弗朗切斯科站起身来，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决心所驱动。

“那就必须行动！明天我就去宫廷！我去向国王进言！我要向他说明事态的紧急！弗朗索瓦一世是真心爱重您的，他会理解的！他会下令加快这些手续的！”

“你以为一个国王能凭一时冲动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达·芬奇温和地问道。“即便他有此心，即便他愿为我打破常规，他也须征询他的枢密院，征询他的财务官员。而这些人……”

他犹豫了一下，仿佛在与自己内心搏斗，才要揭开一个痛苦的秘密。

“而且……还有别的事。一件我从未向你们透露过的事，为的是不让你们担心。”

他们凑近了他们的师父，满心疑惑。

“三个星期前，我接待了一位来客……一次令人洞悉真相的来访。一位宫廷中人，身着一袭黑衣，正如司法界

人士惯常的打扮。那是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先生，国库司的首席书记。”

达·芬奇重新经历了那一段令人不悦的场面，弗朗切斯科从他脸上看出了那位来客让他心生的厌恶。

“这人向我谈起我的种种创作，谈起它们的美，谈起它们的价值。他向我提出了一些关于我的财产、我的收入、我的种种计划的具体问题。而后，凭着那种法律界人士特有的手腕，他在谈话中不动声色地插入了一些关于我外国人身份的暗示。”

“什么样的暗示？”弗朗切斯科追问道，“预感到了最坏的情况。”

“他以那种此类人惯有的虚伪，让我明白，我的归化申请恐怕不会得到……顺利的接纳。他提到了「王室国库的正当关切」，提到了「理应避免的令人遗憾的先例」。”

“这算什么？”萨莱愤慨道。“什么先例？谁敢反对这样的申请？”

“一些颇有权势的人。一些能上达天听的人，他们心想：「异邦人财产没收权既能让这些财富回归王国的钱袋，又何必去便利它们传给外国的继承人呢？」一些谋臣，认为我的财产过于珍贵，不该逃脱王室之手，他们把我的死亡，视为——恰如其分地说——一个天赐良机，能不费分文便丰富王室的收藏。”

一股压抑的怒火在弗朗切斯科心中升起。

“这太可恶了！这些人竟在算计着您的死亡！他们就等着您咽气，好抢走您的珍宝！”

“想必如此。可这些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深谙王室行政的一切机关运作。而我们呢，在他们面前又算得了什

么？我们只是些没有靠山、没有个人财富、没有稳固政治支持的艺术家的。国王器重我，这是真的。可一位君王的情谊，在王室财政利益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达·芬奇最后一次凝视着《蒙娜丽莎》，仿佛想把这件浓缩了他全部艺术哲学的创作，铭刻进自己的记忆之中。

“我一生都在创造美，在艺术与科学中寻求真理。可我却忽略了人生中那些世俗的现实。我从未想过要为自己建立一张影响力的网络，去结交权贵。这份天真，将令我和这世上最爱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将那只还能动的手按在额头上，仿佛被悔恨的重压所压垮。

“我曾多少次对自己说：「明天，我就写那份请愿书。下星期，我就去拜访那位有影响力的谋臣。下个月，我就着手办理这些手续」。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一月又一月地流逝了，如今为时已晚。已太迟了，无法依法而行。剩下能做的，只有……”

他停了下来，让这句话悬在半空，仿佛在犹豫是否要跨过一条无形的界线。

萨莱动容地在扶手椅旁跪下，将手搭在这个收留了他、教育了他、如父亲般爱着他的人的手臂上。

“别这样折磨自己。您创造出的珍宝将流传千古！您推动了艺术与科学的进步！物质财产于我们又有何重要？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们会懂得如何传承您的教诲……”

“你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这场灾祸的规模有多大，达·芬奇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激烈打断了他。这不仅仅是让你们陷入穷困——尽管这一前景也丝毫不能让我感到宽慰。这关乎的是，一份无可替代的智识与艺术遗产，将被分散，被糟蹋。”

他在扶手椅上挺直了身子，一股令他的门生们感到诧异的活力涌了上来。

“看看你们周围！这些笔记本里蕴藏着我研究的秘密！我在里面记录下的种种观察，医生们要过很久才能重新发现！心脏的结构，眼睛的机能，肌肉的力学原理！”

他颤抖着手，指向桌上堆叠的一摞摞卷册。

“这些图画揭示了不为人知的绘画技法！晕涂法的秘密，空气透视的奥秘，用阴影塑造肌肤的艺术！这些模型展示的机械，要在一百年后才会被发明出来！飞行器，战车，活动桥梁，灌溉系统！”

他勉力站起身来，走向一张摊满了令人惊叹的复杂图纸的桌子。

“这里，这些关于鸟类飞行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些原理，有朝一日，将令人类得以升入空中！好好欣赏一下这些关于升力的计算，关于滑翔机制的计算！我明白了，空气如同水一般，若一个物体具有合适的形状，它便能承载起这个物体！”

弗朗切斯科动情地端详着这些他曾亲眼见证在达·芬奇笔下诞生的图纸，这些曾令他耗费数月、乃至数年心血的痴迷研究。

“这里，”达·芬奇一边指着别的图版一边继续说道，“我关于流体流动的研究！它们将彻底改变修建运河与船闸的技艺！我在其中解释了河水为何在河流的弯道中打转，如何预测洪水，如何避免港口淤沙！这些原理是普遍的，适用于一切流动之物！”

弗朗切斯科望着他的师父，发现了一种他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热情，一种紧迫感。

“还有这些图版！这些关于心脏、眼睛、大脑、肌肉、骨骼的图画……”

“啊，这些图版！”达·芬奇带着一种痛楚的自豪感喊道。“我发现心脏有四个腔室，而非亚里士多德与盖伦的论著所教导的两个！我揭开了视觉的奥秘，解释了我们为何能看见色彩，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远处的物体会显出蓝色！我解剖过人类，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健康的和患病的！”

他转向他的两位门生，脸上写满了痛苦。

“这一切都将被分散殆尽，被卖给一些无知的收藏家，他们只会把它们看作漂亮的图画，或者更糟，被打入某个潮湿的图书馆，无人问津。我的技术秘密，将随我一同死去。我的科学发现，将沉入遗忘。医生们将继续沿用陈旧的方法为病人放血。工程师们将建造出会被淤积堵塞的运河。人类将继续被困在地面上，而我明明已向他们指出了通往天空的道路！”

屋外，传来田地里劳作的农人们欢快的呼喊，家禽场里一只公鸡的啼鸣，还有圣弗洛朗坦礼拜堂远处传来的钟声。整个这个安宁的世界，全然不知庄园内正在上演的这幕悲剧。

梅尔齐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着这间画室，猛然间衡量出其中所蕴藏财富的浩瀚。他曾花费多少个时辰研读这些笔记本，破译这些镜像笔迹，探入达·芬奇科学的重重奥秘啊！他又曾与师父就这些颠覆了他世界观的发现，进行过多少次热切的交谈啊！

“总该有办法能挽救这份遗产的至少一部分吧，”他以变了调的声音说道。“您在宫廷里有朋友，在王国的显贵之中也有仰慕者……”

“我的朋友，我的仰慕者？”达·芬奇喊道。“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在哪里？曾庇护我的研究、理解其价值的昂布瓦兹枢机主教，九年前已经去世了。理解我城市规划构想的财政大臣弗洛里蒙·罗贝泰，如今病重。我的保护人一个接一个地离我而去，而我如今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廷臣与国库官员的贪婪。”

他继续说下去，被这一长段陈词耗尽了力气。

“况且，就算我还有靠山，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法律就是法律。异邦人财产没收权是不可避免地要适用的。即便是国王，也不能违反它而不留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的谋臣们会向他指出：若为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破例，那为何不为一个佛兰德商人破例？为一个德意志银行家破例？这又要到何处才是个尽头呢？”

已沉默了一会儿的萨莱，带着一种新的决心走近，目光中透着不同寻常的光彩。

“那如果……如果我们能想个办法，把一些创作从这份清单里挪走呢？在王室官员到来之前，把您最珍贵的画作藏起来呢？”

达·芬奇诧异地看着他，被这个大胆的提议弄得不知所措，这提议跨越了一条他至今都不曾敢设想的界线。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某些物件在那个关键时刻，可以……暂时不在场。让几幅画作，几本笔记本，逃过王室官员的视线。让它们在有人来没收之前就消失。”

弗朗切斯科明白了萨莱想说什么，这个念头让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一种兴奋与恐惧交织的感觉。

“他说得对！”弗朗切斯科附和道。“我们可以把最珍贵的创作藏起来！毕竟，这些年来，您最亲近的同伴从您

手中获得几件作为您情谊的见证，这不是很自然吗？某些笔记本存放在我们自己的居所，用于我们个人的研习，这不是很正常吗？谁又能证明它们不属于我们呢？”

这个提议冒犯了达·芬奇一贯正直的良心，尽管为了在意大利那些无情的宫廷世界中求存，他有时也不得不施展诡计与手腕，此刻他仍感到心绪不宁。

“你们所提议的……这非常危险。若你们的计谋被人发现，你们将有牢狱之灾，甚至可能被处以绞刑。侵占归属国王的财产被视为叛逆重罪。这可不是儿戏。”

“谁会发现呢？”萨莱坚持道。“这些王室官员并不知道您画室里究竟有什么。他们会依据所见来登记造册，而不是依据本该在此的东西。他们又怎能猜到，缺失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物件呢？”

达·芬奇沉默了良久，权衡着两位同伴的论点。他的目光扫过画室，在每一件创作、每一份手稿上停留，仿佛在评估哪些能够被挽救，哪些必须被牺牲给王室的钱柜。

“你们知道你们在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吗？”他终于开口说道。“你们是要我成为一桩针对国王的诈欺行为的同谋，而这位国王三年来一直庇护我、供养我。你们是要我背叛弗朗索瓦一世对我的信任，他待我以无与伦比的宽厚。”

“我们没有向您要求什么，”弗朗切斯科温和地答道。

“我们只是提议，您对两个忠诚的门生为挽救他们敬爱的师父的遗产而将要采取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什么都不必做，什么都不必说。我们会独自行动，独自承担风险。倘若我们万一被发现，您甚至可以声称对我们的行为毫不知情。”

这些话打动了达·芬奇。他珍视这两个人，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侍奉他，追随他走过所有的漂泊，放弃了自己的抱负，投身于他的艺术与科学。

弗朗切斯科，这位为对艺术的热爱而舍弃一切的米兰贵族，他执笔精细，对透视法奥妙的理解，胜过许多资历深厚的大师。萨莱，这个由街头顽童蜕变成的成熟艺术家，按照自己秘制的配方调配颜料，对他所有的笔记本都了如指掌，在他生病时以无尽的忠心悉心照料他。

“你们知道，我爱你们，如同爱着我从未有过的儿子，”他声音哽咽地喃喃道。“在艰难的时刻，你们是我的慰藉；在荣耀的时刻，你们是我的骄傲；在这行将结束的暮年，你们是我的宽慰。若你们认为我的某些创作，与其留在王室管家手中，不如托付给你们能得到更好的保存……那便依你们的良心去做吧。”

他举起那只还能动的手，做出一个近似祝福、又或许是道别的姿势。

“毕竟，这些作品，我不仅是为后世而创作，也是为了你们，我忠诚的同伴。在它们诞生的过程中，你们参与其中，与我共同分享了创作时的喜悦与失落。若你们能设法从王室行政的爪牙下挽救出几件……”

他让这句话悬在半空，无法说出那会使他成为盗窃同谋的字句。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计划在他们心中渐渐成形，但他们知道必须谨慎行事，保持冷静。

“但要当心，”达·芬奇神情凝重地补充道，目光忽然变得清醒。“要谨慎。要聪明。选择时不要太贪心。画室里必须留下足够多的物件，好让这份清单显得可信，好让王室官员满意地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去。若画室看上

去空空如也，他们会起疑心，会展开调查，而你们就完了。”

他把目光转向《蒙娜丽莎》。

“而尤其是……尤其是，永远不要碰我的这位夫人。这幅画作太出名了，为艺术爱好者所熟知。廷臣们在造访庄园时曾赞叹过她，文人们曾为她撰文，画家们曾前来研习她。国王本人在宫中也曾谈起过她，表达过将来拥有她的心愿。她的失踪会惊动当局，他们会翻遍整个法兰西去寻找她。若有必要，他们甚至会一路追查到意大利。”

“我们知道，”弗朗切斯科肯定道。“《蒙娜丽莎》必须留下。她太过引人注目，太多人渴求她了。但我们能挽救别的物件：除我们之外无人能读懂的解剖学研究，会被廷臣们当作毫无价值的涂鸦的发明图纸，他们不会明白其重要性的科学论著，几幅不为公众熟知、却美得摄人心魄的画作。”

“那幅您从未完成的《圣安妮》，”萨莱补充道，“那幅目光令人不安的《施洗者圣约翰》，那幅您在罗马绘制、令卫道之士震怒的《丽达与天鹅》……这些创作，知道它们存在的人不多。它们可以消失而不引起疑心。”

达·芬奇疲惫地点了点头，但也带着一份宽慰。至少，他的一部分遗产将得以存续，被托付给能够珍视、守护它的挚爱之手，甚至也许在时局更为有利之时，能让世人认识它。

“那便动手吧。但你们要向我承诺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务必确保这些创作永远不会失落。将它们传给你们的继承人，或遗赠给有识见的行家，若有必要也可以卖给懂得珍视它们的、心怀敬意的收藏家，但绝不要让美

在遗忘中消亡。绝不要让我的科学发现湮没在阁楼的尘埃之中。”

“我们向您保证，”两位弟子异口同声地说道，被这份庄严的承诺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因这份承诺赋予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以意义而感到安慰。

“现在，让我歇息吧。我累了。太累了。可至少，我能带着一份平静离去，知道你们会守护我在世间最珍视的一切。”

这几句话，几乎是他在神志清醒时说出的最后几句话。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的状况迅速恶化。他陷入半昏迷状态，时而用托斯卡纳方言喃喃说出一些语无伦次的字句，用那只还能动的手在空中比画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的形状，也许是在谵妄中重温着他一生中的辉煌时刻。

两个人再也没有离开他的床边。当他还能喝水时，他们喂他喝水，用布巾为他擦拭额头，为他掖好被褥，让壁炉里的火始终不灭。有时，达·芬奇似乎重新恢复了意识，用他那双即便在高烧中仍旧敏锐的蓝眼睛凝视着他们，仿佛想要将他们的容颜永远铭刻在等待着他的永恒中。

五月一日傍晚，他的状况似乎略有好转。他喝了弗朗切斯科用勺子喂他的一点肉汤，说了几句关于窗外可见的日落之美的清醒话语，要求人给他拿一面镜子来看看自己的脸。梅尔齐一度满怀希望，以为这次好转是奇迹般缓解的征兆，认为师父将再一次躲过守候着他的死亡。但在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的傍晚，正当城堡礼拜堂的钟声敲响晚祷之时，落日为画室的窗户染上一片虚幻的金色光辉，达·芬奇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唇边挂着一丝安

详的微笑，仿佛他终于找到了那些困扰他六十七年的所有谜团的答案。

他们在遗体旁久久伫立不动，无法回过神来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一切。死神带走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而他们，独自留在这间画室里，尽管室内藏有无数珍宝，却猛然间显得如此空荡。

“他走了，”弗朗切斯科声音破碎地喃喃道，泪水肆意地流下面颊。“他离我们而去了。师父不在了。”

萨莱用一只颤抖的手，抚上死者依旧微温的额头。他轻轻合上他的眼睑，带着温柔完成了这最后的手势。

“愿他安息。他已走完了尘世的旅程。如今轮到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使命了。轮到我们去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了。”

这几句话把弗朗切斯科拉回到了他们所处境况的现实之中。丧亲之痛，只能暂且搁置。真正紧迫的事情，还在别处。时间正与他们为敌。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他声音发白地问道。

萨莱挺直了身子，从悲伤转为坚决，双眼干涸下来，脸上呈现出专注的神情。

“消息很快会传开来。仆人们会发现他去世了。会有人把这个噩耗报告给城堡。等信使去通知官府，国库的官员组织前来……最多也就几个小时。他们明天一早黎明时分就会到，如果这个蒙科尔内真如传闻那般热衷公务，甚至可能会更早。我们必须今夜行动。我们只有今夜了。”

弗朗切斯科绕着画室走了一圈，估量着他们能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挽救些什么。

“我们没时间把一切都带走。你去找些箱子来，帆布袋，毯子，一切能用来悄悄搬运物件的东西。我，去把我们该抢救的东西列出来。”

萨莱犹豫了一下，最后一次凝视着达·芬奇安详的面容。

“可是……那他呢？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丢在这里，孤身一人，没人守灵，没有祈祷……”

“我们过后再回来照料他，”弗朗切斯科坚定地答道。“眼下，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遗愿。挽救他的遗产。这是他所希望的。这是他要求我们去做。”

萨莱点了点头，明白了这番论理的道理所在。他离开画室，去寻找他们此番大计所需的物件。

梅尔齐独自留下与遗体相伴，最后一次在达·芬奇安息的扶手椅旁跪下。

“原谅我，师父。原谅我无法以您的伟大所应得的祈祷与烛光为您守灵。但我向您起誓，我们会挽救一切能够挽救的东西。您的天才不会随您一同逝去。您的发现会流传下去。我以我的荣誉，我的生命，我所有最神圣的一切起誓。”

他站起身来，粗鲁地抹去眼中的泪水，热切地投入到工作中。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弗朗切斯科与萨莱在紧绷的沉默中忙碌着，唯有他们踏在石板地上的脚步声和纸张与布料的窸窣声打破这份寂静。每一个动作都经过了盘算，每一项决定都经过了审慎的权衡，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既迅速又谨慎。

弗朗切斯科在心中拟定了一份优先物件的清单，那是多年来陪伴师父研习其遗产所结出的果实。首先是笔记本

——这些是无可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二十五年秘密而危险的研究所结出的成果。其次是关于飞行的研究——这些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富有远见的发现，比科学的进步早了几个世纪。还有关于液体动力学的研究。

至于画作，选择就更为微妙，更为痛苦。正如达·芬奇所指示的，《蒙娜丽莎》必须留下。她的失踪会引发一场调查，会调动整个王室的力量去寻找她。《圣安妮》也太出名了，太过显眼，太受廷臣们参观时的赞赏。但那幅《施洗者圣约翰》，目光仰向天空，是一幅令人不安、以其雌雄同体般的感官魅力近乎冒犯的画作，很少有访客见过它，因为达·芬奇常常将它藏起来。还有那幅在罗马绘制的《丽达与天鹅》，一幅感官意味浓烈的画作，其异教神话与情色意味令卫道之士深感不安，他一直拒绝将它展示给教士们看。

“把《施洗者圣约翰》拿走，”弗朗切斯科压低声音吩咐道，仿佛担心即使在这样的深夜也会被人听见。“用这块亚麻布包裹它。要好几层。护好边角。天亮之前，我们要把它带到你的住处去。”

“那《丽达》呢？”

弗朗切斯科犹豫了。这幅画是近些年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它异教的神话题材，它的感官意味，使它成为一件颇具争议、可能招人注目的创作。

“是，把它也带走。但要藏得好。要比一般的好。若教会当局得知我们持有此画，他们可能会以有伤风化为由要求没收，甚至将它销毁。它必须消失。”

他们继续着这份有条不紊的工作。最重要的卷册被打包进内衬毛毡的皮箱。弗朗切斯科小心地在画室留下足够多的笔记本，好让清单显得内容丰富。他挑选了那些视觉上最为壮观的：那些画满了非凡机械、复杂几何图

形、详尽解剖图的，但在科学上并非最为重要的。那些能给王室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却并不代表着真正学识的。

至于图画，他表现出了辨识力，一种被紧迫的形势所磨砺出的敏锐策略头脑。他留下了衣褶研究、肖像预备习作、绘画构图、风景画——一切具有明显、且外行人也能理解的艺术价值的东西。但他抢救出了详尽的研究、机械的技术图纸、建筑方案、植物学研究——一切包含着无价科学知识、却是无知的官员无从欣赏的东西。

“你看，”他一边指着墙壁一边向萨莱解释道。“这些画框我们摘下来，但这些，我们留在最显眼的地方。墙上留下的痕迹不能太多。要让官员们看到，画室仍然物件充足，他们的战利品也很可观。”

萨莱点了点头，明白了这套策略。目标不是把画室清空，那会引起怀疑，而是在挽救最重要的东西的同时，营造出完整无缺的假象。是一种在抢救与掩藏之间的平衡。

他仔细审视墙壁，记下哪些画框会留下，哪些将会消失。弗朗切斯科说得没错：画室必须保持它惯常的模样，那种一向是师父工作空间特有的、看似杂乱无章的样子。国库的官员绝不能有种被人打扫过、被人整理过、被人挑选过的印象。一切都必须显得自然，仿佛自死者生前以来从未改变过。

“看看桌上这些成堆的图纸，”弗朗切斯科指着好几沓散页说道。“我们留下一半，仍旧凌乱地放着，仿佛达·芬奇刚刚翻阅过它们。我们拿走另一半，但要留意，留下的那些要足够引人注目，好满足这些检查员的好奇心。”

他翻阅着这些图纸，精准地分开了该带走的和该留下的。在留给王室清单的那一堆里，他放进了一些怪诞的头部习作——达·芬奇喜爱绘制的那种漫画，其表现力总是令来访者印象深刻——还有几幅从未画成的战役构图，几幅马匹与骑兵的习作，几幅怪石嶙峋的风景画。

但在留给挽救的那一堆里，他放进的却是真正的珍宝：展示手臂解剖、标注着肌肉、肌腱与神经、其精确度堪称科学水准的图版；展示鸟翼下方升力如何生成的飞行力学研究；带有流量与压力计算的灌溉系统机械图；关于山脉形成与河谷侵蚀的地质学观察。

“你看出区别了吗？”他向一旁观察着他的萨莱问道。

“我们留下的，是艺术品。诚然是美的，可任何一个爱好者都能欣赏它们。我们抢救出来的，是那些价值只有学者才能理解的文献，也许要等到一百年后，也许要等到两百年后。王室官员会把我们留下的图画当作达·芬奇艺术的顶峰。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萨莱点头表示赞同。弗朗切斯科向来有这样的天赋，不仅理解师父的艺术，也理解他深层的思想。萨莱自己，尽管在达·芬奇身边度过了多年，却从未完全把握住那些解剖学或机械学研究的全部深度。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称职的画家，一个手巧的临摹者。但弗朗切斯科不同：他有那种智性的的好奇心，那种严谨，使他能够跟得上这位托斯卡纳老人最为复杂的推理。

“那些装订成册的笔记本呢？”萨莱一边问，一边指着柜子里一排排的卷册。

“笔记本，这个更棘手。太厚重了，无法全部带走。而且，它们的失踪会太过显眼。不，我们得更机灵一些。”

他思索了片刻，随后脸上一亮。

“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把所有装订好的大卷册都留在柜子里，摆得清清楚楚。这些，官员们会看到，会数，会登记。他们会为数量之多、卷册之厚而感到惊讶。但他们不会知道的是，我们已经把最重要的那些页面抽走了。”

“把书页撕下来？”萨莱担忧道。“这样不会露出破绽吗？”

“只要我们做得娴熟，就不会。达·芬奇本人就常常从他的笔记本里撕下页面，用来赠人，或挪动，或重新整理。他的装订本里到处是空缺，缺页，以及事后缝补上去的散页。这是他惯常的工作方式。官员们不会看出任何异常。”

弗朗切斯科取出第一本卷册，翻开它，逐页审视其中的内容。这是最重要的合集之一，达·芬奇在其中记录了他对人类心脏解剖的观察，发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结构。

与此同时，萨莱正准备着运送这些物件所需的箱子和袋子。他悄悄从阁楼上搬下了好几只熟皮制成的旅行箱，正是他们从意大利远行时用过的那些。这些箱子坚固、防水，配有坚牢的锁具，能够在运送途中保护这些创作。

“你觉得我们能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运走多少只箱子？”他向弗朗切斯科问道。

“六只，顶多七只。得让这看起来很自然。我们是两个在官府到来之前来取一些私人物品的同伴。若我们扛着十几只箱子走出庄园，会有人注意到的。”

“那就要充分利用空间。每只箱子里都尽可能多装。”

萨莱开始将物件安置进箱子里。先是手稿，一叠叠码好，用油纸隔开，以防潮湿。接着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

书页，按主题分类，用丝带系在一起，以免相互混杂。最脆弱的图纸，卷绕在木制圆柱上，以免起皱。较小的画作，从画框上拆下，以节省空间。

弗朗切斯科拿着《施洗者圣约翰》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加入他。

“这一幅，我们不能把它从画框上拆下来。画作太脆弱，画布也太老旧了。得原样运送。”

这幅画描绘着一位美得摄人心魄的年轻男子，一根手指指向天空，目光令人不安。这是达·芬奇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约在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六年间于罗马绘制，保留了大师全盛时期晕涂技法的全部力量。人物仿佛从阴影中浮现出来，被一种无形的光线所塑造，肌肤有着一一种虚幻般的柔美。

“真美，”萨莱喃喃道。“每次我看它，都感觉这个年轻人仿佛就要从他夜色的天空中走下来，与我们相会。”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挽救它。这幅画展现了达·芬奇技艺的巅峰。若这幅画落入无知者之手，若保存不当，修复不善，那将是一份无可替代的见证，将随之消失。”

“那《丽达》呢？”萨莱问道。

弗朗切斯科去取那另一幅颇具争议的画作。它描绘着斯巴达王后丽达，正拥抱着一只天鹅——依希腊神话所说，正是宙斯所化。这一场景弥漫着一种触手可及的、近乎情色的官能之美，丽达半裸着身子，天鹅偎依在她身旁，脚边则是两对因这场神圣结合而诞生的双生子：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海伦与克吕泰墨斯特拉，正破着巨大的蛋壳而出。

“这幅画一向让教会人士感到不自在，”弗朗切斯科一边端详这幅画一边评论道。“它的异教神话，它的官能意味……达·芬奇在罗马时，教皇利奥十世曾拒绝一看。

有些高级教士甚至提议将它作为伤风败俗之作予以销毁。”

“这更是要挽救它的理由，”萨莱激烈地反驳道。“我绝不会让无知的教条主义者毁掉这样一件杰作。”

《丽达》以与《施洗者圣约翰》同样的细心被包好，放入了另一只箱子。接着轮到别的不那么出名的创作：一幅达·芬奇从未完成的《纺锤圣母》习作，一幅在曼图亚短暂逗留期间完成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肖像，几块从未完成的祭坛画的预备板。

夜半时分，正当他们继续着这份工作时，弗朗切斯科停了下来。他刚刚打开了一只贵重木料制成的小匣子，那是达·芬奇存放他最私人物件的地方。里面，包裹在深红色的丝绸中，是几件在市场上毫无价值、但在情感上却有着巨大意义的物品。

“你看，”他一边一件件取出这些物品一边对萨莱说道。

首先是一枚青铜圆牌，上面刻着达·芬奇母亲卡特琳娜的侧影。这位芬奇的农妇，在婚姻之外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在他被身为公证人的父亲收养之前，抚养了他最初的几年。这枚圆牌是达·芬奇根据他童年的记忆，在他母亲去世多年之后请人制作的。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作为逝去童年的一件护身符。

接着是一枚镶着绿色宝石——祖母绿或橄榄石——的金戒指，那是一四八二年达·芬奇进入米兰公爵麾下效力之初，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赠予他的。这枚戒指象征着他在米兰宫廷度过的十七年，也许正是他创造力最富饶的岁月，那时他享有着最为慷慨的赞助。

还有一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几粒泥土。弗朗切斯科小心地拿起它，望着那在烛光下微微闪烁的褐色尘土。

“这是什么？”萨莱好奇地问道。

“芬奇的泥土。来自他母亲家所在的那座山丘。一个晚上，他曾向我吐露过。他是在一五零七年最后一次造访托斯卡纳时采集的这份泥土，那时他回去处理叔父去世后的遗产事宜。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弗朗切斯科感慨万分地端详着这只小瓶。这些尘土浓缩了一个终生辗转于宫廷之间、永远是异乡人、永远在寻觅一个他将永远无法重新拥有的家园的人，心中的全部乡愁。

“这些物件，我们也必须保存。它们对国库的官员来说毫无价值，但它们见证的，是达·芬奇这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位艺术家或学者。”

他把圆牌、戒指与小瓶放回它们的匣子里，将它放在其中一只旅行箱的底部，压在厚厚的一层手稿之下。

时间以一种令人心惊的速度流逝着。每当弗朗切斯科望向窗外，他都发现黎明正在临近。东方的天空渐渐变亮，从深沉的黑色转为暗灰，再转为一种朦胧的灰蓝色。鸟儿开始在克洛·吕斯庄园的花园中鸣唱。再过几个小时，庄园就会苏醒，仆人们会走出他们的房间，师父去世的消息将传播开来。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弗朗切斯科催促道。“我们还有太多要做，时间却在流逝。”

他们加倍努力，几乎在沉默中忙碌着，各自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多年的长期协作，那些并肩度过的岁月，在他们之间造就了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弗朗切斯科负责整理科学仪器。达·芬奇拥有一批可观的收藏：精细雕刻的铜制星盘，臂杆抛光钢制的精密圆规，带刻度的角尺与直尺，展示行星运行的浑天仪，一个他自己组装用来观测星辰的小型透镜望远镜，用来分解光线的玻璃棱镜，用来称量颜料的精密天平。

“这些仪器也各有其故事，”弗朗切斯科解释道。“有些很容易被认出是朋友或机构借给师父的。有些则太过稀有，太过珍贵，不能不出现在清单上。”

他挑选出那些最不为人知的物件，那些不见于任何官方登记、由达·芬奇自己购置或制作的。这架手工望远镜进了其中一只箱子——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物品，见证着达·芬奇秘密进行的天文观测，他一直担心，若被人发现自己以人造仪器窥视天穹，会被指控为异端。棱镜也一样——达·芬奇曾用它们来理解光影与色彩的本质，进行着比牛顿的研究早了几个世纪的实验。

萨莱这边，则负责整理颜料与画作配方。达·芬奇一生致力于完善他的技法，按照秘密的比例调配材料，创造出耐久性惊人的清漆。所有这些配方都记录在师父珍藏的几本小笔记本里。

“这些笔记本里蕴藏着让师父得以创造出他那种晕涂效果的技术秘密，”萨莱一边展示给弗朗切斯科一边说道。“亚麻籽油与松脂油的精确比例，将颜料研磨至极细的方法，每层透明釉彩之间所需的干燥时间。若我们失去了这些配方，就再也没有人能重新创造出来了。”

“那就带走它们。好好藏起来。它们是与那些画作同样珍贵的宝藏。”

这些笔记本被包在打了蜡的帆布里，放进了箱子。萨莱还随同放进了好几只小瓶，里面装着达·芬奇从旅途中带回的珍稀颜料：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用于浓烈的蓝色；来自埃及的孔雀石，用于深邃的绿色；来自中国的朱砂，用于耀眼的红色；还有雌黄，用于金黄色。

正当他们合上最后一只箱子时，弗朗切斯科忽然生出一个令他浑身发冷的念头。

“那些信！我们把信忘了！”

“什么信？”

“师父的往来书信！这些年来他收到过成百上千封信。有来自赞助人、朋友、学者、艺术家的信。有些出自显赫人物之手：洛伦佐·德·美第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切萨雷·波吉亚，教皇利奥十世，甚至弗朗索瓦国王本人。还有他写了却从未寄出的信，那些他一直珍藏着的草稿。”

弗朗切斯科冲向摆在画室一角的一只橡木大柜。他打开它，取出好几沓用彩色缎带系着的信件。

“你看！好几年的往来信函！这些信里包含着关于师父生平的宝贵信息，关于他的种种交游，关于他所接到的委托，关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科学论争。”

他开始一封封翻阅，分开那些该抢救和那些可以留下的。官方信函，涉及委托或付款的那些，应当留下——它们的缺失在清点时会引人注意。但那些私人信件，那些揭示师父内心世界、他的疑虑、他的希望、他的梦想的信件，则值得被保存下来。

他偶然发现一封从未寄出的信，是写给米开朗基罗的。一封奇特的信，既充满敬意又不乏尖刻，其中达·芬奇承认了这位对手的天才，同时也批评了他的粗暴，他对晕涂法的轻视，他偏爱线条而牺牲色彩的取向。这封信道出了这两位当代最伟大艺术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这一封，我们留着，”弗朗切斯科喃喃道。

随着整理的进行，梅尔齐意识到这些信件构成了一份多么无可替代的见证。未来的历史学家们能够通过它们，重构出师父的生平，他的行踪，他的种种计划，他的种种交游。但有一些信件包含着过于敏感或过于私密的信息，不宜落入王室官员的眼中。

其中尤其有一整批与一位神秘的「忠实之友」(Amico Fidato)往来的信件，此人身份从未被揭示，但看来是他在某些微妙事务中的同谋。这些信件谈到了秘密解剖，秘密进行的光学实验，可能被判定为异端的天文观测。这批危险的通信，必须从清单中撤走。

“你意识到了吗，”弗朗切斯科对萨莱说道，“即便在师父死后，这些信也可能引发麻烦？可能会玷污他的名声，让他在死后被指控为异端？”

“这更是要清走它们的理由。师父理应安息，不该有宗教裁判官前来翻查，寻找不敬信仰的蛛丝马迹。”

这些敏感的文件被并入了箱子。弗朗切斯科在橡木柜里留下了足够多的信件，好让清单上能记录一份丰富的往来书信，但他小心地只保留了那些最无关紧要、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的信件。

天已大亮了。透过画室的窗户，一片灰冷的光透了进来，驱散了夜晚的阴影。弗朗切斯科在心中默算着日期：这是一五一九年五月三日，师父去世的次日。用不了多久，整个家宅便会苏醒。仆人们会发现遗体。必须派信使前往城堡，通知相关的官员，安排葬礼。

“我们现在必须把箱子运走，”他宣布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再过一个小时，就来不及了。”

他们抬起第一只箱子。它很重，重得吓人。两人合力，好不容易将它抬到画室门口，随后沿楼梯运下去，小心不发出任何声响。

庄园一片寂静，沉浸在黎明前那深沉的睡意之中。唯有一根横梁的吱嘎声，一级台阶在他们脚下的呻吟，扰乱了这份寂静。弗朗切斯科每走一步都屏住呼吸，唯恐有门突然打开，唯恐有个好奇的仆人撞见他们。

他们从通往花园的小门走出庄园。清晨的空气清冽，几近寒冷，弥漫着露水的湿气。一层薄雾贴着地面浮动，赋予这片风景一种虚幻的氛围。仿佛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意识到了此刻的重要性。

萨莱的住所，距离主庄园约两百步之遥，位于菜园的另一侧。那是一座石木结构的小屋，只有一层楼，国王曾将它划拨给这个「小魔鬼」，让他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空间。萨莱在那里布置了一间副画室，用来创作自己的画作和临摹师父的创作。

他们把第一只箱子运到住所，从后门搬了进去，抬上楼，放进萨莱事先准备好的藏匿处。他已从北墙拆下了几块石头，凿出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一旦石块归位、用新拌的灰浆重新勾缝，便再没有人能猜到此处藏着一份宝藏。

“完美，”弗朗切斯科检视了藏匿处后喃喃道。“即便有官员来搜查你的住所——这不太可能——他们也什么都找不到。得把整面墙都拆了，才能发现这些箱子。”

他们返回庄园去取第二只箱子。天空继续放亮。弗朗切斯科感到焦虑在他心中升起。每一分钟都在增加被发现的风险。他已经开始想象某个仆人比平常起得更早，撞见他们带着这些不利于自己的货物，惊呼报警……

但那一夜幸运女神眷顾了他们。他们成功运走了前六只箱子，一路上没有遇上任何人影。只有厨房里的一只猫，出来进行它夜间的捕猎，用它那双磷光闪烁的眼睛看了他们一眼，随后便消失在灌木丛中。

第七只，也是最后一只箱子，是最难搬的。里面装着从画框上拆下的画作，以及那幅仍固定在原有支撑上的《施洗者圣约翰》。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免在运输途中损坏这些画作。

正当他们带着这最后一批货物穿越花园时，天亮了。太阳穿透了晨雾，投下斜射的光线，照亮了草叶上的露珠。一只公鸡在家禽场中啼叫，很快便有别的公鸡随之应和。庄园即将苏醒。

“快！”弗朗切斯科催促道。“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他们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到萨莱的住所，途中好几次险些在小径上绊倒。箱子在他们之间危险地摇晃着，弗朗切斯科不寒而栗地想象着里面的画作相互碰撞、画布被撕裂、多年心血在他们的仓促之中化为乌有的场景。

最后一只箱子被抬上楼，塞进墙中的藏匿处。萨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把石块重新归位。几分钟之内，那面墙便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弗朗切斯科用石灰和沙子调好灰浆，填好接缝，抹平了表面。

“现在，得让这灰浆在有人来检查之前干透，”他说道。

“白天的暑热里它会干得很快的。再说，官员们又为何要来搜查我这寒舍呢？宝藏是在庄园里，他们会把力气都集中在那儿。”

弗朗切斯科点了点头，愿意相信他的同伴。但焦虑始终没有离开他。他们刚刚犯下了一件重罪，一桩针对王室的盗窃罪，是要受最严厉惩处的。倘若真相有朝一日被人揭穿……

“别去想最坏的情况，”萨莱猜到了他的心思，鼓励道。“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现在，我们回庄园去吧。得赶在仆人们发现遗体之前赶到那里。一切都得显得正常。”

他们循原路返回，脚步匆忙，却不显仓皇。花园正在苏醒。鸟儿从一根枝头飞到另一根，蝴蝶已开始它们晨间的舞蹈，露珠在每一片草叶上闪烁。这是五月里美好的

一个清晨，温柔而明亮，与庄园中正在上演的这幕悲剧形成了绝对的反差。

当他们回到画室时，弗朗切斯科最后环视了一圈这个空间。他必须确保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没有任何东西暴露出他们夜间的活动。柜子里堆满了笔记本——诚然已被抽走了最珍贵的书页，但仍以其厚度令人印象深刻。墙上挂满了图画——诚然并非科学上最重要的那些，却是视觉上最为壮观的。桌上堆满了仪器、调色板、画笔。

而在中央，画架上，《蒙娜丽莎》正以她那神秘的微笑注视着他们。弗朗切斯科最后一次走近这幅肖像，欣赏着这张陪伴了他们生命中如此多年岁的面庞。

“原谅我们要将您留下，”他向画中的这位夫人喃喃道。“但您将去到一双善待您的手中。弗朗索瓦国王会珍视您，守护您。您也许会成为师父最著名的作品，成为他天才在未来世纪的象征。这是一个美好的命运。”

他退后几步，观察着晨光如何在画作的表面上流转，显露出塑形的复杂，暗部与亮部之间难以察觉的过渡。

萨莱把他从这份沉思中拉了回来。

“弗朗切斯科，我们该走了。仆人们随时都会起来。我们发现遗体的时候，我们得在自己的房间里。”

“你说得对。可先……”

弗朗切斯科走近达·芬奇的遗体，他仍旧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死亡将他定格在了那里。他整理了死者的衣物，抚平了他黑色天鹅绒长袍上的褶皱，将他的双手交叠在胸前。他用一块布巾擦净了他的脸，拭去了汗水与高烧留下的痕迹。他希望师父看上去庄严、安详，几乎像是睡着了一般。

“好了，师父。您已经准备好迎接您的访客了。安息吧。我们已经完成了您的最后遗愿。”

萨莱也走近遗体。他把手搭在死者的肩上，静默了片刻，随后用米兰方言喃喃说了几句话，弗朗切斯科没能完全听懂。那大概是他童年时的一段祈祷词，也许是他母亲教给他的东西，早在他成为那个在米兰街头行窃的「小魔鬼」之前。

随后他们离开了画室，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弗朗切斯科和衣倒在床上，试图装出刚刚醒来的样子。他的心怦怦直跳，这个高强度夜晚的肾上腺素仍在他的血管中脉动。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样过了多久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弗朗切斯科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漂浮在这种介于清醒与睡眠、疲惫与神经紧张之间的奇异状态中。

是一声尖叫把他拉回了现实。一声女人的尖叫，尖锐而撕心裂肺，响彻整个庄园。厨娘刚刚端着师父的早餐上楼到画室——就像她每天早晨那样——她发现了遗体。

弗朗切斯科从床上一跃而起，冲进走廊。萨莱从他的房间里冒了出来，睡眼惺忪，双眼却警觉。他们朝画室跑去，被这声尖叫惊动的其他仆人也随后赶到。

厨娘，一位名叫玛格丽特、身材壮实的女人，跪在扶手椅前，放声啜泣。侍女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紧张地划着十字。园丁和马夫也赶到了，为表示对死亡的敬意摘下了帽子。

梅尔齐走近遗体，把手放在达·芬奇的颈部，寻找一个他明知不会找到的脉搏。随后他转向聚在一起的仆人们，神情凝重，声音因一种毫无做作成分的情绪而哽咽。

“师父去世了。他在夜里离我们而去了。愿天主怜悯他的灵魂。”

一阵沮丧的低语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有些人公然哭了起来，有些人则怔在原地，陷入一种恭敬的沉默。达·芬奇一直是个好师父，对他的仆从们慷慨大方，从不粗暴，也从不轻蔑待人。仆人们真心地爱戴着他。

“得去通知城堡，”弗朗切斯科重新掌控局面，宣布道。“雷米，跑去王城，把达·芬奇先生的死讯告诉官府。告诉他们，我们等候他们对葬礼……以及其他手续的指示。”

园丁点了点头便冲了出去，因有一件具体的差事让他能离开这幕死亡的场景而感到宽慰。弗朗切斯科转向侍女们。

“你们两个，去准备遗体。为他清洗，为他穿上他最漂亮的衣服。官府来的时候他必须体面。而你，玛格丽特，别哭了，去准备大客厅。得把遗体安置在那里，供人守灵。”

仆人们忙碌了起来，很高兴有命令可以遵从，有事情可以做，能让他们暂时忘却悲伤。弗朗切斯科和萨莱在画室里独自留了片刻。

“干得漂亮，”萨莱喃喃道。“现在，没有人会想到要问我们什么棘手的问题了。”

“别高兴得太早。最难的还在后头。等王室的官员到来，等他们开始清点造册，那才是我们这套说辞真正接受考验的时候。”

“我们有一套连贯、可信的说法。我们照着说就是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场活动的旋涡。达·芬奇的遗体被清洗干净，穿上了一件他只有在盛大场合才穿的紫色

天鹅绒长袍。侍女们为他梳理头发，修剪胡须，让他呈现出一种安详的尊贵之姿。随后遗体被运至楼下的大客厅，安放在一张覆着白色亚麻布的桌子上，四周点着蜡烛，摇曳的光影投在墙上。

消息一在昂布瓦兹传开，来访者便开始涌入。曾为达·芬奇效力的工匠，曾向他供应物料的商人，曾与他交谈过的文人，还有从圣弗洛朗坦礼拜堂赶来、为他灵魂安息祈祷的教士。所有人都前来表达敬意，跪在遗体前，喃喃念着祈祷词。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接待着来访者，接受着他们的哀悼，讲述着师父最后时光。他们的悲痛是真挚的，他们的泪水是真实的。但在这份真实的悲痛之下，还有一份持续不断的警觉，对每一个细节的留意。

临近正午时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出现在庄园前。弗朗索瓦一世亲自前来向死者致敬。这位身着黑衣以示哀悼的年轻国王，由他的姐姐、几位谋臣以及一队卫士随行护卫。

国王步入大客厅时，弗朗切斯科和萨莱跪了下来。弗朗索瓦缓缓走近遗体，久久端详着达·芬奇安详的面容，随后自己也跪了下来，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好几分钟。

他起身时，弗朗切斯科看见国王双眼泛红。他的感情是真挚的。弗朗索瓦爱戴过这位老大师，这场死亡令他深受触动。

“弗朗切斯科先生，”国王以变了调的声音问道，“他到底是何时去世的？”

“就在昨夜，陛下，五月二日的傍晚。他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没有明显的痛苦。他的心脏只是停止了跳动。”

“他临终前神志清醒吗？”

弗朗切斯科犹豫了一瞬间。他该提及他们最后的谈话吗，提及师父关于他那些创作的嘱咐吗？不，最好还是含糊其辞。

“他时而清醒，时而迷乱，陛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看上去很平静，仿佛已经接受了等待着他的一切。”

弗朗索瓦点了点头，拭去一滴泪水。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法兰西有幸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接纳了他，我们对此心怀感激。”

他转向他的谋臣们。

“我要一场配得上他伟大的葬礼。他将被安葬在圣弗洛朗坦礼拜堂，就在紧邻王城的墓地里。要准备一场隆重的仪式。王国的所有艺术家与文人都要受到邀请。”

“遵命，陛下，”一位谋臣一边记录一边应道。

弗朗索瓦转向弗朗切斯科。

“你们两位，他忠实的同伴，如今师父已不在了，你们将来打算怎么办？”

“我们……我们还不知道，陛下。也许我们会回意大利去，回米兰，那里我们还有家人。但眼下，我们必须先处理师父的种种事务，整理他的文件……”

“那是自然。尽管花上一切所需要的时间。你们不会被赶出庄园的。你们可以留下，一直留到把达·芬奇先生的事务处理妥当为止。”

“多谢陛下的仁厚。”

弗朗索瓦在客厅里走了几步，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随后他转向一个身着黑袍、略微退后站着的男子。那正是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先生，国库司的书记，几天前达·芬奇曾向他们提起过此人。

“蒙科尔内先生，”国王吩咐道，“你要确保依法定形式对已故达·芬奇先生的财产进行清点。我要一份完整的清单，记录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画作，他的手稿，他的仪器，一切都必须登记造册。”

“遵命，陛下。我们会尽快着手清点。就说……三天后如何？”

“我觉得这很合理。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留些时间，让他们为师父哀悼吧。”

蒙科尔内带着一种刻意的谦卑弯腰行礼，但弗朗切斯科从他的目光中捕捉到了一丝满意，近乎贪婪的神情。这个人知道自己将要染指一份可观的艺术与科学珍宝，这个前景令他感到欣喜。

国王一行离开后，弗朗切斯科和萨莱在大客厅里独自留下，仍在微微颤抖。

“三天，”萨莱喃喃道。“在他们来清点之前，给了我们三天。这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三天，用来打磨我们的说法，确保我们对事实的陈述没有任何破绽。但也是三天，要活在焦虑之中，要留意任何有人起疑的迹象。”

“没有人起疑。你看国王待我们多么和善、多么恭敬。在他眼里，我们不过是两个悲伤的同伴，仅此而已。”

“但愿蒙科尔内也会这么看待此事。”

接下来的三天是一场煎熬。达·芬奇的遗体一直陈列在庄园的大客厅里，四周点着蜡烛，摇曳的光影投在墙上。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轮流守灵，接待来访者，接受哀悼，讲述师父最后的时光。

守灵第二天的傍晚，他们在大客厅里独自留下，被络绎不绝的访客队伍折腾得筋疲力尽。

“明天，蒙科尔内就要来清点了，”弗朗切斯科喃喃道。

“然后就是葬礼。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都已就绪。画室看上去完好无损，我们的说法前后一致。”

他们在一种沉思般的沉默中度过了这最后的一夜，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在心中为翌日的考验做着准备。

弗朗切斯科情不自禁地想着达·芬奇。他刚刚失去了那个十三年来做过他的师父、他的引路人，几乎是他父亲的人。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要去哪里？这些问题萦绕着他，但他把它们推开了。眼下，他必须专注于最重要的事：守护师父的遗产，扮演好一个悲痛同伴的角色，直到王室官员完成他们的清点。

仆人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国王已在城堡为他们安排了新的差事。弗朗切斯科和萨莱独自留在这个曾经如此生动、如此富有创造力、如今却显得空荡而阴郁的空间里。

他们离开了停灵的厅堂，去画室坐下，面对着《蒙娜丽莎》。两人都没有说话。还能说些什么呢？在他们失去的巨大之痛面前，言语显得那样徒劳。

萨莱打破了沉默。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师父吗？在哪儿？”

弗朗切斯科尽管心中悲伤，仍不禁笑了。这段回忆清晰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在米兰，在他那间靠近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画室里。那是一五零六年，我十六岁。我父亲带我去见那位人人都在谈论的伟大的达·芬奇。我当时怕极了。”

“见到他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我看见一个已不再年轻——他当时已经五十四岁了——但双眼却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芒的男人。他盯着我，仿佛想读透我的灵魂。随后他问我：「年轻人，你为什么想学绘画？」我磕磕巴巴地说了些关于美，关于艺术的话。他摇了摇头。「答错了。学绘画是为了学会去看。为了理解光影的游戏如何塑造形体，色彩如何从黑暗中诞生，眼睛如何把世界转译为感觉。美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这个回答令我震动不已。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想留在他身边，向他学习，透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萨莱点了点头。他自己的经历不同，没有那么光彩，却同样浓烈。

“我呢，我没有选择。或者说，是他选择了我。我当时十岁，在米兰的街头行窃为生。有一天，我趁他在广场上作画时，试图偷他的钱袋。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可他没有把我送去见卫兵，而是好奇地打量着我。「小魔鬼，」他对我说，「你手脚灵活，眼睛机灵。我要把你变成比一个盗贼更好的人。」于是他把我带在了身边。有好几年，我都令人难以忍受。我打碎一切，我依旧偷东西，我说谎。他本该把我赶走一百次了。可他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他责备我，然后原谅我。总是这样。”

“他爱你如同爱他的儿子。即便他从未说出口。”

“我知道。正因如此，为了保护他留下的一切，我愿意做任何事。即便要向国王的官员撒谎。即便要冒着坐牢，甚至更糟的风险。”

弗朗切斯科把手搭在萨莱的肩上。

“我们会一起去做这件事的。我们并不孤单。”

他们又在画室里度过了一个小时，追忆往事，有时落泪，有时也因回想起某些趣闻而发笑。达·芬奇曾有他的种种癖好，他的种种执念，他那突如其来的怒气，随后总跟着长长的忧郁时期。但他也曾慷慨、耐心，对一切都抱有无穷的好奇心。他们为之哀悼的，正是这样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位举世公认的天才，也是那位日日相伴、传授给他们远超艺术技法本身的同伴。

夜幕降临时，他们点起了几支蜡烛。阴影在画室的墙上舞动着，让钉着的图画仿佛有了生命，营造出一种师父仍在昏暗中工作的错觉。

“该睡了。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我们得开始整理画室，准备蒙科尔内会要求的文件。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休息好，保持清醒。我们不能容许因为疲惫而犯下错误。”

“你说得对。可我害怕我的梦。我害怕梦见师父责怪我们所做的事。”

“他不会责怪我们的。恰恰相反，若他能，他会感谢我们的。我们遵循了他的嘱咐，即便这嘱咐只是含蓄的。我们挽救了一切能挽救的东西。”

他们分开，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弗朗切斯科脱了衣服，钻进凉爽的被褥里。他的思绪仍在转动着，反复回想着他们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寻找着可能的破绽，预料着蒙科尔内可能提出的问题。

万一这位国库书记比他们以为的更精明呢？万一他察觉到画室布局中的某些不协调之处，某些他们夜间动手脚留下的痕迹呢？万一某个仆人那晚听到了什么动静，并向调查者提起了这个细节呢？

弗朗切斯科在床上翻了个身，试图找一个舒适的姿势。透过卧室的窗户，他望见了五月夜空中闪烁的星辰。

达·芬奇生前喜欢研究它们。他甚至造过一架小小的手工望远镜——如今与其他物件一同藏匿了起来——好近距离观测星辰。「星辰是遥远的太阳」，他曾这样断言。「而在这些太阳周围，也许正围绕着与我们的世界一样的其他世界，居住着与我们一样在思索同样问题的生灵。」

这个念头令弗朗切斯科感到宽慰。如今，师父已成为他曾如此热爱研究的那浩瀚宇宙的一部分。

弗朗切斯科终于睡去，被这样一种确信所抚慰：尽管冒着风险，尽管说着谎言，尽管表面上背叛了那位接纳过他们的国王，他们仍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翌日清晨，天刚破晓，他便早早醒来。他下楼到画室，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想拟一份个人的物件清单，一份他能呈给蒙科尔内的文件，用以证明自己的诚意，证明自己愿与官府配合的态度。

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拟定这份清单。

他心知肚明，在他们抽走了最珍贵的书页之前，卷册的数量本该更多。但仍留有四十二本笔记本。蒙科尔内不会怀疑其中缺了什么。

弗朗切斯科正在继续他的清单，萨莱端着一个托盘走进画室，托盘上放着面包、乳酪和葡萄酒。

“你已经在忙了？该吃东西了，弗朗切斯科。你要是不照顾好自己，是撑不住的。”

“你说得对。来，我们坐下吧。”

他们一同分享了这顿简朴的早餐，坐在窗边，望着克洛·吕斯庄园的花园随着春天的到来渐渐重新泛绿。

“你觉得蒙科尔内什么时候会来？”

“按国王所宣布的，是葬礼后的第三天。这还给我们留了一天。一天，用来做准备，用来完善我们的说法。”

“我们最后再来演练一遍。若蒙科尔内问起某封信中提到的某份手稿为何不见了，我们怎么回答？”

“就说师父把它借给了一位路过的学者。或者说他把它赠给了一位朋友。或者说他在一次造访城堡时把它带去了，之后再没拿回来。我们有好几种说得过去的说法，只需注意别自相矛盾。”

“那些不见的画作呢？”

“《丽达》，我们就说师父在一次追求完美的冲动中把它毁掉了。《施洗者圣约翰》……我们就说师父把它借给了国王本人，弗朗索瓦想拿去给他的宫廷看，如今它还在城堡里。是的，这很可信。国王不会否认——他甚至可能会很高兴得知自己又多得了一幅画。”

萨莱佩服地点了点头。

“你有当阴谋家的天赋。若你选的是从政而非从艺，你会成为一位令人生畏的王侯谋臣。”

“我并不为撒谎而骄傲。但有时，形势所迫。师父自己教导过我们：当自己比对手弱小时，当无法以力抗力时，就该运用计谋。”

他们在沉默中吃完了这顿饭，随后弗朗切斯科重新拾起他的清单，萨莱则着手清理整顿画室。当王室官员到来时，一切都必须无懈可击。不能有可疑的凌乱，不能留下暴露真相的痕迹。

最后一晚，他们在画室里久久未眠，最后一次审视着这个空间表面上的完整，趁它还未被国库的官员们支解之前。

“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无论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都会同心协力。我们绝不会相互背叛。我们会守护师父的遗产，直到最后。”

“我发誓。以师父的名义，以我心中一切神圣的东西起誓。”

他们握手，封存下他们这份秘密的盟约。随后他们去就寝，明知翌日将标志着他们考验的开始：欺骗国王的代表，演一出哀悼与配合的戏码，同时隐瞒着艺术史上最为大胆的一桩盗窃。

弗朗切斯科终于睡去，被一种奇异的安宁所抚慰。他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达·芬奇会予以认可的。而这，归根到底，才是最要紧的。

在这间空荡画室的黑暗中，《蒙娜丽莎》依旧微笑着，神秘而安详，静默地守护着克洛·吕斯庄园的全部秘密。

第二章：国王的密探

克洛·吕斯庄园，一五一九年五月五日，黎明

夜色即将结束。葬礼将在蒙科尔内完成他的差事之后，于翌日举行。在黎明前那片灰蒙蒙的微光中，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最后一次审视着这间重新布置过的画室。

萨莱出现了，面容因疲惫与焦虑而显得憔悴。他也几乎没怎么睡。

“一切都就绪了吗？”弗朗切斯科低声问道。

“是的。箱子都已封进墙里。我重新做了勾缝。就算搜查，也什么都找不到。”

“那些痕迹呢？新拌的灰浆呢？”

“我用煤烟和醋做旧了表面，就像师父教我们绘制壁画时那样。看上去这些墙壁仿佛已经好几年没人碰过了。”

“我去准备好宅子，迎接官员们。一切都必须显得正常。一户在服丧的人家，仅此而已。”

“我们得最后再对一遍我们的说辞。我们必须前后一致。哪怕一个细小的矛盾，都会让我们万劫不复。”

“又要来一遍？弗朗切斯科，我们已经排练了一整夜了！”

“这还不够。蒙科尔内不是个善茬。我听说他去年就以违反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为由，判了三个威尼斯商人的罪。他们最后都在市场广场上被绞死了。”

萨莱的脸色变得苍白。

“绞死？就因为藏匿了财产？”

“因为企图从王室那里窃取本该归其所有的东西。蒙科尔内就是这么看待此事的。在他眼里，我们是潜在的窃贼。”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反复演练着自己的说法。弗朗切斯科提出一些陷阱式的问题，萨莱作答，随后他们互换角色。每一个细节都被仔细推敲：日期，那些所谓馈赠的种种情况，他们将引用的那些虚构证人的姓名。

“若蒙科尔内问起为什么《施洗者圣约翰》不在这里？”弗朗切斯科问道。

“师父把它借给了国王本人，国王想拿去给他的宫廷看。这幅作品如今还在城堡里，”萨莱不假思索地答道。

“很好。但再加一个细节。就说这是为了克洛德王后的生辰。国王想给她一个惊喜。这会让这个说法更可信。”

“好。那《丽达》呢？”

“师父在他去世前几个星期，出于一种追求完美的冲动，把它毁掉了。他对它不满意。”

“不，等等。我们不如说，他是在图尔农枢机主教看过这幅画、并为此感到愤慨之后才毁掉它的。你知道那位枢机主教有多假正经。这样会更好解释达·芬奇为什么会毁掉一件这么珍贵的作品。”

弗朗切斯科点头表示赞同。

“太好了。你说得对。那些缺失的解剖学研究呢？”

“为感谢他的诊治，赠给了费尔内尔医生，还赠给了几位曾试图为师父治病的奥尔良医生。”

“再加上莱昂·德·帕维医生的名字。他来过两次。这就多了一个见证人。”

他们就这样继续着，打磨着每一个谎言，添上一些能让这套说辞更加令人信服的细节。

“若蒙科尔内坚持追问呢？若他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呢？”萨莱问道。

“那我就保持镇定。我们表现出真诚的愤慨。对抗指控的最好防御，就是反守为攻。记住师父说过的话：

「不惩罚恶行，就是纵容恶行」。我们要把这句箴言反过来用在他们身上。我们要指控他们亵渎一位伟人的名声。”

“你说得对。我们是清白的。我们没什么好隐瞒的。”

“正是如此。还要记住：绝不自相矛盾，绝不犹豫，始终直视对话者的眼睛。”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

“先生们，他们来了！”

那是玛蒂里娜，庄园的女管家，一位五十来岁、面容严厉却也不失善意的女人。

“我从塔楼上看到了他们的队伍。四个骑马的人和两辆大车。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到了。”

“谢谢你，玛蒂里娜。若有人问起你，你知道该怎么说吗？”

“我从来没进过师父的画室，只有你们两位才能进去。自他去世以来，你们一直在不停地祈祷，什么都没碰过。”

“很好。若有人问你是否有人来过？”

“只有医生和神父来过。没有别人。”

弗朗切斯科冲到窗边。在灰白的晨光中，他辨认出了那支正朝庄园缓缓行进的小队伍：四个骑马的人，后面跟着两辆由公牛拉的大车。

“他们来了，”他喃喃道。“就是现在了。”

萨莱走到他身边，来到窗前。他们一起看着渐渐靠近的王室官员。恐惧揪紧了他们的肠胃，但也夹杂着一种奇异的兴奋。他们即将上演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场戏。

“准备好了吗？”弗朗切斯科问道。

“没有。可我别无选择。”

“我们谁都没有选择。记住：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师父，为了他的遗产，为了全人类。走吧。”

弗朗切斯科迈着他刻意想显得庄重的步伐走下石阶。萨莱跟在他身后，摆出一副忠仆而非同谋的姿态。

在门厅里，弗朗切斯科花了片刻功夫，摆出一副恰当的表情。既不能太颓丧，那会显得可疑；也不能太安然，那会显得对死者不敬。他选择了一种带着哀悼之情的庄重。

玛蒂里娜已在门厅里布置好了蜡烛，并在门上挂上了黑色的丧纱。这些细节营造出一种服丧人家的氛围，强化了他们布置的这场戏的真实感。

叩门声传来，带着一种不容拖延的权威。弗朗切斯科等了几秒钟——不能太久，以免显得漫不经心；也不能太快，以免显得焦虑——随后才开了门。

艾蒂安·德洛因斯先生站在门口，一身黑色王室公证人长袍，威严逼人。这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男子，四十年的法律实践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透过铁框眼镜，带着那种惯于登录人间悲剧、却不为之动容的中立神情。他挎着一只用旧的皮制公文袋，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文件。

在他身后，弗朗切斯科认出了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国库司的这位书记竟亲自前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

是一位正当壮年的男子，也许四十五岁，同样身着黑衣，但那黑色更为苛严，几近于苦修士的黑色。他棱角分明的面容上，带着那种以揭发欺诈为业者特有的警觉神情。

在他们身边站着巴泰勒米·卢梭，市政法院的书记官，负责为这份清单做正式的誊录。他比他的同僚们年轻，大概三十岁左右，已然透着那些一生俯身抄录卷宗的书吏所特有的驼背之态。他那沾着墨渍的手指，攥着一只装有他书写用具的公文袋。

两名武装士官凑齐了这一队人，都是身材壮实、手掌宽大、惯于搬运没收物件的男子。其中一人，一个满脸红须的红发彪形大汉，腰间挂着一柄狼牙棒。另一人则瘦削些，眼神冷漠，一看便是当过兵的人。他们退在一旁，等候着命令。

“梅尔齐先生，”公证人肃穆地摘下帽子，宣布道，“我们前来，是依照王室的敕令，以及这个王国自古以来的惯例，对已故达·芬奇——国王的画师——于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在此庄园逝世后所留下的财产，进行清点造册。愿全能的天主怜悯他的灵魂，赐予他义人所应得的永恒安宁。”

这套仪式性的措辞，以那些惯于官方庆典的法律界人士特有的完美措辞脱口而出。弗朗切斯科低下头，从容地作答，把自己的声音调整到恰到好处的、内敛的悲伤。

“欢迎光临，先生们，我们敬爱的师父曾在这座宅邸中如此安宁地度过日子。请进吧。愿您的公务依照天主的旨意与法兰西王国的法律得以完成。自我们敬爱的师父咽下最后一口气以来，一切都保持着原样。”

官员们走进了门厅。尽管德洛因斯已经办理过数十次类似的清点，这一次却别具分量。达·芬奇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人——他是全欧洲最负盛名的画家。

但蒙科尔内却毫无动容之色。他的双眼已经在扫视着门厅，记下每一处细节，每一件贵重物品。他的目光在一幅挂在墙上的画作上停留了片刻——那是达·芬奇让他一位米兰弟子绘制的一幅《最后的晚餐》摹本。

“这件作品也算在清单之内吗？”他冷冷地问道。

“这是一幅摹本，先生，出自乔瓦尼·彼得罗·里佐利之手。它属于这座庄园，不属于师父。”

蒙科尔内走近，端详着角落里的签名。

“我们会核实的。凡是经过你们师父之手的一切，我们都感兴趣。”

“梅尔齐先生，”那位书记甚至还未跨进画室的门槛便插话道，“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必须提出来。自你们师父去世以来，可有人进过他的画室？可有任何东西被挪动过，哪怕出于世间最善意的用心？”

这个问题是直白的，甚至可以说是阴险的。弗朗切斯科早已预料到了，但听到它被如此直接地说出口，仍令他吃了一惊。他摆出了一副义愤与悲伤交织的神情。

“蒙科尔内先生，您怎么敢暗示，我们碰过师父的遗物，因而亵渎了他的名声？”

他让自己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摆出一副受了冒犯的语气：

“自他去世以来，萨莱和我只是遵照神圣天主教會的仪轨，为他的灵魂祈祷，为他的遗体守灵。安托万神父可以为此作证，他从未离开过灵堂。我们什么都没有碰

过，甚至不敢擅自进入画室，除非是去他创造种种奇迹的那个地方虔诚祈祷。”

弗朗切斯科故意让一阵受了冒犯的沉默悬在空中，随后才补充道：

“我们的师父教会了我们一切。十多年来，他待我们如同亲生儿子。我们怎么会在他刚刚辞世的这个时刻，就以那些卑劣的盗墓贼一般的行径来玷污他的名声呢？光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对我们的忠诚、我们的孝爱之情、我们对这位塑造了我们的天才的敬意的严重侮辱。”

萨莱已经领会了该采取的语气，以一种被情感摧折的声音补充道，泪水在他眼中泛起——那是真实的泪水，因为疲惫与神经的紧张，泪水本就快要涌上来了：

“您无法理解师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引路人，我们活着的理由。这间画室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在提醒我们他的存在，而这份不再，就像一把匕首插在我们心口。我们又怎么可能玷污他天才留下的这些神圣遗物呢？”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破碎了。那份情感如此真挚，甚至连蒙科尔内也一时显得有些动摇。

书记眯起了眼睛，对这套他在职业生涯中已听过千百遍的清白之词并不完全信服。他拿出一本小笔记本，开始记录起来。

“梅尔齐先生，容我再坚持一下。我希望您明白，我的这个问题并非指控，而是一道必要的手续。我见过太多好意的继承人，想在正式清点之前 / 保存 / 某些遗物。这样做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我理解您的职责，先生，”弗朗切斯科的语气稍稍软化下来，答道。“但我以我的名誉，以我灵魂的救赎向您担保，一切都未曾被碰过。何况，您可以询问仆人们。

我们的女管家玛蒂里娜可以作证，我们只不过是进去又出来，为的是祈祷。”

蒙科尔内转向恭敬地站在一角的玛蒂里娜。

“妇人，上前来。”

玛蒂里娜走上前来，垂着眼帘，正如一个女仆面对王室官员应有的举止。

“你是？”

“玛蒂里娜·加莱拉尼，这座宅邸的女管家，六年了，大人。”

“自师父去世以来，你可见过这两位先生进过画室？”

“见过，大人。只是为了祈祷。他们跪在放着这位微笑夫人肖像的画架前，念诵天主经与圣母经，随后哭着出来。我从未见过他们碰过任何东西。”

“你确定吗？”

“我以圣母玛利亚和所有的圣徒起誓，大人。我亲自留意，没让任何人亵渎这个神圣的地方。师父是一位圣洁的人，即便他是个外国人。他值得受到尊重。”

公证人以他更高的位阶所赋予的权威插话道：

“好了，蒙科尔内先生，我们且稍稍收敛一下热忱吧。别把我们本已棘手的差事弄得更复杂。这两个年轻人显然被失去师父的悲痛所击垮。若对他们施以毫无根据的怀疑，那将是不不得体的，甚至是残忍的。让我们按照陛下的旨意进行清点吧。若有任何不规之处，事实自会说话。”

蒙科尔内不悦地噘着嘴，收起了他的笔记本。

“好吧。但请你们明白，先生们，若我们发现任何一丝掩藏的企图，后果将是可怕的。窃取本应依异邦人财产

没收权归属王室的财产，是要处以极刑的。绞刑架在等着欺诈者。”

“我们无惧真相，”弗朗切斯科迎着书记的目光答道。

公证人转向梅尔齐，神情变得更为和善：

“请带我们去您已故师父的画室吧。天色渐亮，我们的差事会很漫长。我听说达·芬奇先生拥有数以百计的作品与手稿。”

“确实如此，先生。我的师父从不停止创造、发明、完善。请随我来。”

弗朗切斯科朝着通往二楼的巍峨楼梯走去。石阶经三年来的往来已被磨得光滑，在他们脚下发出回响。官员们随即以一种庄重的队列跟在他身后。

弗朗切斯科听见身后书记官羽毛笔的沙沙声，他已经在做起初步的记录了，大概是描述着门厅与他们经过的房间。他还听见德洛因斯气喘吁吁的声音，这位体态臃肿的男子，爬楼梯对他而言是不小的负担。而尤其是，他感觉到蒙科尔内的存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不停地审视着每一个角落，每一幅画作，每一件家具。

走到楼梯半途，书记停在一个壁龛前，那里陈列着一尊表现昂首腾跃之马的青铜小雕像。

“这个也算在清单之内吗？”

“不，先生。这尊雕像属于这座庄园。国王把这座宅邸赐给我师父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里了。”

蒙科尔内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件物品，寻找着一个签名，一个特有的标记。

“我们会核实的。记下来，卢梭。”

书记官迅速在他的记事板上潦草记下。

弗朗切斯科感到紧张感在升高。若蒙科尔内如此审视每一件物品，这次清点将持续好几天。得转移他的注意力，用重要的物件来打动他，让他把心思集中在那些主要的作品上。

“先生们，容我在我们踏入我师父创造出这些不朽杰作的圣殿之前，先说几句话。”

他在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迫使队伍不得不停步。

“达·芬奇不是一个寻常人。他的天才超越了人类心智所能想象的一切。在我们即将踏入的这间画室里，他不仅绘制出美得超凡脱俗的画作，还进行了一些有朝一日将彻底颠覆我们对这个世界之理解的科学研究。”

弗朗切斯科让自己的话语在楼梯间回荡了片刻，随后继续说道：

“他构想出能够载人升空的飞行器械。他破解了水流与山脉形成的奥秘。他发明了令人生畏的战争机械，活动桥梁，攻城战车，完善的火炮。”

德洛因斯听得津津有味。就连蒙科尔内也不由得显出了几分兴趣。

“但尤为重要的是，”弗朗切斯科继续说道，“他彻底革新了绘画的艺术。他发明了在他之前无人敢于设想的技法。晕涂法，赋予他的肖像画那种非凡的生命力。空气透视法，在他的风景画中营造出无限的纵深。他笔下人物完美的解剖结构，是他多年研究尸体的成果。”

他转向蒙科尔内：

“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您明白，您即将看到的，并非仅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的收藏。这是一个人将其全部生命奉献于理解自然与艺术之奥秘的宝藏。我恳求您

以这些作品应得的敬意去对待它们。这些是自古以来人类所知最伟大的天才留下的最后见证。”

这番申诉，是在夜里准备好的，旨在达成双重目的。一方面，提醒官员们即将没收之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将弗朗切斯科本人塑造成这份遗产的正当守护者，一个懂得这些作品价值的人。

公证人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

“请放心，我们深知我们即将清点之物在历史与艺术上的重要意义。陛下本人已下令，务必采取最大的谨慎。事实上，国王亲自嘱咐我，要确保不使任何东西受损。”

然而，蒙科尔内还是忍不住以一种冷淡的语气补充道：

“在尊重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仍须以严谨与精确履行我们的法律职责。王国的法律适用于艺术品，正如适用于其他任何财产一样。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不允许任何例外，即便是对一位天才。”

“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弗朗切斯科苦涩地重复道。“这条能让外国人在死后被剥夺其财产的权利。我的师父为法兰西效力了三年，他以他的天才丰富了这个王国，而这，便是他得到的回报。”

“这是法律，”蒙科尔内反驳道。“一条保护王国利益的公正的法律。您的师父本可以申请归化信函。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或者是他对你们那些复杂法律的无知。我的师父是个艺术家，不是个法学家。”

“人尽皆知，不知法不能成为借口。”

萨莱开口说道：

“我的师父认为，天才是没有国籍的，艺术属于全人类！他自认是世界的公民！”

“好一番哲学，”蒙科尔内讥讽道，“可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不是活在艺术家的梦境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有法律，有国界，有国籍。”

公证人抬起手示意大家平息情绪：

“先生们，这场争论毫无意义。我们来此不是为了讨论哲学或正义，而是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梅尔齐先生，请带我们去画室吧。”

弗朗切斯科点了点头，重新拾级而上。再走几步，他们便到达了画室的门前。弗朗切斯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就是现在了。真相大白的时刻。

他把手放在锻铁门闩上，细细品味着这最后的、混乱降临之前的时刻。

“这便是艺术圣殿的门槛。我们的师父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不倦地创作，不断地探索，力图揭开自然的重重奥秘。在他不再在场的情况下踏入这间画室……这是对一座圣殿的亵渎。”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微微破碎。这份情感并非做作——他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份亵渎。

“我们理解您的悲痛，”德洛因斯以一种真挚的同情说道。“但职责所在，我们必须履行。”

弗朗切斯科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推开了门，门轴发出的吱嘎声——那是他故意不上油以增强这份戏剧效果的——晨光尚还微弱，却渐渐增强，洒进这间宽敞的屋子，展现出弗朗切斯科与萨莱精心布置的这一幕景象。

公证人在门槛前戛然止步。他的嘴张开了，双眼瞪大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一动不动，被眼前所见之美所震慑。

“天主圣母啊，”他喃喃道。

因为弗朗切斯科与萨莱在这个可怕的夜晚创造出来的，确实是一座殿堂。晨曦斜射的光线穿过高大的窗户，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柔和抚触着这些作品。画作的布置，光线的角度，一切都经过精心计算，以求达到视觉冲击的最大化。

这场光影布局的中心，端坐着《蒙娜丽莎》，安置在主窗旁的画架上，正是达·芬奇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喜爱凝视她的那个位置。那层平日护着她的、绣着金线的紫红色丝绸帷幔已被撤去——这是一个为增强这幅初见景象所带来情感冲击而设的细节。

而这份冲击是彻底的。蒙娜丽莎的肖像，在黎明斜射的光线映照下，仿佛有了生命。她那神秘的微笑，仿佛就要绽放开来。她的双眼，仿佛在追随着来访者的动作。她那双叠放在一起、带着唯有达·芬奇才能表现出的无限优雅的手，仿佛就要动起来。

德洛因斯在这幅画前久久伫立，出神到公文袋几乎从他肩上滑落。他的嘴唇颤抖着。

“原来这就是这位神秘的夫人，整个宫廷多年来都在议论她啊！这份令人不安的美，激发出了那么多的诗篇与歌谣！我从未见过如此精湛的绘画技艺！”

即便是蒙科尔内，尽管他一贯冷嘲热讽，也无法完全掩饰他的惊叹。他缓缓走近，仿佛被一股磁力吸引一般。

“非凡，”他不情愿地承认道。“难怪陛下如此看重这件作品。”

书记官卢梭张大了嘴，手中的笔滑落下来。他慌忙俯身去捡，为自己的笨拙而涨红了脸。

“请原谅，我……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德洛因斯又靠近了些，不敢触碰这幅画，却弯下腰去观察其中的细节。他的呼吸在光滑的表面上凝成一层薄雾，他慌忙后退。

“请原谅。我不该靠得这么近。可我实在情不自禁。这怎么可能？一个人怎能仅凭颜料与油彩，捕捉到生命本身？”

尽管神经紧绷，弗朗切斯科还是忍不住对这位老公证人真挚的动容露出了微笑。他走近前来，以一种热情向导的口吻说道：

“我师父说过，真正的艺术不在于对自然的亦步亦趋的临摹，而在于以比自然本身更真实、更深刻的方式重新创造它。请看这目光，先生们。看看这双眼睛不仅仅是画上去的，而是有生命的。师父运用了一种革命性的技法：好几层透明的釉彩层层叠加，每一层都增添一分色调，一分深度，直到营造出这份生命的幻觉。”

他轻轻地指向那张脸庞：

“请看阴影与光亮之间的这些过渡。没有一条生硬的线条，没有一处分明的轮廓。一切都融化在一层微妙的薄雾之中。这项技法花费了数月的功夫。师父有时会敷上一层薄到几乎看不见的釉彩，等它干透，再敷上另一层。有些部位叠加了三十多层。”

萨莱也走上前来，被这份情感所感染：

“还有这个微笑！仔细看看它。她是快乐的吗？忧郁的吗？还是带着一丝嘲讽？说不清楚。师父捕捉到了人类

灵魂本身的这份暧昧。他曾说过：「一个微笑，可以包含世间全部的欢乐与全部的悲伤」。”

“还有这双手，”弗朗切斯科指着它们补充道。“看看这份表面上的简朴，实则是数百幅预备习作的成果。我师父画了六十多种不同的手，才找到了这一双。六十多种啊！而对大多数画家来说，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时就打发过去了！”

蒙科尔内重新拾起他专业人士的神智，拿出了他的笔记本：

“这位夫人是谁？师父可留下了关于她身份的任何线索？”

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正是他们排练过的问题之一。

“师父只是简单地称她为「丽萨夫人」，”弗朗切斯科答道。“他把她的身份保守秘密。有人说她是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幅理想化的肖像，是师父所观察过的一切女性之美的综合体。”

“我师父说过，她的身份并不重要，”萨莱补充道。“重要的是她所代表的东西：永恒的女性，美的奥秘，人类存在的谜题。”

公证人点了点头。他转向陈列在画室里的其他作品。

“所有这些奇迹……凝聚了多少年的心血？”

“一生的心血，先生，”弗朗切斯科答道。“我师父十四岁时便在佛罗伦萨的委罗基奥画室开始学画。他去世时六十七岁。半个多世纪，都献给了艺术与科学。”

蒙科尔内已离开了《蒙娜丽莎》，去审视画室中的其余部分。他那训练有素的眼睛记录着每一处细节：作品的

摆放，空间的布置，桌上丢弃的工具。他停在一排挂在墙上的图画前——那些是弗朗切斯科故意留下让人看见的，最不具颠覆性的那些。

“这些图画……看上去像是解剖学习作。”

“确实如此，”弗朗切斯科证实道。“我师父曾获得授权，在佛罗伦萨的新圣母医院解剖尸体，此后又在国王的允许下于此地继续这项工作。他想理解人体的运作机制，以便在他的作品中更好地表现它。”

“既令人着迷，又令人不适，”书记评论道。“您的师父不担心宗教裁判所吗？解剖人体……”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早在一四八二年便已授权出于科学目的的解剖，”弗朗切斯科提醒道。“我师父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他只是想揭示天主的造化之功。”

萨莱热切地补充道：

“他说，人体是全能的天主所创造的最美的机器。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自身的美。他常常整夜地画着他白天所观察到的东西。”

正在桌上准备他的用具的书记官卢梭，怯生生地开口道：

“我听说达·芬奇先生还为米兰公爵设计了战争机械。这是真的吗？”

“确实如此，”弗朗切斯科答道。“我师父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效力了十七年。他设计过防御工事、火炮、攻城战车。但他厌恶战争。他制造这些机械纯粹是出于生计所迫。他的心，全在艺术与纯粹的科学中。”

“战争机械，”蒙科尔内饶有兴趣地重复道。“这间画室里，可有这些发明的图纸？”

弗朗切斯科察觉到了危险。得转移这位书记的注意力。
“只有几幅无关紧要的草图，先生。他大部分的军事图纸都留在米兰了。我们这里有的，主要是他和平的研究：关于鸟类飞行的研究，钟表机构，用于灌溉的水利系统。”

他指着架子上一摞笔记本——那些是他们留下让人看见的：

“这些笔记本记录着他对自然的观察。我师父深信，人类有朝一日能够飞翔。他设计过数十种飞行器械，都基于对鸟类与蝙蝠翅膀的细致观察。”

“像鸟一样飞翔……多么壮丽的疯狂啊！您的师父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先生。他甚至制作过好几个原型。若您稍后想看，其中一个就放在库房里。一台带有帆布与木制翅膀的大型机器，由踏板驱动。他从未成功让它飞起来，但他坚信，有朝一日，人类将征服天空。”

“亵渎神明！”那两名士官中的一个，那个红发彪形大汉，忽然喊道。“只有天使才有权飞翔！想要模仿天使，就是在挑战天主！”

弗朗切斯科平静地转向他：

“我师父并非想挑战天主，而是想理解祂的创造。他说过：「*理解自然的法则，就是理解天主的思想*」。他把科学看作一种祈祷的形式，一种通过研究造物主的作品而向祂致敬的方式。”

那位士官嘟囔了几句，但没再坚持。蒙科尔内则继续着他的检查。他打开了一只箱子，检视其中的物品——画笔、颜料、油瓶。

“所有这些材料都算在清单之内，”他宣布道。“就连画笔和颜料也不例外。凡属于这位异邦人之物，都归属于王室。”

“就连他的衣服也算吗？”萨莱苦涩地问道。“就连他的鞋子？”

“一切，”书记肯定道。“法律很明确。”

他转向公证人：

“德洛因斯先生，我建议我们开始系统性地清点了。要把一切都编目造册，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公证人点了点头，从他那只鼓鼓囊囊的公文袋中取出一把带刻度的木尺和一根用来精确测量尺寸的打结绳。他再次走近《蒙娜丽莎》。

“就从这件奇迹开始吧。卢梭，你准备好了吗？”

书记官在桌上铺开他当天早晨才削好的鹅毛笔，几种颜色的墨水——黑色用于正文，红色用于标题，蓝色用于旁注——以及几张质地上乘的羊皮纸。

“听候吩咐。我的用具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稍等。在你们开始之前，我可以请求一件事吗？”

蒙科尔内皱起了眉头：

“什么请求？”

“请容我在每件作品被登记造册、被带走之前，在它面前作最后一次祈祷。这是……这是我道别的方式。”

公证人被这个请求打动了：

“当然可以，我的孩子。请慢慢来。”

弗朗切斯科在《蒙娜丽莎》前跪下，双手合十。但他并未祈祷，而是把这幅画的每一处细节都铭刻进自己的记

忆之中，深知自己此后大概再也见不到它了。泪水滑落在他的脸颊上——这一次，是真实的泪水。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站起身来：

“谢谢。你们可以开始了。”

公证人清了清嗓子，开始用洪亮而正式的声音口述起来……

“已故达·芬奇——佛罗伦萨公民，画家，法兰西国王陛下的工程师暨建筑师——于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在克洛·吕斯庄园去世后所留遗产之清单。本清单编制于该年五月五日，由王室公证人艾蒂安·德洛因斯先生主持，国库司首席书记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先生协助，昂布瓦兹市政法院书记官巴泰勒米·卢梭先生誊录。”

书记官埋头认真誊录，羽毛笔在羊皮纸上摩挲，室内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他以一手娴熟的公文体字迹书写着清晰的字母，那是二十年练习的结晶。

“同时在场者，”公证人继续道，“还有死者的门生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以及该死者的仆从暨门生、绰号「萨莱」的吉安·贾科莫·卡普罗蒂先生。王室士官皮埃尔·莫尔坦与雅克·杜布瓦协助本次行动。”

蒙科尔内已经不耐烦了：

“这些手续真有必要吗？我们都知道彼此是谁。”

“法律要求一切都必须登记在案，”德洛因斯反驳道。

“一份不完整的清单可能会遭到质疑。我们继续吧。第一项。一幅贵重画作，绘一位夫人端坐于扶手椅中……”

他取出他的尺子，开始细致地测量：

“……尺寸中等——高恰好两尺六寸三分，宽一尺九寸二分——绘于意大利黑杨木木板之上，厚约三指有余，

约合一寸半，镶嵌于一个宽约一掌的贴金画框之中，该画框饰以雕花线脚，图案为忍冬草叶纹与百合花交缠的植物纹样。”

书记官难以跟上口述的节奏：

“先生，能否请您重复一遍尺寸？”

“高两尺六寸三分。宽一尺九寸二分。还要记下，这块木板略微弯曲，大概是木料年久所致。”

他仔细端详着这幅画，把脸凑近去观察细节：

“画中的夫人身着一件华贵的黑色织锦丝绸长袍，袖子为深绿色天鹅绒。一层透明轻盈的丝绸薄纱环绕着她的脸庞，垂落在她的双肩。她那栗色带着金色光泽的头发，按照佛罗伦萨的时尚在正中分开。她未佩戴任何可见的首饰。”

蒙科尔内也走了过来：

“也要记下保存状况。可有任何损伤？”

德洛因斯仔细审视着画面：

“作品保存状况极佳。暗部有一些浅表的龟裂，在长袍处尤为可见。清漆略有些泛黄。但总体而言，保存状态极为出色。”

“这要归功于师父的悉心照料。他每天都检查他作品的状况。他研制出一种特殊的清漆，以乳香树脂与核桃油为基础，既能保护画面，又能让它「呼吸」。”

“卢梭，记下这条关于清漆的信息。这对未来的保存工作可能有用。”

书记官点了点头，用蓝色墨水添了一条旁注。

忽然，蒙科尔内提出了一个令弗朗切斯科心惊的观察：

“等等。这幅画一直放在这个位置吗？我注意到画架周围的灰尘形成了一种不寻常的图案。看上去它最近被挪动过。”

弗朗切斯科感到心跳加速，但保持了镇定：

“我确实两天前挪动过这个画架，先生。师父去世后，我把它转向东方，好让晨光照在丽萨夫人的脸上，伴随我们祈祷。这是……这是我向她致敬的方式。晨曦洒在她脸上……仿佛她也在与我们一同为师父哭泣。”

这番解释似乎让书记满意了，不过他还是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条信息。

清点继续进行。公证人转向下一幅画作：

“第二项。一幅大幅画作，绘圣母玛利亚之母圣安妮，以及圣母玛利亚本人，还有正与一只羊羔玩耍的圣婴耶稣，整个场景置于一片岩石地貌之中，远处可见蓝色的群山……”

他一丝不苟地测量着：

“……绘于一块尺寸颇大的杨木板上——高恰好四尺二寸，宽三尺一寸——但师父之手未曾将其完成。某些部分，尤其是圣安妮和圣母的脸庞，已经完工得极为精细，而另一些部分，尤其是那只羊羔和右边的风景，则仅仅只是勾勒了草图。”

弗朗切斯科忍不住插话道：

“这幅画耗费了我师父近十二年的心血。他从未对它感到完全满意过。他说，在一幅构图中表现三代圣洁人物，是他毕生事业中最大的挑战。”

“他为什么从未完成它呢？”卢梭问道。

“因为他的构想一直在变化。每当他以为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时，一个新的想法便会浮现。他至少重画了圣

安妮的脸六次。仔细看，在现在的颜料层下面，还能看到之前几次构图的痕迹。”

德洛因斯俯下身来，果然，在颜料层下方隐约可辨一些模糊的轮廓：

“太不可思议了！仿佛好几幅画叠在了一起！卢梭，记下：「作品可透过表层隐约看见多处修改痕迹」。”

清点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幅接着一幅画，一张接着一张图纸，每件作品都被测量、被描述、被估值。太阳在天空中升高，光线在画室的地面上缓缓移动。

近上午十时，正当他们清点着一系列年轻女子肖像时，蒙科尔内忽然在一面墙前停下脚步，那里明显可见几块颜色较浅的矩形痕迹。

“这是什么？”他指着这些痕迹问道。“看上去像是最近有画作被摘下来过。”

弗朗切斯科早已准备好了他的回答：

“这些是我师父在病中赠出的作品曾经悬挂的位置，先生。他想要感谢那些照料他、安慰他的人。”

“具体是哪些作品呢？”

“主要是一些习作。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赠给了为他送来圣事的安托万神父。一幅手部习作赠给了费尔内尔医生。一幅老人头像赠给了常来与他探讨神学的布里索内教士。”

蒙科尔内走近那面墙：

“这些痕迹看起来很新。色差极其细微。这些画作被摘下来大概不过是几天前的事。”

“大约两个星期前，先生。那是费尔内尔医生最后一次来访的时候。我师父，在一个神志清醒的时刻，坚持要把这幅手部习作赠给他，以感谢他的诊治。”

“您有这些赠予的见证人吗？”

“受赠人本人，自然就是见证人。您可以去询问他们。”

书记把这些名字记在了他的笔记本里：

“我们会去问的，您放心。我们继续吧。”

他们转向了手稿部分。几张桌子上堆满了成摞的册子和笔记本。德洛因斯拿起一本，小心翼翼地打开：

“我的天主啊！”他惊呼道。“这字……是反着写的！”

“我师父以镜像文字书写，”弗朗切斯科解释道。“从右往左。要读懂他的笔记，得用一面镜子，或者学会破译这种反向的字迹。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的秘密，一方面也是左撇子的习惯。”

“他是左撇子？”卢梭惊讶道。

“世上最有名的左撇子，”萨莱证实道。“他用左手绘图，作画，写字。他说这是天主的恩赐，让他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蒙科尔内翻阅着一本册子，试图破译那反向的字迹：

“这些手稿里究竟记载着什么？”

弗朗切斯科字斟句酌：

“关于自然的观察，哲学思考，数学研究，透视学研究。我师父把一切令他感兴趣的事物都记录下来。您看，比如这里……”

他拿起一本无害的册子，翻到画满花卉图画的一页：

“植物学研究。师父常常在花园里花上数小时，描绘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他说，理解一朵花的结构，就是理解美的构造。”

“那这些图表呢？”书记指着画满复杂几何图形的一页问道。

“关于比例的研究。我师父在寻找支配视觉和谐的数学关系。黄金比例，依维特鲁威所定的人体理想比例.....”

德洛因斯开始口述：

“第十项。一批装订与未装订的手稿，均以死者本人的镜像字迹写就.....”

他着手清点这些卷册：

“我数出.....十二本大开本的四开本册子，装订以红色科尔多瓦皮革.....二十三本八开本笔记本，装订以羊皮纸.....以及约二百张大小不一的散页。”

“就这些吗？”蒙科尔内忽然说道。“对一个工作了五十年的人来说，这似乎太少了。”

书记已猜到了他们布置的这场戏。

“我师父非常挑剔，”他努力保持镇定地答道。“他常常销毁他认为不够完美的习作。而且，他的许多笔记留在了意大利，留在他曾效力过的那些宫廷里。”

“他在病中没有赠出过这些手稿吗？”蒙科尔内追问道。

“赠过，有几本。一部关于透视的论著，赠给了敬慕他的国王画师让·佩雷亚尔。几份水利研究，赠给了王室工程师皮埃尔·德·纳瓦尔。几份关于防御工事的研究，寄给了拉帕利斯元帅。”

书记记下了这些名字，脸上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

“好一份突如其来的慷慨！您的师父在短短几周内散尽了他一半的作品！”

萨莱愤慨道：

“他希望自己的学识能有所用处！这有那么难理解吗？”

“难以理解的，”蒙科尔内反驳道，“是他为何没有立下一份正式的遗嘱来遗赠这些财产。为什么要这些非正式的馈赠？”

“他太虚弱了，写不了字，”弗朗切斯科解释道。“瘫痪已经蔓延到了他的右手。他只能口头下达指示。”

“方便，真是方便得很，”书记喃喃道。

画室里的紧张气氛已经变得可以触摸得到。德洛因斯察觉到气氛正在恶化，插话道：

“先生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吧。时间在流逝，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清点呢。”

他们转向了科学仪器。弗朗切斯科早已精心挑选好了该留下可见的：几副圆规，几把角尺，一个浑天仪，几片玻璃透镜，几面镜子。

“第二十项。一批数学与光学仪器……”

蒙科尔内端详着一片凸透镜：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我师父研究光的特性。他用这些透镜来理解人眼是如何感知图像的。这对他的透视技法至关重要。”

“那这个奇怪的装置呢？”书记指着一个由齿轮与弹簧组成的复杂构件问道。

弗朗切斯科尽管紧张，还是笑了：

“他的一项发明。一具计程器，用来测量行走的距离。这些轮子按照一个精确的比率转动，这个刻度盘就能显示出距离。他是为军事工程师设计的。”

“真是巧妙，”德洛因斯赞叹道。“您的师父真是一位全才。”

“也许太全面了些，”蒙科尔内评论道。“一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人，到头来往往往什么都不精通。”

“恰恰相反！”萨莱激烈地反驳道。“正因为他懂得一切，才在一切上都出类拔萃！他对解剖学的知识提升了他的绘画。他对水利学的研究帮助他理解衣褶的动态。在他的心智中，一切都是相通的！”

清点延续了下去。近正午时分，玛蒂里娜端来了面包和乳酪。官员们暂作歇息，但弗朗切斯科几乎什么也咽不下去，焦虑揪紧了他的胃……

下午，气氛变得更加沉重。蒙科尔内在休息期间一直在审阅他的笔记，此刻带着一种重新振作起来的决心归来。他朝着一只他先前注意到的、藏在一堆画布后面的贵重木匣走去。

“这匣子里是什么？”他一边把它提起来一边问道。

弗朗切斯科僵住了。他把这个小匣子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是师父的私人文件。信函，一些行政文件。”

“打开它。”

弗朗切斯科转动钥匙的手微微颤抖着。匣子里果然装着一些信件，合同，收据。蒙科尔内急切地抓过来。

“我们看看……阿拉贡枢机主教的信……费拉拉公爵的信……曼图亚侯爵的信……啊，这里有点意思了！”

他扬起一封信，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一封写于今年三月的信，也就是师父去世前两个月。来自一位名叫奥塔维亚诺·马拉泰斯塔的威尼斯艺术商人。”

他大声读了起来：

“「尊敬的达·芬奇大师，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路易吉·蓬皮那里得知，您画室中藏有一幅美得非凡的《施

洗者圣约翰》，以及一幅以其异教感官魅力令卫道之士震怒的《丽达与天鹅》。我极愿为我的私人收藏购得这两件作品，并愿开出一个慷慨的价钱。三千枚杜卡特金币购《圣约翰》，两千枚杜卡特购《丽达》。这是一个鲜有艺术家会拒绝的可观出价」。”

书记抬起眼来，目光锐利地盯着弗朗切斯科：

“那么？这封仅仅两个月前的信中提到的《施洗者圣约翰》和《丽达与天鹅》，如今在哪里？我们为何在清单中没有见到它们？”

弗朗切斯科强迫自己平静地呼吸，随后以一种他内心远未感受到的镇定答道：

“《施洗者圣约翰》三个星期前被我师父借给了国王弗朗索瓦陛下本人，就在他的病情彻底恶化之前不久。国王想将它展示给正来访宫廷的英格兰大使，以证明法兰西拥有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幅作品因此现存于王城，在国王的私人寝宫中。您可以向内侍们求证。”

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让国王本人成为这件失踪作品的持有人。蒙科尔内若不直接向王室的官员求证，是无法轻易核实这一说法的。

“国王竟然借走了这件作品？”

“「借走」这个词不太准确，”萨莱答道。“陛下表达了想要欣赏《施洗者圣约翰》的意愿，我师父怎能拒绝国王呢。那正是二十三天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个星期天，弥撒之后。两名王室卫兵用一副软垫轿子把画抬走了。”

蒙科尔内记下了这些信息，显然因无法立即核实而感到不悦。

“那这幅《丽达与天鹅》呢？”

弗朗切斯科摆出一副痛苦的神情：

“啊，《丽达》……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先生。我师父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在一阵艺术家的愤怒之下，亲手毁掉了它。”

“毁掉了？一件价值两千枚杜卡特金币的作品？”

“对我师父来说，一旦涉及他的艺术，金钱毫无意义。他对肌肤的表现效果不满意，觉得这幅构图的官能之美流于粗俗，而非纯粹的美。一天夜里，图尔农枢机主教来访，对丽达的裸体感到愤慨之后，我师父勃然大怒。”

萨莱接过话头，添上一些细节，好让这个故事更为可信：

“我记得那一夜。是四月三日，深夜。师父当时极为激动。枢机主教的来访深深伤害了他。他不停地重复说：
*「这个丽达不是我想要的丽达。这不过是对我本想创造之物的一种拙劣模仿。枢机主教说得对，这是粗俗的，这是猥亵的！我成了一个好色的老糊涂！」*我们试图阻止他，但他抓起一把刀，猛烈地划破了画布。”

弗朗切斯科接着说道：

那些画布的碎片就在这个壁炉里被烧掉了。我曾试图挽救几个碎片，但师父命令我全部销毁。*「一丝痕迹都不能留下，弗朗切斯科，这可憎之物的一丝痕迹都不能留下！」*他喊道。那……那真是骇人，眼看着这样一位天才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

“真是……方便得出奇，”蒙科尔内以一种怀疑的口吻评论道。“一件在近期信函中被提到的珍贵作品，恰好在清点之前被毁掉了。而另一件则恰好在城堡里，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外。”

“真相往往不如谎言那样方便，先生，”弗朗切斯科带着一丝讥讽反驳道。“若我们真想隐瞒这些作品，我们又怎会把马拉泰斯塔的这封信留在匣子里呢？”

这个论点起了作用。蒙科尔内皱起了眉头，承认了这番话的逻辑。

公证人感觉局面正变得剑拔弩张，插话道：

“我们会记下这些解释。若陛下确实持有《施洗者圣约翰》，这件作品自然会被列入死者财产的总清单之中。至于那幅被毁的《丽达》，我们无法为已不存在之物登记造册。先生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吧。”

但蒙科尔内并不满意。他继续在信件中翻找，仔细阅读着每一份文件。忽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阴险的满意神情：

“噢，这个更有意思了！”

他扬起一份文件：

“一份清单！一份出自达·芬奇本人之手的手写清单！”

弗朗切斯科感到脚下的地面仿佛正在塌陷。他早已把这份文件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

“看看这个日期：一五一六年，正是他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兰西之际。一份详尽的清单，记载着他随身带来的一切物品。我们现在可以将它与我们今天所发现的作对照，精确地确认缺失了什么！”

书记开始以一种明显的得意开始朗读起来：

“「一幅佛罗伦萨夫人的肖像，人称蒙娜丽莎」——在场。「一幅圣安妮与圣母及圣婴的构图」——在场。「一幅施洗者圣约翰」——缺席，你们声称它在城堡里。「一幅丽达与天鹅」——缺席，你们声称它已被毁。”

他继续读下去，语气越来越具有指控性：

“「十二本装订成册的大开本，载有完整的解剖学研究」——在我们目前的清单上我只数到三本。另外九本在哪里？「关于鸟类飞行的论著，共八册」——完全没有。「关于水利的研究，共六册」——没有。「依维特鲁威所定人体比例的研究，四册」——没有。「绘画论著，十册」——我在这里只看到两册！”

书记抬起眼来，锐利的目光紧盯着弗朗切斯科：

“您如何解释，这份一五一六年的清单中所记载的手稿，有一半以上，如今在一五一九年却不在画室中了？它们哪儿去了？消失了不成？”

弗朗切斯科感到汗水沿着他的背脊流下。他深吸一口气，投入到他早已准备好的解释中：

“正如我向您解释过的，这些手稿在师父去世之前已被他分赠了出去。但不仅仅是赠给昂布瓦兹的朋友们。有一些被寄往意大利，寄给能善加利用它们的学者和机构。”

“寄往意大利？”蒙科尔内惊呼道。“您垂死的师父竟然把手稿寄往意大利？”

“他希望他的学识能回到他的祖国，”弗朗切斯科解释道。“举例来说，那些解剖学研究，被赠给了帕维亚大学马尔坎托尼奥·德拉·托雷医生的继任者。这是他很久以前就许下的承诺。若您想查阅，这堆信件里有几封谈及此事。”

弗朗切斯科迅速在文件中翻找，取出一封含糊其辞的信件：

“您看，这封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教授的来信，请求就某些解剖学观察提供细节。我师父回信寄去了三本笔记本作答。”

“至于那部关于飞行的论著，”萨莱说道，“它被分赠给了好几个人。维勒鲁瓦先生得到了一部分，他对军事机械感兴趣。利尼伯爵得到了另一部分，他梦想着建造飞行器械。两个月前路过此地的工程师多梅尼科·达·科尔托纳，带走了两本册子去了意大利。”

弗朗切斯科绝望地继续即兴编造着：

“那些水利研究被寄给了正为教皇修建运河的工程师吉罗拉莫·达·米兰诺。这是师父的心愿：让他的这些发现能服务于具体的工程，而不是任其在箱子里发霉。”

蒙科尔内带着明显的怀疑听着：

“好一份非凡的慷慨！您的师父竟然在短短几周内散尽了数十年的研究！又是靠什么奇迹，让一个瘫痪的人能安排好这一切寄送事宜的呢？”

“他并非一直瘫痪的，”萨莱抗议道。“他也有神智清醒的时候，也有状况好些的日子。是我们执行他的指示。是不是，弗朗切斯科？”

“正是如此。师父口述他的指示，我们撰写附信，我们安排寄送。我们忠实的巴蒂斯塔可以作证，他曾好几次把包裹送往昂布瓦兹的驿站。”

蒙科尔内转向站在门边的那个仆人：

“这是真的吗？”

巴蒂斯塔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措手不及，但也明白了其中的利害，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这几个月来我送过好几个包裹。密封的卷轴，寄给法兰西和意大利各处的不同人士。”

“您没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分赠热潮很奇怪吗？”

“师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先生。他想要把自己的事情打理清楚。”

书记记下了所有这些名字，不断在他那份待询问人员的名单上添上新的条目：

“我们会把这一切都核实一遍。你们要确信这一点。每一个名字都会被核实。每一份缺失的手稿都会被追查。而若我们发现你们对我们撒了谎……”

他让这句威胁的话悬在半空。

“后果将是可怕的。窃取归属王室的财产是要处以死刑的。这我已经说过了，但我要确保这一点已完全说清楚了。”

“我无惧真相，”弗朗切斯科答道。

清点在一种更为紧张的氛围中继续进行。蒙科尔内如今以一种系统性的怀疑审视着每一件物品。他寻找着近期被动过手脚的痕迹，检验着架子上的灰尘，核对着装订本的磨损程度。

近下午五时，正当光线渐暗、必须点起蜡烛时，书记又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发现。在挪动一堆画布时，他露出了一段石灰似乎有所不同、更为新近的墙面。

“这是什么？”他一边敲着墙壁一边问道。“看上去这堵墙最近被重新修补过。”

弗朗切斯科的心几乎停跳了。这正是他们封藏手稿的地方之一。萨莱明明发誓说已把灰浆做旧得完美无缺。

“这堵墙是六个月前修补的，”弗朗切斯科努力保持着正常的语气解释道。“当时有渗水，威胁到了画作的安全。师父请了一位图尔的泥瓦匠来，纪尧姆·皮雄先生。您可以向他求证。”

蒙科尔内凑近细看这堵墙，用指甲轻轻刮着石灰：

“六个月，您说？这石灰看上去比这要新得多。”

“卢瓦尔河的湿气所致，先生。它使石灰无法完全干透。这一带所有的泥瓦匠都可以为您证实这一点。”

书记并不信服，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奈何。不过他还是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一观察。

夜幕降临之时，清点终于接近尾声。蜡烛在墙上投下摇曳的阴影，营造出一种幽灵般的氛围。书记官卢梭已经筋疲力尽，正撒上细沙以吸干他最后写下的字迹。

“好了，”德洛因斯一边收拾他的用具一边宣布道。“清点已经完成。我们清点出了二十三幅画作与彩绘板，一百三十七幅图画，二十六本装订成册的手稿，约两百张散页，四十三件科学仪器，以及若干私人物品。”

他转向弗朗切斯科和萨莱：

“先生们，依据异邦人财产没收权，所有这些财产都归属于陛下。士官们将着手运走最珍贵的物品，运往王城予以收藏保存……”

弗朗切斯科默默地低下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悲痛与一种秘密的宽慰交织在一起，扼住了他的喉咙——为那些失去的作品而悲痛，也为那些他们成功挽救下来的东西而暗自庆幸。

两名士官这时走进了画室，扛着结实的木箱和一卷卷保护性的布料。他们带着一种对惯于粗暴查抄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恭敬走近这些作品。

“务必最为谨慎，”德洛因斯下令道。“这些作品价值连城，且极为脆弱。哪怕一丝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陛下绝不会原谅我们的。”

《蒙娜丽莎》是第一件离开画室的作品。士官们带着近乎宗教般的敬意走近它。那个红发彪形大汉，莫尔坦，平日里粗暴惯了，此刻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细腻手法搬运着这幅画。

“轻点，雅克，”他对他的同伴低声说道。“这就是人人都在谈论的那位夫人。看她的目光是怎么跟着我们的。”

“我起鸡皮疙瘩了，”另一人打着寒战答道。“看上去她好像是活的。”

德洛因斯亲自监督着打包的过程。他先用几层精细的亚麻布把画作包裹起来：

“小心边角。那是木板最脆弱的地方。好了，现在盖上羊毛毯。不，不是这样！要拉得完全紧绷，才能避免摩擦。”

尽管夜晚凉爽，公证人还是汗流浹背。这份责任重大——若损坏了《蒙娜丽莎》，那将是一场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双重灾难。

弗朗切斯科走上前来：

“请容我帮您，先生。我了解这件作品的脆弱之处。这块木板在潮湿的环境中略有弯曲的倾向。得保持均匀的压力。”

他们一起把画作放进一只衬着红色天鹅绒的箱子里。德洛因斯已让人取来了细木屑以填充空隙：

“这些木屑能在运输途中吸收震动。这是我在护送已故昂布瓦兹枢机主教的藏品时学到的一项技术。”

萨莱望着这一幕，泪眼盈盈：

“她将永远离开这间画室了。师父说过，她是他的镜子，他能在她身上看见自己。”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梭好奇地问道。

“师父说过，每一位艺术家都把自己的灵魂放进了他的作品里。这位夫人，就是达·芬奇本人。他的神秘，他的忧郁，他的智慧……一切都在那，在那个微笑里。”

正在监督另一幅画打包的蒙科尔内，带着一种冷嘲讥讽地说道：

“好一番诗意，可这不过是一幅画罢了。诚然是件价值不菲的物品，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货物。”

弗朗切斯科强压着怒火转向他：

“货物？您就是这样看待天才的吗？把它当作一件待清点、待估价、待没收的财产？”

“是法律这样看待它的，”书记反驳道。“而我，是法律的仆人。”

“法律可以拥有它的物质载体，”弗朗切斯科插话道，“但它永远无法拥有赋予它生命的那种精神。这幅画将继续令那些注视它的人为之动容，即便在你们的法律早已被人遗忘之后。”

“这我们走着瞧。眼下，它属于法兰西国王的财产。”

运走作品的工作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圣安妮》以同样的细心被打包。随后是其他的画作，一幅接着一幅。每一次离去，都是一次撕心裂肺的痛楚，对弗朗切斯科和萨莱而言皆是如此。

轮到手稿时，弗朗切斯科最后尝试了一次周旋：

“先生们，这些笔记本包含着非常专业的记录，若没有解释，往往难以理解。请容我为陛下制作一些附有注释的副本。我可以翻译这镜像字迹，解释这些技术术语……”

“不可能，”蒙科尔内打断道。“一切都必须立即运走。若国王想要解释，他自会传唤你们。”

手稿被放进内衬毛毡的箱子里。弗朗切斯科看着每一本册子消失，心中默默感到宽慰，因为最重要的那些已安然藏在了它们的藏身之处。

近晚上八时，正当士官们装运着最后几只箱子时，一起意外差点毁了一切。在挪动一张沉重的桌子时，一名士官撞上了藏着手稿的那堵墙。一块石灰脱落了，露出了一个空腔。

“先生！”那名士官惊呼道。“这堵墙后面有东西！”

弗朗切斯科感到血色从脸上退去。蒙科尔内手持一支火把冲了过来：

“您看到了什么？”

士官刮开石灰，扩大了这个开口：

“看起来像是……一个空腔。也许是过去的一个壁龛。”

弗朗切斯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他确信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得见。可奇迹般地，士官所开出的这个洞，只露出了藏匿处空着的一部分——手稿堆放在更深处，从这个角度是看不见的。

“这是过去的排水管道，”一直在旁观察这一幕的巴蒂斯塔迅速说道。“这座庄园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到处都是被封起来的通道，旧的烟囱，旧的管道。修补这堵墙的泥瓦匠一定是碰上了其中一条。”

蒙科尔内怀疑地审视着这个开口：

“把这个洞挖大一点。我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先生，”德洛因斯插话道，“时候不早了。清点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完成。若您想做更深入的调查，明天带上工匠再来吧。眼下，让我们把已经开始的事完成吧。”

书记犹豫了一下，随后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好吧。但我会再来的。若有必要，我会让人把这间画室的每一堵墙都探测一遍。”

弗朗切斯科与萨莱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赢得了一个缓刑，但能撑多久呢？

实物清点如今终于结束了。卢梭收拾好他的羊皮纸，核对着每一页是否都正确编号并签署。德洛因斯在这份最终文件的末尾盖上了他的红色蜡印。

“达·芬奇财产的官方清单共计六十三页，”他郑重地宣布道。“它将存档于审计院，一份副本将呈交陛下。”

蒙科尔内补充道：

“梅尔齐先生和萨莱先生，在陛下决定这间画室的处置之前，你们将成为这间空画室的看守人。你们被正式禁止移走或改动任何东西。会有卫兵定期前来查验，确保一切保持原状。”

“要持续多久？”萨莱问道。

“直到另行通知。也许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这要取决于陛下的旨意。”

德洛因斯，更富同情心，补充道：

“你们眼下可以继续留居在庄园里。陛下认可你们为死者所提供的种种服务。但要随时准备好，等命令一到便动身离开。”

官员们开始收拾他们的物品。院子里的大车如今已装满了盛放着达·芬奇艺术珍宝的箱子。公牛们在夜晚清冷的空气中喘着粗气。

临行前，德洛因斯走近弗朗切斯科：

“我理解你的悲痛，年轻人。眼看着你师父的作品就这样离去……但你要知道，它们会得到妥善保存的。国王

对达·芬奇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些作品将受到应有的礼遇。”

“如同战利品所应得的礼遇，”弗朗切斯科苦涩地喃喃道。

公证人叹了口气：

“法律是无情的，但法律就是法律。你的师父早该想到这一点的。”

“我师父认为天才超越了人类的法律。”

“也许吧。可我们生活在凡人的世界里，不是在天才的世界里。”

听到了这番对话的蒙科尔内走了过来：

“最后一句警告，梅尔齐。我会去调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会去询问你提到的每一个人。若我发现哪怕一丝谎言，一丝隐瞒……”

“您只会找到真相，先生。”

“这我们走着瞧。眼下，我建议你不要离开昂布瓦兹。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说完这番带着威胁意味的话，官员们离开了庄园。弗朗切斯科和萨莱从这间被洗劫一空的画室的窗口，目送着他们离去。护送队的火把渐渐消失在夜色中，带走了达·芬奇灵魂的一部分。

当大车的声响渐渐消失后，萨莱瘫倒在一张小凳上：

“我的天啊，弗朗切斯科，那面墙塌下来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完了！”

“我们运气好。但蒙科尔内会回来的。我们必须在今晚就把那些藏起来的手稿转移走。”

“今晚？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正因如此。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行动。巴蒂斯塔会来帮我们。我们要把手稿取出来，分散开来。有些放到可靠的朋友家里，有些放到圣德尼教堂的地窖里。”

玛蒂里娜端着几支新蜡烛走进画室：

“先生们，你们该吃点东西了。你们一整天什么都没吃。”

“待会儿吧，玛蒂里娜。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女管家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们：

“当心点，先生们。隔墙有耳。而且蒙科尔内素以到处安插眼线闻名。”

“我们会小心的。”

她离开后，弗朗切斯科转向萨莱：

“我们还得写那些倒填日期的信。以营造出那些馈赠确实发生过的假象。我留了一些陈旧的纸张和褪色的墨水。”

“你什么都想到了。”

“我尽力而为。师父教过我要未雨绸缪。『观察，分析，预见』，他总这样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手稿从藏匿处取出。每本册子都被裹进打了蜡的帆布，随后放进麻袋里。

近午夜时分，正当他们准备运走第一批手稿时，巴蒂斯塔从城里带回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蒙科尔内已经开始了他的调查。他派人去了费尔内尔医生家和圣弗洛朗坦礼拜堂的教士那里。他想在明天一早就核实你们的陈述。”

弗朗切斯科咬着牙骂了一句：

“他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巴蒂斯塔，你得立刻动身去图尔。把这个包裹连同这封信带给费尔内尔医生。告诉他，这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他递给这名仆人一幅小画——一幅价值不大的手部习作——以及一封精心撰写的信。

“那教士那边呢？”

“萨莱去办。他会在天亮之前动身，带上一幅植物习作。那位教士是个好人，他会理解的。”

这一夜漫长而疲惫。他们转移了手稿，制造了假文件，安排好了他们的证人。当昂布瓦兹的天空破晓时，他们这场大骗局的接下来一切都已就绪。

弗朗切斯科最后一次凝视着这间空荡的画室。《蒙娜丽莎》似乎在嘲笑他。但在那些秘密的藏匿处，在那些隐蔽的箱子里，在那些满是尘埃的阁楼中，达·芬奇天才的精华依然留存了下来。

“原谅我们，师父，”他喃喃道。“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一五一九年五月六日，葬礼

翌日清晨，一五一九年五月六日，昂布瓦兹在从卢瓦尔河升起的浓雾中迎来了黎明。

正式的葬礼理应极为隆重，弗朗索瓦一世国王与整个宫廷都要出席，这意味着须协调许多与会者的日程安排。

于是，一场未经礼仪的临时下葬先行仓促举行了。弗朗切斯科缓步走近棺木。棺盖仍开着。他能最后一次看见师父的面容。

达·芬奇双手交叠地躺在那里，身着他那件貂皮镶边的最华美紫色天鹅绒长袍——那是他在王室觐见时所穿的那件。他那头长长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垂落在双肩上。他那同样雪白的胡须，已被修剪整齐，并涂上了没药油以熏香。有人——大概是巴蒂斯塔——在他胸前放了一枚小小的象牙十字架。

但吸引众人目光的，是他的面容。在死亡之中，达·芬奇找到了他生前从未拥有过的一份安详。那些曾深深刻在他额头上、忧虑的皱纹已然舒展开来。他嘴角那些苦涩的纹路也已消散不见。他看上去仿佛只是在睡觉，仅仅是睡着了，仿佛他随时会睁开双眼，用他那浑厚的嗓音说道：「*弗朗切斯科，我的孩子，我做了个再奇怪不过的梦……*」

但他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

遗体被安葬在昂布瓦兹墓地一处空置的地块，只有两位门生、几位近人、一位王室官员和一位神父在场。

正式的葬礼于三个月后，一五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举行。

那一天，棺木被起出，由六名王室卫兵护送至庄园。

弗朗切斯科彻夜未眠。他站在卧室的窗前，望着这座城市缓缓苏醒，深知这一天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圣弗洛朗坦礼拜堂的钟声开始敲响丧钟——低沉、反复、无情的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仿佛是向苍天本身发出的一声责难。

咚。咚。咚。

每一声钟响，都是一次停止跳动的心跳，一次再也不会归来的呼吸。弗朗切斯科闭上双眼，让这声音贯穿自己，刺透自己。自师父去世以来，他还没有哭过。

萨莱没敲门就走进了房间。他也彻夜未眠。他的双眼因泪水与疲惫而红肿。他身着丧服——一件黑色天鹅绒的紧身上衣，黑色的紧身裤，一件深色的斗篷。他手里捧着一只贵重木料制成的匣子。

“时候到了，”他简短地说道。“他们已经来抬棺了。”

弗朗切斯科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穿上自己的丧服，机械地整理着斗篷的褶皱。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着。他二十九岁，即将安葬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曾是他的师父，更是超越了父亲一般的存在——那个教会他以理智与美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一同走下楼梯。在门厅里，巴蒂斯塔和玛蒂里娜正等候着他们，同样身着黑衣。女管家的手指间捏着一串念珠，嶙峋的手指不停地捻动，喃喃念着祈祷词。巴蒂斯塔神情紧闭，手里捧着一支白蜡烛。

棺木停放在大客厅里，架在覆着绣金黑色天鹅绒的支架上。这是一口朴素却不失庄重的棺木，由整块橡木制成。没有繁复的装饰，没有炫耀性的雕刻——只有这上乘的木料，以及一块刻着字的小铜牌：达·芬奇，御用画师，1452-1519。

数十支蜡烛燃烧着，营造出一片摇曳的金色光芒，让阴影在墙上舞动。空气中弥漫着蜂蜡与香草——迷迭香、薰衣草、百里香——混合的气味，那是用来掩盖遗体腐坏气味所铺陈上去的。

弗朗切斯科把手扶在棺木的边缘，以免自己站立不稳。一阵剧痛刺穿了他的胸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一时间以为自己也要死了。这个世界怎么能在没有达·芬奇的

情况下继续运转呢？太阳怎么敢照常升起，鸟儿怎么敢照常歌唱，人们怎么敢照常忙于他们的日常，而那个曾洞悉自然奥秘的人，此刻却僵卧在一口木箱之中，一动不动？

萨莱跪下来，打开了他手中的匣子。里面放着几件物品：一本图册——达·芬奇年轻、俊美、无忧无虑时为萨莱所画的几幅速写；一支用旧了的画笔，是师父绘制最精细细节时最爱用的那支；一只装着佛罗伦萨泥土的小瓶，那是达·芬奇在他流亡的所有岁月里一直珍藏着的。

“师父嘱咐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他身边，”萨莱以破碎的声音解释道。“他想带走一点他的艺术，一点他的故乡。”

“原谅我，师父，”他喃喃道。“原谅我并非总能不负您的期望。原谅我的任性，我的怒气，我的嫉妒。当我只配受责备时，您却对我耐心相待。您爱着我，不顾我的种种缺点。”

他伏在棺木上崩溃了，被剧烈的呜咽所撼动，几近发出动物一般的呻吟。弗朗切斯科跪在他身旁，用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膀。此刻他也哭了，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他知道的，萨莱。他知道你爱他。他在去世前一天告诉过我。*「我美丽的萨莱」*，”他喃喃道，“*「我这个长着天使双眼的小恶魔。他毁了我的生活，也照亮了我的岁月。我什么都不后悔」*。”

萨莱抬起头来，在弗朗切斯科的眼中寻找着这番话是真的这一确证。

“他说过这话？”

“我以我的灵魂起誓。”

一段沉默过去了。随后弗朗切斯科补充道：

“现在轮到我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件用一块红色丝绸包裹着的小物件——正是那块曾覆盖《蒙娜丽莎》多年的织物。

“师父，十年前，在我正式成为您的门生那一天，您把这个给了我。您对我说：「弗朗切斯科，这个圆规曾属于我自己的师父，安德烈亚·德尔·委罗基奥。他把它给了我，对我说，艺术不仅仅是灵感，也是精确。今天，我把它传给你。要善用它」。”

他展开丝绸，露出了一个古旧的黄铜圆规，因数十年的使用而生出了包浆。它的臂杆上刻着细小的拉丁文铭文。

“我努力善用它了，师父。我努力配得上您的教诲。可现在……现在您不在了，无法再引导我，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不够坚强，不够聪慧，不够勇敢，无法守护您的遗产。带上这个圆规吧。愿它提醒您，无论您此刻身在何处，您的教诲仍在我们身上延续着生命。”

他轻轻地把圆规放在棺木上。

巴蒂斯塔也走上前来。这位忠仆，三年来一直悉心照料师父的起居，手里捧着一支朴素的白蜡烛。

“师父，”他简单地说道，“别人本会把我赶走的时候，您却待我以仁厚。别人待我如狗的时候，您却与我平等交谈。这支蜡烛，我每年都会在您的忌日点燃它。只要我还活着，您的记忆就会燃烧不熄。”

他把蜡烛放在棺木上，随后缓缓划着十字。

玛蒂里娜是最后一个。这位年迈的女管家颤抖着走上前来，把她的念珠紧紧攥在胸前。她什么都没说——她一

向不擅言辞——但她放下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达·芬奇如此喜爱的花园中晒干的花朵。

叩门声打断了这段亲密的时刻。四个男人走了进来——是黑衣忏悔者兄弟会的专业抬棺人，身着长长的黑袍，戴着兜帽。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安托万神父，那位为达·芬奇施行临终圣事的司铎。

“先生们，”神父神情肃穆地说道，“时候到了。若我们想赶在弥撒之前到达圣弗洛朗坦，队伍必须出发了。”

弗朗切斯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

抬棺人抬起棺木，扛在肩上。安托万神父以浑厚的嗓音吟唱起来：「愿众天使引领你进入天堂……」

队伍列队而行。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二名身着白色法衣的辅祭童子，手持香炉，飘出缕缕芬芳的烟雾。他们身后是安托万神父，手持一只巨大的贴金游行十字架。随后是抬着棺木的人。最后压阵的是弗朗切斯科、萨莱、巴蒂斯塔和玛蒂里娜，身后跟着一小群曾与达·芬奇相识的仆人、工匠与邻人。

他们走出庄园，融入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晨雾正缓缓消散，一点点显露出周围的景色。那片达·芬奇曾花费无数时辰观察草木、鸟儿、昆虫的花园。那条他抵达时命人栽种的柏树林荫道，他曾说它们让他想起了托斯卡纳。那座他有时会在日落时分前去冥思的小亭子。

队伍步入了通往城中的道路。丧钟继续敲响着，为他们这场送葬的行进打着节拍。昂布瓦兹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被这钟声所吸引。

他们伫立在门前，默默无言，脱帽以示敬意。有人划着十字。有人跪了下来。一位老妇人公然啜泣，紧紧抱着一幅她向货郎买来、粗糙临摹达·芬奇圣母像的画作，如同敬奉神圣的圣像一般敬奉着它。

弗朗切斯科望着这些朴实的百姓，向一个他们从未真正认识、只曾远远见过、却听闻他是介于人与天使之间的存在的人致以敬意。对他们来说，达·芬奇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是一位魔法师，一位圣贤，也许还是一位先知。人们传说他能从星辰中读出未来，说 he 已洞悉了生与死的秘密。

队伍穿过了卢瓦尔河上的桥。河水缓缓流淌，灰色的水面映照着阴沉的天空。达·芬奇一直深爱着这条河流。

「水是自然的载体」，他曾说过。「它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正如生命本身」。

在河的对岸，人群更为密集。几十人聚集在那里——工匠，商人，贵族，教士。弗朗切斯科认出了好几张熟悉的面孔：让·佩雷亚尔，国王的画师，在棺木经过时深深鞠了一躬；皮埃尔·德·纳瓦尔，王室的工程师，泪水肆意地流着；

而后，人群中忽然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让开，跪了下来。一阵低语传开：「国王！国王来了！」

弗朗索瓦一世出现了，骑着一匹白马，身边只有寥寥几名侍卫护随。他身着全套丧服——黑色天鹅绒，黑色斗篷，就连他那顶插着羽毛的帽子也是黑色的。他那张平日总是那样欢快、自信的脸庞，此刻被悲痛摧折得憔悴不堪。他的双眼红肿。看得出来，他哭过了。

他翻身下马，走向送葬的队伍。抬棺人停了下来，小心地把棺木放到地上。国王跪在了尘土飞扬的路面上——法兰西的国王，全欧洲最有权势的人，跪在泥土之中，跪在一位外国画家的棺木前。

“达·芬奇，”他以破碎的声音喃喃道。“我的父亲。我的师父。我的朋友。”

他把双手按在棺木上，低垂着头，久久未动。弗朗切斯科看见他的双肩在颤抖。国王在哭泣。

终于，弗朗索瓦一世站起身来。他转向弗朗切斯科和萨莱：

“先生们，”他以沙哑的声音说道，“我要你们知道，法兰西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师父带给她的一切。他的天才照亮了我的宫廷。他的智慧指引了我的决策。他的存在……他的存在温暖着我的心，正如太阳温暖着大地。”

他停顿了下来，与泪水抗争着。

“我曾想把一切都给他。一座庄园。年金。种种荣誉。可与他传授给我的东西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在认识他之前，我看一幅画，只看到一幅图像。如今，我看到了光，看到了影，看到了构图，看到了灵魂。他向我打开了通往这个世界之美的双眼。”

弗朗切斯科深深地鞠躬：

“陛下这番话，是对我师父名声的莫大尊崇。他常常怀着深深的情谊谈起您。对他而言，您是他从未有过的儿子。”

国王毫无羞愧地拭去泪水：

“而他，对我来说，是我本想拥有的那个父亲。我的生父在我二十岁时去世了。达·芬奇填补了那份空缺。每当我遇到难题，我总会向他求教。每当我心生疑虑，我总会寻求他的智慧。”

他最后一次转向棺木：

“再会了，我的父亲。愿天主接纳你的灵魂，与圣徒与贤者同列。你以凡人之身度过了一生，你将以传奇之名走向死后。”

国王重新翻身上马，示意队伍继续前行。但他并未离去。他留在那里，骑在他的白马上，注视着送葬的队伍重新起行。当棺木从他面前经过时，弗朗索瓦一世摘下他的帽子，深深鞠躬——国王向他的臣民鞠躬。

队伍继续朝着圣弗洛朗坦礼拜堂前行，国王随后不久也赶到了那里。此刻人群紧紧跟随，在每一个街角都不断壮大。数百人跟在棺木身后行进，形成一支蜿蜒穿过昂布瓦兹街巷的黑色长队。

圣弗洛朗坦礼拜堂矗立在一座小山丘上，俯瞰着整座城市。这是一座朴素却不失优雅的建筑，两个世纪前以火焰式哥特风格建成。它的尖塔如同石头的祈祷般直插云霄。它的花窗玻璃，内里点缀着数百支蜡烛，在这灰蒙蒙的天色中如彩色的珠宝般闪耀。

礼拜堂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每一寸空间都被占满了。身着宫廷礼服的贵族，穿着最华美衣饰的市民，穿着干净工作服的工匠，穿着木屐的农人——所有人都聚集在此，向那位曾以其存在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国王已就座于第一排。

抬棺人将棺木运至圣坛，安放在一座覆着紫色天鹅绒的灵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香气——没药与安息香的芬芳，一缕缕升向拱顶。

安托万神父登上讲坛。这是一位面容严肃却不失慈善的老人，四十年来一直服侍着这个教区。他的嗓音虽已年迈，仍旧洪亮，在这寂静的礼拜堂中回荡：

“我的兄弟们，我的姐妹们，我们今天聚集于此，是为了向一位非凡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达·芬奇不仅仅是

一位艺术家，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是一个在阴影的世界里寻求真理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在丑陋的世界里创造美的创造者。他是一个在质疑的世界里怀有信仰的人。”

他停顿了下来，让这番话在空中回荡。

“有人说他是异端。说他解剖死者，因而褻渎了天主的圣殿。说他企图像天使一样飞翔，因而挑战了造物主的意志。说他问了太多的问题，怀疑得太多，探索得太多。”

神父的目光扫过整个会众：

“对那些人，”我如此回答，“信仰若不是对真理的追寻，又是什么呢？对天主的爱若不是对祂创造之工的凝视，又是什么呢？达·芬奇穷尽一生研究天主的杰作。他所描绘的每一根骨头，他所分析的每一块肌肉，他所发现的自然的每一条法则——这一切，都不过是在神圣的巧思面前，一段长长的、狂喜的祈祷。”

一阵赞同的低语在礼拜堂中传开。

“他常常对我说，”安托万神父继续道，“「我的神父，当我解剖一具人体，看到其构造那完美的复杂时，我唯有对设计出这样一台机器的造物主感到惊叹。每一根肌腱都恰好置于它应在的位置。每一根骨头都恰好如其所应有的那般被塑造出来。这是天主存在最为炫目的明证」。”

神父停顿了下来，被自己的这段回忆所触动。

“达·芬奇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不是盲目的信仰，不是那种不加理解便予以接受的信仰，而是一种开明的信仰，一种试图透过祂的造化来认识天主的信仰。而这，难道不正是最崇高的虔诚形式吗？”

他抬起目光，望向高悬在圣坛之上的十字架：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过：「寻找，你们就会找到」。达·芬奇穷尽一生地寻找。而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美。他找到了和谐。他找到了支配宇宙运行的种种法则。而在这一切之中，他找到了天主。”

弥撒以应有的庄严进行着。安托万神父以对每一个动作、每一句祷词的特别专注主持着圣餐礼。格里高利圣咏升向拱顶，由辅祭童子们纯净的嗓音承托着。「震怒之日，那一日……」

跪在第一排的弗朗切斯科几乎没在听。他的思绪飘远了，反复回想着与师父最后相处的那些时刻。那只曾紧握着他的手。那微弱的、喃喃说着嘱咐的声音。那双缓缓熄灭的眼睛，如同一支蜡烛燃到了尽头。

「弗朗切斯科」，达·芬奇曾在他最后几次神志清醒的时刻说道，「你将会独自一人。这是所有门生的命运——成为师父的孤儿。但不要悲伤。我并未真正离去。只要你还记得我的教诲，只要你还以我教会你打开的那双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就会与你同在」。

弥撒接近尾声。下葬的时刻到了。抬棺人再次抬起棺木，将它运向礼拜堂圣坛下方的地窖，一间拱顶大厅，那里已经安葬着好几十位本地的显要人物。

步入地窖的过程颇为艰难。石制的楼梯十分狭窄。抬棺人不得不小心前行，以免棺木撞到墙壁。弗朗切斯科和萨莱跟在后面，手持火把，在石制的拱顶上投下摇曳的阴影。

地窖中弥漫着潮湿泥土与硝石的气味。这是一个寒冷、寂静的地方，时间在此仿佛静止了。

石头地面上已经挖好了一个墓穴。旁边放着一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已经刻好了字：「达·芬奇长眠于

此，佛罗伦萨人，御用画师，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辞世」。

抬棺人把棺木放在墓穴边。安托万神父吟诵起了《求主垂怜诗》：「主啊，我从深渊向你呼求……」

这正是弗朗切斯科最为惧怕的时刻。棺木沉入土中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将变得最终、不可逆转、绝对。

抬棺人抓住绳索，开始缓缓将棺木放入墓穴。木料摩擦着石壁。这声响在地窖的寂静中回响，如同一声垂死的哀鸣。

弗朗切斯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他崩溃了，跪倒在墓穴边：

“不！还不行！求求你们，还不行！”

萨莱抓住他的双肩，试图拦住他，但弗朗切斯科挣扎着：

“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完我想说的一切！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给予我的一切！”

他的声音在无法克制的呜咽中破碎了。他所压抑的全部悲痛此刻猛然爆发，其猛烈让他喘不过气来，被掏空了，被击碎了。

萨莱跪在他身旁，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他也在哭，但他的泪水是无声的，内敛的，几乎带着一种接受的意味。

“他不需要言语，他只是单纯地爱着你，”萨莱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因为他跟我说过。去世前几天他对我说：「我的弗朗切斯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他比我更聪明，更自律，更正直。他将走得比我更远。当他攀上我曾开始攀登的那座山峰之巅时，他会想起我，然后微笑」。”

弗朗切斯科抬起头来，双眼被泪水浸透：

“他真这么说过？”

“是的。”

一段长长的沉默过去了。棺木此刻已经落到了墓穴的底部。抬棺人正在收起绳索。再过片刻，人们就要开始撒土了。

弗朗切斯科俯身望向墓穴。他最后一次凝望着这口装载着达·芬奇肉身之躯全部遗留的橡木棺材。

“再会了，师父，”他喃喃道。“谢谢您所给予的一切。我会尽我所能，力求配得上您。我会守护您的遗产。我会传承您的教诲。当我的时刻到来时，当我在来世与您重逢时，我希望您能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

他抓起一把泥土，撒进墓穴里。它落在棺盖上，发出一声闷响。随后萨莱也这样做了。接着是巴蒂斯塔。接着是所有走入地窖的人。

掘墓人上前，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一铲又一铲，泥土渐渐覆盖了棺木。泥土落在木头上的声音令人难以忍受——每一次落下，都是一次道别，每一铲泥土，都是一次放弃。

弗朗切斯科无法把目光移开。他望着泥土渐渐升起，一点点将棺木从他的视线中抹去。先是棺盖消失了。接着是棺身的两侧。最终一切都被覆盖了。只剩下一堆新鲜、深色、湿润的泥土。

掘墓人夯实了泥土，把它铲平，随后把那块沉重的大理石墓碑放置在上方。石头落地的声音回响着，如同最后一声惊雷。一切都结束了。达·芬奇找到了他永恒的安息之所。

安托万神父念完了最后的祈祷词，划了最后一次十字，随后邀请会众们重新上楼。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窖，重新走向白日的光明。

弗朗切斯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伫立在那里，站在这座新坟前，无法迈出那第一步，因为那一步将意味着最终的接受。他身后，萨莱耐心地等候着。

“弗朗切斯科，”他轻声说道，“我们该走了。让他安息吧。”

“我该怎么办？没有他，我该怎么活下去？”

“就像他教给我们的那样。去观察。去创造。去追寻真理。这是我们让他继续活着的方式。”

弗朗切斯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随后转身走向楼梯。他每爬上一级台阶，便离生者的世界更近一分，离死者的世界更远一分。当 he 从地窖中重新出现在礼拜堂里时，花窗玻璃透进的光线，在经历过地窖的黑暗之后，显得刺眼得令人痛苦。

礼拜堂已经空了。只剩下几位近人——国王已经离去，但仍有几位廷臣在场，还有几位曾与达·芬奇相识的艺术家与学者。

正当弗朗切斯科准备离开之际，一个人走近了他。那是一位白发苍苍、衣着讲究的意大利老人。弗朗切斯科立刻认出了他：多梅尼科·德拉·帕拉，一位佛罗伦萨的艺术品商人，是达·芬奇年轻时的旧友。

“梅尔齐先生，”这位老人以浓重的托斯卡纳口音说道，“请容我向您致以哀悼之情。达·芬奇……他是独一无二的。世上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多谢您，先生。您的到场是对他名声的一份殊荣。”

“我特地从佛罗伦萨赶来。我必须在场。达·芬奇和我在委罗基奥的画室共同度过了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情同手足。”

这位老人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小小的金牌：

“这曾属于年轻时的达·芬奇。这是他父亲皮耶罗先生送给他的礼物。四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达·芬奇曾把它送给了我，那晚我们喝多了酒，畅谈了太多关于未来的话题。*「留着它，多梅尼科」*，他对我说，*「等我死的时候，把它和我一起葬了」*。我从未忘记这个承诺。”

他把这枚金牌递给弗朗切斯科：

“您能把它放在他的墓旁吗？我年纪太大，下不了地窖了。”

弗朗切斯科接过了这枚金牌。这是一件朴素却美丽的物件，刻画着一位展开双翼的天使。

“我会去做的。多谢您在这么多年后，仍恪守着您的承诺。”

“四十年了。四十年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我们曾年轻，曾强壮，曾坚信我们将会征服这个世界。达·芬奇做到了。而我，仍旧只是个商人。可我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敬慕。”

弗朗切斯科再次下到地窖，这一次是独自一人。他跪在那座新坟旁，用双手在松软的泥土中挖了一个小洞。他把金牌放了进去，随后小心地把它盖上。

“一件来自您青春岁月的礼物，师父。愿天使们引领您升入天堂。”

当他重新上楼时，礼拜堂已空无一人。阳光已穿透云层，斜射的光线透过花窗玻璃洒了进来，在石地上投下一片片彩色的光斑。红，蓝，绿，金——这些正是

达·芬奇如此钟爱的色彩，是他穷尽一生去理解、去再现的色彩。

外面，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聚集着一小群人。大多是些平民百姓，只是单纯前来致敬。有些人在台阶脚下放下鲜花。有些人点起了蜡烛。一个女人用意大利语唱着一首挽歌，一首古老的托斯卡纳歌谣，正是达·芬奇有时会在画室里哼唱的那首。

弗朗切斯科在广场上停下脚步，望着这一幕。这些人从未真正认识过达·芬奇。他们不懂他的科学理论，也无法完全领会他画作的复杂精妙。但他们以一种本能的领悟明白，一位伟人离去了。而他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方式，标记这场离去。

一个孩子走近了弗朗切斯科。那是个约莫十岁的小男孩，衣衫褴褛，脏兮兮的，大概是个农人的儿子。他手里捏着一朵野花——一朵普通的雏菊。

“先生，”他怯生生地说道，“达·芬奇大师真的能画出美到让人哭泣的天使吗？”

弗朗切斯科蹲下身子，与这孩子的目光平齐：

“是真的。他画的天使美得让人觉得他们随时会从画中飞出来。”

“那他真的能造出会飞的机器吗？”

“他一直在尝试。他从未成功过，可他一直在尝试。”

孩子沉思了片刻，随后把他的花递给弗朗切斯科：

“您能把这个放在他的坟前吗？这是我仅有的东西了，可我想让他知道，就连我，也在想着他。”

弗朗切斯科接过这朵花，深受感动：

“他会知道的。谢谢你，孩子。”

他最后一次回到礼拜堂，走下地窖，把这朵雏菊放在墓上。这朵朴素的花，出自一个贫苦孩子之手，在他看来，比任何官方的敬意，任何悼词，任何将会为他树立的纪念碑，都更加珍贵。

因为，说到底，这正是达·芬奇真正的天才所在：不仅打动了这世间的显贵，也打动了那些卑微的人。创造出一种美，普世到即便一个乡野孩童也能感受到它，即便他并不理解它。

弗朗切斯科重新走上楼来。在礼拜堂的门槛前，他转过身，望着里面。蜡烛依旧燃着。花窗玻璃依旧闪耀。但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如今不一样了。更小了。不再那么明亮。少了许多可能性。

他走了出去，午后的阳光正渐渐黯淡。人群已经散去。只有萨莱和巴蒂斯塔在等候着他。

“结束了，”萨莱简单地说道。

“不，”弗朗切斯科答道。“还没结束。这才刚刚开始。”

他望向地平线，望向远处山丘上依稀可见的克洛·吕斯庄园。在那里，在秘密的藏匿处，在阁楼里，在那些沉默寡言的同谋家中，沉睡达·芬奇真正的宝藏。

蒙科尔内已没收了那些看得见的作品。国王如今拥有了《蒙娜丽莎》和其他的画作。但弗朗切斯科成功了。他撒了谎，隐瞒了，欺骗了，伪造了。他触犯了法律，抗拒了国王，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可他挽救了这份遗产。

而如今，真正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守护这些手稿，抄录它们，研究它们，传承它们。让达·芬奇的天才穿越数个世纪，继续存续下去。

“我们回去吧，”他终于说道。“我们还有活要干。”

他们踏上了返回克洛·吕斯庄园的道路。太阳正渐渐西沉，在路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在他们身后，圣弗洛朗坦的钟声最后一次敲响，那忧郁的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

咚。咚。咚。

再会了，达·芬奇。再会了，师父。再会了，父亲。

但这不是永别。因为天才永不消亡。它转化，它传承，它以别的形式重生。画作会老去，会龟裂，会褪色。手稿会泛黄，会破损，会遗失。但思想，思想是不朽的。

而达·芬奇的思想，才刚刚踏上它穿越永恒的旅程。

第三章：欺瞒的岁月

米兰，一五一九年秋

达·芬奇去世已有六个月了。

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从他在提契内塞门附近租住的一间简陋屋子的窗口，凝视着米兰的屋顶。这座他童年时的城市，此刻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十三年的离乡，已经改变了这座公爵之城：新的宫殿拔地而起，取代了古老的中世纪住宅；一五一五年法兰西战败后，新的主人西班牙人，已在这里烙下了他们建筑上的印记。

他并非因怀旧而归来，而是出于必要。达·芬奇的葬礼过后，克洛·吕斯庄园的仆人被遣散之后，与王室国库官员的种种对峙过后，继续留在法兰西已变得危险。在昂布瓦兹每多待一天，他们那场骗局中的某个细节被揭穿的风险便增加一分，某个证人可能反悔，蒙科尔内可能重新展开调查。

归程令人心身俱疲。他不得不悄悄运送那些抢救出来的作品：从画框上拆下、卷进保护布卷的《施洗者圣约翰》，同样打包的《丽达与天鹅》，以及尤其是分散在好几个旅行箱中的数十份手稿。在里昂，几名疑心重重的关吏想要检查他的行李。他不得不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贿赂，才避免了箱子被打开。

萨莱陪他一同走到里昂，随后决定在法兰西再留几个星期，「处理一些私事」——实际上是悄悄卖掉几幅不重要的图画，独吞了这笔钱，没有分给他。弗朗切斯科由他去了，因为太过疲惫，无心争执。他们的这份友谊，若它曾真正存在过的话，自师父去世以来已然渐渐恶化。他们彼此眼中，看到的不再是并肩作战的同伴，而是一个碍手碍脚的同谋。

如今在米兰定居下来，他必须重建自己的生活。他二十九岁，除了曾是一位已故大师的门生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技，还坐拥一批他不能公然出售、以免招来法兰西或意大利当局注意的艺术品财富。

他的父亲，乔瓦尼·梅尔齐队长，两年前已经去世，留给他一份不多的年金和几块位于瓦普里奥·达达附近的农地。这足够他过上朴素的生活，但不足以维持他所渴望的社会地位。他的兄弟们把持着家族财产的大部分，看他的眼神中带着一种怜悯与轻蔑交织的意味：一个把青春浪费在追随一个外国画家，而不是在军队或行政部门谋求前程的人，又能指望他有什么出息呢？

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办法，把他这份来路不正的遗产变现，又不引起怀疑。可这些物件，若他无法出示证明其合法来源的文件，又该如何出手呢？如果全米兰都知道师父是在法兰西去世的，且他的财产已被王室官员登记造册，他又该如何解释这些物件为何在他手中呢？

答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与蓬皮欧的联盟

一五一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一位衣着讲究的年轻人自称是蓬皮欧·博尼尼，雕塑家兼业余收藏家，登门造访。蓬皮欧二十四岁，五官端正，面容清秀，天生就带着那种出身富贵之人特有的从容自信。他的父亲莱昂内·博尼尼，是一位效力于查理五世的知名雕塑家，他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赋，也继承了他在欧洲各宫廷中的人脉。

“梅尔齐先生，”寒暄过后他开口道，“您的名声早已远播。人们说，您曾是伟大的达·芬奇最钟爱的门生，说

您继承了他最珍贵的作品，说您手中握有一些世人从未见过的秘密的手稿。”

弗朗切斯科保持着戒备，谨慎地答道：

“传言总是夸大其词的，先生。我确实有幸侍奉师父多年，这是真的。至于遗产，比那些闲言碎语所描述的要朴素得多。”

“朴素？”蓬皮欧带着一丝怀疑的微笑重复道。“我听说过一些令人惊叹的研究，关于鸟类飞行的论著，一些非凡机械的图纸。这在我看来可不算朴素。”

弗朗切斯科明白了自己必须改变策略。这位蓬皮欧消息灵通。与其否认，不如探探他的底。

“若这些传言属实呢？那对您有什么好处？”

“我的好处有两方面。首先，是对达·芬奇天才的真挚敬慕。我曾在罗马和佛罗伦萨见过他的几件作品，为它们的美所折服。其次，是一种更为……务实的兴趣。我认识一些遍布全欧洲的收藏家，他们愿为购得师父的真迹一掷千金。但这些收藏家要求严苛。他们要担保，要来源的证明。”

“您是在提议帮我出售吗？”

“我是在提议成为您的中间人。您有作品，却没有人脉。我有人脉，却没有作品。我们联手，或许能创造出一份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

弗朗切斯科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能相信他吗？还是说，这是个圈套？是法国人或米兰当局派来诱他上钩的密探？

他决定冒险一试，只透露刚好足以试探蓬皮欧反应的信息。

“您说得对。我确实拥有几件重要的作品。但它们的来历……很复杂。师父是在法兰西去世的，而法国关于外国人继承的法律极为苛刻。我抢救出了一些物件，但并非全部。而对于我所抢救的那些，我也没有官方的证明文件。”

“我早有预料。正因如此，您才需要我。我可以制造所需的文件，建立一条可信的来源链，找到不会提出太多难堪问题的合适买家。”

“制造文件？您是在说伪造文书吗？”

“我会避免用这么直白的字眼。不如说，我可以……以一种既满足法律要求、又能保护您合法权益的方式，重新构建这些作品的历史。毕竟，这些作品在道义上属于您，不是吗？您为师父效力了多年。是法国的法律阻止您享有它们的。”

这套诡辩打动了弗朗切斯科。

“您要抽成多少？”

“售价的百分之二十。以及偶尔能够查阅这些手稿以供我自己的艺术研究之用的权利。我是雕塑家。达·芬奇的解剖学研究令我极感兴趣。”

百分之二十，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有一个人脉广泛的同谋，值这个价钱。而且蓬皮欧似乎凭直觉便理解了这一情形的种种微妙之处。

“好吧，”弗朗切斯科答应道。“但有几个条件。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未经我事先同意，您不得出售任何东西。第三，无论如何，有些作品是不出售的。”

“《施洗者圣约翰》？”

弗朗切斯科猛地一惊。

“您怎么知道我拥有这幅画？”

“纯粹是推理。师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打磨这幅画。它就在克洛·吕斯庄园的画室里。可据我所知，它并未被法国官员登记造册。除了落入您手中，它又能去哪里呢？”

弗朗切斯科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头脑异常敏锐的人。蓬皮欧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间人。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分析者。

“好吧。我确实拥有《施洗者圣约翰》。而您说得对，它不能出售。永远不能。”

“我尊重这一点。有些作品是不能出售的，是无法出售的。它们太珍贵了，承载着太多私人的意义。”

这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坚定了他们的联盟。接下来的几天里，弗朗切斯科向蓬皮欧展示了他这批宝藏的规模。这位年轻的雕塑家在这些手稿面前目瞪口呆，被图纸的精确所迷醉，为其中观察的大胆而惊叹不已。

“您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是什么了吗？”他一边翻阅着一本展示心脏解剖的册子一边惊呼道。“这些图画比当今的医学科学超前了好几个世纪！若这些成果被公之于世，医学界将为之震动！”

“正因如此，才必须挽救它们，”弗朗切斯科热切地答道。“师父为这些研究投入了二十五年的心血。我不能让这些珍宝被无知的王室官员没收，然后被丢弃，或者被卖给废纸商人。”

“您不是一个盗取了遗产的投机者。您是一位挽救了宝藏的守护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这份道德上的区分，弗朗切斯科一直努力在心中维持着，蓬皮欧的赞同强化了它。是的，他偷了。但他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而偷。这是一桩有德行的罪行，倘若这种事真能存在的话。

最初的几笔出售

蓬皮欧投入了工作。他先着手辨认那些可以安全出售的物件：达·芬奇年轻时创作的几幅次要图画，几幅从未实现的作品预备习作，以及几幅弗朗切斯科本人在师父指导下临摹的作品，这些可以被当作原作呈现。

每一笔出售，他都编造出一套可信的来源故事。比如，对于一幅昂首腾跃之马的图画，他声称达·芬奇曾于一五零五年将它赠给了一位米兰贵族，那位贵族又把它遗留给了他的儿子，而弗朗切斯科则从那位儿子手中购回了它。他甚至伪造了几封信函，证明这桩虚构的交易。

第一笔重要的出售发生在一五二零年三月。买主是贝纳多·多维齐·达·比比恩纳枢机主教，一位艺术的忠实爱好者，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收藏家。蓬皮欧向他提议了一系列共十二幅植物学图画——都是达·芬奇的真迹，但属于次要作品——开价三百枚杜卡特金币。

枢机主教久久端详着这些图画，将它们与他已收藏的其他达·芬奇作品作比较。确信其真实性之后，他接受了这个价钱。在场目睹这笔交易的弗朗切斯科，感到一阵巨大的宽慰。第一笔出售顺利完成。这套体系行得通。

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又组织了约十来笔类似的出售。每一笔交易都经过精心准备，买主都经过精挑细选：以谨慎出名的知名收藏家，对拥有达·芬奇的声望比对来源的法律细节更感兴趣的贵族，以及那些宁愿不去追问那些以好价钱兜售给他们的作品来源的艺术品商人。

弗朗切斯科用这笔钱重新安顿了自己在米兰的生活。他先是在布雷拉区租下了一套更大的公寓，随后于一五二二年，在维切利纳门附近购置了一座小型宫殿，靠近达·芬奇几十年前在此绘制其著名的《最后的晚餐》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这座小宫殿，尽管相较于米兰大家族的宅邸而言略显朴素，却满足了他的需求。它包括分布在三层楼中的十来个房间，能容纳四匹马的马厩，一座以喷泉点缀的内院花园，尤其还有一间宽敞的阁楼，他在那里布置了一间秘密画室。他在那里保存着他最珍贵的宝藏：《施洗者圣约翰》，解剖学手稿，关于飞行的论著。

与这些商业交易并行，他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悉心经营着与米兰有影响力人物的关系：西班牙总督，大主教，卫戍部队司令，米兰贵族大家族的族长们。他慷慨地把达·芬奇的一些次要图画赠给这些显贵，以此制造出一些欠他人情、日后有难时会心怀感激的人。他参加社交活动，参加招待会，参加宗教仪式。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不可或缺的艺术与古董专家。

这套编织人脉的策略，与伪造文件同样重要。在一个人情关系往往比成文法律更为重要的社会里，拥有权贵朋友，是最好的护身符。

一五二三年，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谋求并获得了米兰西班牙总督阿方索·达瓦洛斯的顾问一职。这个职位是名誉性质的——他要对总督的艺术购藏提出意见，偶尔在公爵宫中组织展览。但它赋予了他一个官方身份，使他免受可能的欺诈或窝赃指控的威胁。谁又敢指控总督的顾问贩卖赃物呢？

萨莱的归来

一五二三年九月，萨莱再次出现在米兰。弗朗切斯科自从四年前在里昂分别以来便未曾再见过他，此刻他的变化令他吃惊。四十三岁的萨莱，早已失去了他那种雌雄莫辨的美貌。他的脸因酗酒而浮肿，双眼因睡眠不足而红肿，衣着邋遢。他看上去仿佛老了二十岁。

“弗朗切斯科！”他没等被邀请便径自闯进了宫殿，惊呼道。“真高兴再见到你！我听说你在这里安顿得很好。一座漂亮的宫殿，一份体面的地位。你成功了！”

弗朗切斯科对这次冒昧的造访感到恼火。他让萨莱在客厅坐下，请他喝了酒。

“你在米兰做什么？这四年你都在哪里？”

“到处都有，”萨莱含糊其辞地答道。“先是在法国，我试着卖掉几幅画。然后去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我试图作为一名独立画家立足，可没有成功。没有师父的名望，委托是很难得的。”

弗朗切斯科用一种怜悯与戒备交织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位旧友。他猜到了萨莱是来讨钱的。

“那么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着在米兰定居下来。重新联系上我以前的朋友们。也许你和我，我们能再次合作？就像师父在世的时候那样？”

“怎么合作？”

“嗯，你有那份遗产。我有人脉。我们联手，就能把那些重要的作品卖出去。比如《施洗者圣约翰》。或者《丽达》。这些作品值一大笔钱！”

一阵寒意掠过弗朗切斯科。萨莱以为他还持有一五一九年抢救出的全部作品。他不知道弗朗切斯科已经通过蓬皮欧卖掉了一部分。

“《丽达》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他撒谎道。“我把它送给了一位威尼斯的收藏家，作为交换某项恩惠的代价。”

“送给他？”萨莱愤慨道。“你把一件价值好几百枚杜卡特的作品送人了？”

“为了获得某些庇护，这是必要的。若你了解详情，你会明白的。”

萨莱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经营了一套体系，是不是？你找到了出售这些作品的办法，却把我排除在外！”

“我们四年前就分道扬镳了，”弗朗切斯科疲惫地反驳道。“在这整段时间里，你没有捎来任何音信。你没给我寄过一封信，一条口信。你还指望什么？指望我袖手旁观，坐等你归来？”

“我们是同谋！”萨莱喊道。“我们一起偷了这些作品！你没有权利不带上我就把它们卖了！”

这番不谨慎的话，是在一间任何人都可能听见的客厅里大声说出来的，令弗朗切斯科惊恐万分。他冲到门边确认没人偷听，随后满腔怒气地转向萨莱：

“闭嘴，蠢货！你想让我们俩都被抓吗？你以后再也不许说这些话，听见了吗？再也不许！”

萨莱被弗朗切斯科的激烈反应吓住了，沉默了下来。但他的目光里仍充满怨恨。

“我需要钱。我欠了债。好多债。若我不尽快还清，我会有大麻烦的。”

弗朗切斯科叹了口气。他拿出一只装着五十枚杜卡特的钱袋，递给萨莱。

“这够你撑几个月。但这是我最后一次无条件给你钱了。若你想要更多，就得干活。若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找几份临摹的委托。”

萨莱贪婪地抓过钱袋，掂了掂分量以估量其中的数额。见数目令他失望，他把它塞进了腰带里。

“五十枚杜卡特？就这些？你住在一座宫殿里，有仆人伺候，却只给我五十枚可怜的杜卡特？”

“这已经超过你应得的了。而且，若你还像现在这样酗酒赌博，这五十枚杜卡特连一个月都撑不到。”

说完这番尖刻的话，萨莱摔门离开了宫殿。弗朗切斯科陷入了沉思。萨莱的归来意味着一个威胁。这个人反复无常，酗酒成性，债台高筑。他可能在一时软弱或盛怒之下，泄露他们的秘密。必须密切留意他的动向。

他在晚餐时向蓬皮欧提起了此事。

“你以前那个同谋很危险。要么收买他，确保他保持沉默，要么……除掉他。”

“除掉他？”弗朗切斯科震惊地重复道。“你是说要杀了他？”

“我是说消除一个威胁。但除了谋杀，还有别的办法。比如可以让他因欠债而被投入监狱。或者让当局把他从米兰驱逐出去。或者在远离此地的某个地方为他谋一个职位，让他再也无法伤害我们。”

弗朗切斯科思忖着这些提议。让萨莱入狱的念头令他不快，但蓬皮欧说得对：这个「小魔鬼」是一个必须妥善处理的威胁。

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动用自己与总督的关系，让萨莱被任命为一个小城镇——距离米兰五十公里的克雷马——的官方画师。这个职位薪水微薄，但收入稳定，且能让萨莱远离伦巴第首府，避免他在那里惹出麻烦。

萨莱几乎别无选择，接受了这项任命。但弗朗切斯科明白，这只是一段喘息之机。他迟早会回来的。

萨莱的沉沦

三个月后，一五二三年十二月，萨莱再次出现在这座宫殿。他的堕落显而易见。他的脸不仅仅是因酗酒而浮肿，更被某种潜藏的疾病摧残得不成样子。他的双手一直在颤抖，声音变得沙哑，咳嗽的频率令人不安。

弗朗切斯科悄悄地让他从后门进来，以免仆人们看见。他把他领到自己的书房。

“萨莱，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正在毁掉自己。”

“我在毁掉自己？”他重复道，发出一阵苦笑，随即演变成一阵咳嗽。“是我们的秘密在毁掉我！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害怕人们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害怕被人拷打逼供。害怕最终被绞死在公共广场上！”

“没有人会拷打你的。我们很安全。”

“安全？”萨莱喊道。“也许你安全！你住在你那漂亮的宫殿里。可我呢？我从这一切当中得到了什么？贫穷，孤独，羞耻！”

“我需要钱。很多钱。我欠了债……很重的债。若我不还清，他们会杀了我。”

“谁会杀你？”

“一些人……一些危险的人。放高利贷的。我借钱去赌博，输光了。现在他们要我连本带高得离谱的利息一起还清。”

弗朗切斯科心中快速盘算着。这已是他第三次替萨莱还债了。每一次，萨莱都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说他会改过自新，说他会戒酒戒赌。而每一次，几个月后，他又带着新的债务回来。

“这次你欠多少？”

“一百枚杜卡特，”萨莱喃喃道，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一百枚杜卡特！”弗朗切斯科惊呼道。“这可是一笔巨款！你怎么能积欠下这么多的债？”

“我以为自己能赢……我以为我的运气该转了……”

弗朗切斯科站起身来，走向窗边，背对着萨莱。他在紧张地思索着。一百枚杜卡特，是一大笔钱。但这也是沉默的代价。若他拒绝，绝望的萨莱可能会不顾一切。包括向当局揭露他们的秘密，希望以坦白换取宽大处理。

弗朗切斯科转过身来。

“我会替你还清这笔债。最后一次。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萨莱带着一丝突如其来的希望问道。

“你要离开米兰。永远。我曾为你找过一份工作，可你说走就走。现在，我要在远离此地的一个偏僻村落给你买一栋小房子。你可以在那里安静地生活，靠一份微薄却足够维持你日常所需的年金度日。但你永远不能再回到米兰。你不能再联系我。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

萨莱张开嘴想要抗议，随后又闭上了。他明白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了。也许弗朗切斯科说得对。也许远离米兰，远离那些诱惑，远离那些回忆，能让他重新开始。

“好吧。我会离开的。可是……那房子，会登记在我名下吗？我会成为它的主人吗？”

“它会登记在你的名下。我会请公证人办理产权文书。你可以在那里住到你去世为止，之后你可以把它遗赠给任何你想要的人。”

弗朗切斯科信守了承诺。他向米兰的放高利贷者们替萨莱偿清了债务。他在距离米兰约十公里的巴焦村购置了一栋小房子。他设立了一份每年二十四枚杜卡特的年金，由一位公证人每季度支付给萨莱。

弗朗切斯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萨莱之死

六个月后，一五二四年六月，弗朗切斯科收到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萨莱要求紧急与他会面。这封以颤抖的笔迹写就的信，暗示着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弗朗切斯科犹豫了。他丝毫不想再见萨莱，不想重新陷入这段他一直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但好奇心占了上风。

他回信约定了一处会面地点，是城墙外一家隐蔽的小酒馆，远离闲杂人等的视线。

当萨莱到达时，弗朗切斯科大为震惊。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几乎认不出来了。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已变成了一个活着的幽灵：佝偻，形销骨立，面色蜡黄，双眼深陷在眼窝里。他不停地咳嗽着，一种沉重的、粘痰的咳嗽，听着都让人难受，有时还朝一块早已染血的手帕里咳出血来。

“萨莱……”弗朗切斯科喃喃道。“我的天啊，你怎么了？”

“是人生找上了我。就是我们在 一五一九年那个五月的夜晚所选择的那种人生。”

他们在酒馆一处昏暗的角落里坐下。弗朗切斯科点了葡萄酒和吃食，可萨莱几乎什么都没碰。他贪婪地喝着酒，却拒绝进食。

“我快要死了。医生们说我患了肺病。我还剩下几个月，顶多一年。”

弗朗切斯科不知该说些什么。面对一个向你宣告自己即将死去的人，该说些什么呢？

“我很难过。”

“不必难过。我活出了自己所选择的人生。我喝过酒，赌过博，爱过我想爱的人。我没有遗憾……或者说，我只有一个遗憾。”

“什么遗憾？”

“那一夜的遗憾。那场盗窃。那些谎言。所有这一切。”
萨莱喝了一大口酒，才继续说道：

“多年来，我一直说服自己，我们做得对。说我们挽救了师父的遗产。说我们的这场恶行，是被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所正当化的。可如今，死亡将近，如今，我必须面对天主的审判，我不禁自问，我们是否只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而偷窃罢了。”

“我们不是为了让自己富有而偷窃。我们是挽救了本会失传的作品！”

“那你为什么卖了那么多件呢？你为什么住在一座豪华的宫殿里？你为什么有一份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这一切，你都是靠这场盗窃得来的。”

弗朗切斯科无法否认这个指控。这是事实。他确实从这场盗窃中获得了物质上的好处。但他也保存下了无价的宝藏。这两个真相并存着。

“你想要我怎么样，萨莱？让我公开忏悔吗？让我归还一切吗？这已经太迟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你做。我只是想最后再见你一面。看着你的眼睛。”

他咳嗽了好一阵。

“我也想提醒你一件事。等我死后，也许会有一位神父来找你。我打算在死前忏悔。我会把一切都告诉那位神父。那场盗窃，那份假遗嘱，一切。”

“你要告发我吗？”

“不，告解的秘密是绝对的。神父不能透露任何东西。可我想让你知道，会有另一个人知道真相。我们的秘密不会随着我彻底消亡。”

弗朗切斯科不知该感到宽慰还是不安。理论上，告解的秘密是绝对的。但在现实中，神父也是凡人，有他们的弱点与诱惑。这样一个足以引爆一切的秘密，真的能永远封存在告解室的静默之中吗？

“萨莱，别这样做。把秘密守到底吧。为了师父。为了他的遗产。”

“为了师父？师父已经死了。他现在才不在乎我们的谎言呢。不，若我要去忏悔，那是为了我自己的灵魂，不是为了师父。”

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吃力地站起身来。

“再会了，弗朗切斯科。我们此生不会再相见了。但愿在另一个世界，我们能因所做的一切而得到宽恕。”

弗朗切斯科望着他踉踉跄跄地消失在米兰的夜色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三个星期后，弗朗切斯科得知萨莱死于一场可疑的死亡。他的尸体被发现时，身上插着一支弩箭。谣传说他是死于一场酒后争执。

弗朗切斯科没有出席葬礼。他寄去了一个花环，为死者的灵魂安息做了一场弥撒，但拒绝被人看见自己在为萨莱服丧。这会引来太多的疑问。会牵扯出太多的联系。

曾悄悄参加了葬礼的蓬皮欧前来汇报情况。

“大约有十来个人在场。村里的几个农人，一个照顾过他的老妇人，还有本堂神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没有认识你的人。”

“那个神父……是他给他做的告解吗？”

“想必是的。可告解的秘密是神圣的。”

“我知道。可我在想，他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他有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有没有提到什么能让人找到我的细节。”

蓬皮欧把手搭在他这位朋友的肩上。

“即便他全都说了，神父也无能为力。他被自己的誓言所约束。那个本堂神父大概只是个乡野的普通人，对米兰艺术界的种种阴谋一无所知。”

弗朗切斯科想要相信这一点。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活在焦虑之中，唯恐有教士上门盘问。这事从未发生。

随着萨莱之死，弗朗切斯科成了这个原始秘密唯一的守护者。蓬皮欧固然知情，但他并未参与最初的那场盗窃。他是一个事后的同谋，而非当事人。

这份孤独令他感到沉重的压力。他如今三十四岁了。他人生的一半已经过去了。他建立起了一座宏伟的社会大厦，但这座大厦，却建立在谎言的地基之上。

伪造遗嘱

一五二四年和一五二五年，是巩固地位的两年。弗朗切斯科日益完善着他的双重生活：白日里是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夜晚则是个谨慎的造假者。他出售一些次要的作品，以维持他的生活开支，同时严守着那些最重要的物件。

这段时期，他开始伪造那份将来成为他反驳盗窃指控之核心的假遗嘱。这项工作要求异乎寻常的耐心与技巧。

他保留着好几封达·芬奇的真迹信件，是在他们共处的岁月中写下的。他细致地研究着师父的笔迹：字母的形态，运笔的力度，特有的倾斜角度，惯用的缩写。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练习，写废了几十张纸，才最终以令人惊叹的精确度重现了达·芬奇的笔迹。

遗嘱写在一张从专门经营此类物品的商人处购得的古旧羊皮纸上。他用化学试剂人为地做旧墨迹，加速其氧化过程。结果得到的文件，看上去仿佛写于一五一九年，此后在正常条件下保存了六年。

内容也经过精心校准。他曾打听过法国遗嘱中所使用的法律措辞。他曾以想要撰写自己的遗嘱为借口，悄悄咨询过一位当公证人的朋友。他曾研究过其他死于法兰西的意大利艺术家所留下的遗嘱。

最终成品是一份听起来无懈可击的文件。达·芬奇在其中把大部分手稿以及某些特定的作品遗赠给了弗朗切斯科。萨莱则获得了一座花园的一半。师父在托斯卡纳的异母兄弟们，则获得了一笔钱和几件家具。仆人们，则得到了些许微薄的酬金。一切都说得过去，前后一致，可信可靠。

他还伪造了那封著名的、写给达·芬奇兄弟们的信，日期为一五一九年六月一日，其中提到了「*最基督教国王陛下*的诏书」，允许师父立遗嘱。这封信是整个构建的关键所在：它解释了达·芬奇尽管是外国人，是如何得以合法转移他的财产的。

最微妙的部分，是营造出这些文件一直都存在的假象。他不能在一五二五年突然拿出这些文件，而不引起任何人的疑问——他为何没有早点出示它们。他必须循序渐进地确立起它们存在的事实。

他开始在与艺术品商人或收藏家的谈话中偶尔提及师父留下了一份遗嘱。他暗示自己持有一份副本，但更倾向于不予公开，以免引发家族纠纷。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一种说法渐渐流传开来：有一份遗嘱存在，尽管很少有人真正见过它。

这个策略最终得到了回报。到了一五二五年，当他开始需要面对日益紧迫的质疑、为他持有这些作品作出辩解时，这份遗嘱的存在，已被许多人默认为一个既定的事实。

昂布瓦兹之行

但弗朗切斯科明白，仅凭一个传言是不够的。要让他这场骗局经得起认真的审视，他需要一份官方的保证，一个扎根于法国公证档案中的立足点。一五二五年春，他踏上了一段充满风险的旅程：重返昂布瓦兹。

从米兰到那里的路程耗时三个星期。弗朗切斯科轻装简行，只带了绝对必需的物品，还有那份他花了数月才打磨完善、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一只衬着丝绸的皮质公文包里的假遗嘱。旅途中的每一站都唤起了他的记忆：里昂，他六年前与萨莱分别的地方；他曾与达·芬奇一同走过的法兰西大道；最后是昂布瓦兹，这座他在师父去世后仓促逃离的城市。

这座城市变化不大。王城依旧以其巍峨的姿态俯瞰着卢瓦尔河。克洛·吕斯庄园，那座达·芬奇度过他生命最后岁月的庄园，如今已被某个不知名的廷臣占用了。弗朗切斯科小心地避免经过那里，唯恐这些地方的景象唤起危险的情感。

他朝着纪尧姆·博罗先生的公证事务所走去，那是一栋典型的、这一带常见的木骨架房屋。这位公证人是一位

年约五十岁、面容严肃的男子。他的事务所昏暗，堆满了登记册，弥漫着古旧羊皮纸与墨水的气味。

弗朗切斯科早已准备好了他的说辞。他自称是达·芬奇的旧日门生，前来办理关于师父遗产的最后手续。他解释道，在达·芬奇去世之际，因丧亲的混乱，某些文件未能被正确登记。他今日希望能弥补这一疏漏。

博罗以一种谨慎警觉的态度听着。当弗朗切斯科从公文包里取出遗嘱时，公证人小心地接过，久久地端详着它。他那双经验丰富的眼睛扫视着这张羊皮纸，在措辞、签名处停留。

“这份文件的日期是一五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博罗以一种中立的语气说道。“而现在是一五二五年五月。已经过去了六年。为什么现在才来登记它？”

“一些复杂的家族情况，先生，”弗朗切斯科以他已排练过百次的从容答道。“师父在意大利的继承人对某些条款提出了异议。我需要一份关于这份遗嘱的官方记录，以维护我的权益。”

博罗把文件放在他的桌上，双手交叠在身前。

“梅尔齐先生，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必须向您提出一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您的师父达·芬奇先生，是否已归化为法国人？”

“师父曾获得弗朗索瓦国王颁授的归化信函，先生。这在我于他去世后不久寄给达·芬奇兄弟们的信中也有提及。”

博罗缓缓摇了摇头。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您瞧，一五一九年五月，就在达·芬奇先生去世之后不久，我便曾被王室国库的官员联系过。艾蒂安·德洛因斯先生和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先

生曾在克洛·吕斯庄园对这位死者的财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点。您可知道他们是依据何种名义行事的吗？”

弗朗切斯科没有回答，猜到了接下来会说什么。

“是依据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博罗以坚定的语气继续说道。“这条权利适用于那些死于法国境内、却未曾获得归化信函的外国人。他们的全部财产会自动归属于王室。若达·芬奇先生已归化为法国人，这条权利便不会适用。王室官员便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这次清点。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没收了那些重要的作品——蒙娜丽莎，圣安妮——如今它们已成为王室珍藏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的沉默沉重地压了下来。弗朗切斯科绝望地寻找着一个答案，一条脱身之路。

“也许这是一个行政上的失误。归化信函也许早已被授予，只是登记不当。又或者，国库的官员们对此并不知情……”

“国库的官员都是专业人士，”博罗打断道。“他们在依据异邦人财产没收权行事之前，会事先核实是否已归化。而我自己，也曾应他们的要求查阅过王室大法官府的登记档案。其中没有一份归化信函以达·芬奇的名义登记在册。我在自己的档案中也留有相关记录。”

弗朗切斯科意识到，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用处。

“博罗先生，”他以一种更为低沉的声音说道，“我要向您坦诚相告。您说得对。归化信函大概从未真正存在过。或者，即便曾经许诺过，它也从未正式获批。师父去世得太快了。可这是否意味着他的遗嘱就必须作废？意味着他想要把他三十年研究的心血遗留给我的这份心愿，必须因为一道手续而被无视？”

“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手续。这是王国的法律。”

“这是一条不公正的法律！弗朗切斯科激动起来。师父曾忠心耿耿地为弗朗索瓦国王效力了三年。他把他最美的作品献给了他。他理应获得归化。若他没有获得，那是由于疏忽，而不是他的过错。”

博罗久久地打量着他，脸上不动声色。

“我理解您的感受。但公证人不能无视法律。您呈交给我的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存在问题。没有归化信函，达·芬奇先生便无法在法国合法立下遗嘱。他所拥有的一切，依据异邦人财产没收权，都应归属于王室。这份遗嘱，即便它反映了他真正的心愿，也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那您有什么提议？让我把一切都还给王室的官员们吗？现在已经太迟了。六年已经过去了。我所拥有的这些作品，是我从被分散、被毁坏的命运中挽救出来的。若没有我，它们早就被卖给商人，或者遗失了。我保存下了师父的天才心血。这算是一种罪行吗？”

博罗站起身来。

“您把我置于了一个艰难的境地，梅尔齐先生。一方面，我理解您的动机。另一方面，我是一名公职人员。我不能为一份我明知在法律上无效的文件作证。”

“我不是要求您为它作证，”弗朗切斯科迅速答道。“我只是请求您把它保存在您的档案中。作为保管人，而非验证人。”

博罗转过身来。

“一份加封存档的寄存？”

“正是如此。您原样保存这份文件，不对其效力做任何表态。若有人对我的继承权提出异议，我至少能说，有

一份遗嘱确实存在，并保存在昂布瓦兹的公证人处。这将赋予我这份持有权一份表面上的合法性。”

“一份表面上的合法性，”博罗带着一丝讥讽重复道。

“您是在要求我参与一场骗局。”

“我是在请求您守护一位伟人的记忆。法律并不完美，博罗先生。有时，真正的正义，需要人们偏离它。”

公证人重新回到桌前坐下，脸上带着思索的神情。

“若我接受这份……加封的寄存，我能得到什么？或者说，我要承担什么风险？因为我要以我的声誉，也许还有我的职位，来冒险接受一份我明知有法律瑕疵的文件的保管。”

弗朗切斯科早已料到这个反对意见。

“昂布瓦兹的圣德尼教堂，我想，急需修缮。五十枚杜卡特金币能为这项工程作出不小的贡献。当然，这是一份为纪念我已故师父而献上的虔诚捐赠。您的名字将出现在恩人名录之中。”

博罗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但弗朗切斯科看见他的手指在扶手上微微收紧了。五十枚杜卡特，对一座小小的乡间教堂而言，是一笔巨款。

“五十枚杜卡特，”公证人喃喃道。“真是慷慨。”

“而对您个人，”弗朗切斯科补充道，“同时又拿出了第二只钱袋，另有二十枚杜卡特。为您在保管这份文件、采取一些特殊防范措施上所要付出的时间。”

博罗看着摆在桌上的两只钱袋。此刻，那份道德上的挣扎在他脸上清晰可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惯于严格遵守法律。但这个提议实在可观。而且，说到底，他到底做了什么该被谴责的事呢？他并未证明遗嘱的真伪。他

也未在法律上确认它的效力。他只是像保管数百份别的文件那样，将它保存进自己的档案而已。

沉默拉长了。弗朗切斯科屏住了呼吸。

“好吧，”博罗终于以一种疲惫的语气说道。“我会把这份遗嘱保存在我的档案中，加以封存。我会为您出具一份寄存证明，证实您把这份文件交给我保管。但有一点我必须绝对说清楚：这份证明绝不能证实遗嘱的真实性，也不能证实它是否符合法国法律。它只能证明，您向我交付了一份您声称是达·芬奇遗嘱的文件。”

“这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先生。”

“而我还会在我的私人登记册中添加一条备注，”博罗以更为坚定的语气继续道，“记录下这次寄存的确切情况，以及我对这份文件法律效力的保留意见。这条备注将保持机密，只会传给我在公证职位上的继任者。这是我个人的保障，若这件事有朝一日被人调查，也是我的保护。”

弗朗切斯科犹豫了。这条备注可能会带来危险。但拒绝可能会让整个谈判功亏一篑。

“我同意，”他说道。“您的保留意见将留在您的私人档案里。那份遗嘱本身呢？”

“它将被保存在一只封存的箱子里，只有凭您本人或您的合法继承人出具书面授权，才能被查阅。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查阅它。”

“那那份寄存证明呢？”

“我马上就撰写。”

博罗取出一张空白的羊皮纸，开始以他那手漂亮的公证人字体书写起来。弗朗切斯科看着那支笔在纸上摩挲，写下这些封存他们这份罪恶协议的字句。

「本人，纪尧姆·博罗，昂布瓦兹王室公证人，兹证明已从米兰绅士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处收到一份文件，据称为已故托斯卡纳艺术家达·芬奇（于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卒于昂布瓦兹）之遗嘱，该文件日期为一五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本人保存，加以封存。证明书立于昂布瓦兹，一五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应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之请。」

博罗在文件末端盖上了他的印章，随后把它递给弗朗切斯科，弗朗切斯科怀着巨大的宽慰接过了它。

“好了，办妥了。那给圣德尼的五十枚杜卡特？”

弗朗切斯科把第一只钱袋放在桌上。

“至于另一笔款项……”

他悄悄把第二只钱袋推向公证人，公证人以一个迅速的动作把它塞进了抽屉，让它消失不见。

博罗站起身来，示意这次会面已经结束。

“梅尔齐先生，我希望自己不必为刚才所做的事而后悔。我给了您您所要求的東西，但请知晓，我是违背良心行事的。若这件事日后给任何人带来了伤害，我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不会有任何人受损的，博罗先生，”弗朗切斯科向他保证道。“恰恰相反。师父的作品将得以保存，被人研究，传承给后世。这难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也许吧。又或许，我只是被人收买了罢了。时间会给出答案。”

弗朗切斯科离开了公证事务所，那份证明被小心地折叠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出门去，来到昂布瓦兹阳光明媚的街道上，他感受到一种复杂交织的情绪：因成功而生的

宽慰，因腐蚀了一个正直之人而生的愧疚，以及因将自己的谎言植入官方档案而生的满足感。

他所不知道的是，独自留在事务所里的博罗，正在他的私人登记册中写下一条详尽的备注：「本日，一五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收到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一份据称为达·芬奇遗嘱的文件。经检视，此文件在法律上存在严重的疑点。第一，达·芬奇先生从未获得归化信函，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已于一五一九年适用于他的遗产，使任何遗嘱均归于无效。第二，此文件的措辞不符合公证惯例。第三，梅尔齐先生无法提供任何见证此遗嘱撰写过程的证人。尽管如此，本人仍同意封存保管此文件，而不以任何方式对其真伪予以证明。指示予我的继任者：未经梅尔齐继承人的书面授权，绝不出示此文件。妥善保存此备注，且仅传交下一任接任此职之公证人。」

这条备注将隐藏三个世纪，在博罗家族中代代相传，成为一条秘密的链条，出于一份无心的共谋，一直守护着弗朗切斯科这场骗局，直到十九世纪末，博罗家族的绝嗣才终于让真相得以逐渐浮出水面。

弗朗切斯科对博罗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地记录了他的疑虑一无所知，翌日清晨便离开了昂布瓦兹。回米兰的路程比来时轻松了许多。他的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份假遗嘱如今拥有了官方的存在，一个扎根于法国公证档案中的立足点。更妙的是，那份寄存证明标注了一个倒填的日期，赋予它表面上六年的追溯效力——没有人能证明这份文件并非早在一五一九年就已寄存，即便这份证明实际上是一五二五年才签发的。

这场骗局至此已彻底完成，由一位公证人的沉默所守护，而他那份不安的良心，将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由他的整个家族一同承担。

特里武尔齐事件

威胁真正现出原形，是在一五二五年十月，以蒙席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的身份出现的，一位野心勃勃、酷爱艺术的高级教士。

早在他们第一次会面之前，弗朗切斯科便早已听闻过特里武尔齐的大名。此人是米兰知识生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达瓦洛斯总督的施赈神父，多家学术院的成员，一位以其挑剔的品味与百科全书式的学识闻名的收藏家。人们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不差一字地引述老普林尼或圣奥古斯丁的大段文字。

使特里武尔齐尤其令人生畏的，是他对真相与真实性的执着。他曾靠揭穿好几起赝品事件而建立起自己的名声——一份所谓的西塞罗手稿，最终被证实是十四世纪的伪造品；一尊「古代」雕像，实际上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在米兰的文化圈子里，人们戏称他为「猎犬」，因为他有着嗅出骗局的本领。

弗朗切斯科第一次遇见特里武尔齐，是在一五二五年九月公爵宫的一场招待会上。这位高级教士是位约莫四十岁的男子，身材高大瘦削，面容棱角分明，让他显得永远带着一副怀疑的神情。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锐利而灵活，仿佛能观察一切，记录一切，分析一切。

在那场招待会上，特里武尔齐穿梭在宾客之间，在每一件展出的艺术品前停下，细细审视。弗朗切斯科远远地观察着他，希望能避免任何交谈。但命运另有安排。

“梅尔齐先生，对吧？”特里武尔齐一边走近一边说道，手中端着一杯葡萄酒。“伟大的达·芬奇的旧日门生？”

弗朗切斯科转过身来，露出一个他希望显得自然的礼貌微笑。

“正是在下，蒙席。您认识我吗？”

“只是耳闻。可这名声着实不小！人们说，您拥有除王室收藏之外最精美的达·芬奇作品收藏。说您已成为公认的师父研究权威。说欧洲最伟大的收藏家们都会向您请教。”

特里武尔齐的语气中带着某种东西，也许是一丝细微的讽刺，令弗朗切斯科心生警觉。

“传言总是夸大其词的，蒙席。我确实有幸侍奉师父多年，这是真的。但要说我是什么权威……”

“假谦虚，”特里武尔齐打断道。“我见过您卖出的一些作品。它们确实是真迹，毫无疑问。多维齐枢机主教给我看过他那些植物学图画。真是件瑰宝。达·芬奇的手笔，千真万确，一目了然。”

“我很高兴蒙席对他的收藏感到满意。”

“满意？他对此欣喜若狂。虽然他有时也会疑惑……该怎么说呢……疑惑这些图画确切的来历。”

弗朗切斯科的心跳得更快了，但他仍保持着面无表情。

“来历很简单，蒙席。这些是师父在他的遗嘱中遗赠给我的物件。一切都有完整的文件记录。”

“啊，是的，那份遗嘱。我听说过这份遗嘱。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真正见过它。人们谈论它，引用它，可这份文件本身，却奇异地……难以捉摸。”

弗朗切斯科感到汗水沁上了额头，尽管这个秋夜相当凉爽。

“这份遗嘱保存在法国，在登记它的那位公证人那里。自然，我持有一份认证的副本，但原件仍留在昂布瓦兹的公证档案中。”

“真是方便，”特里武尔齐以柔和的语气说道。“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可惜却无法核验，被保存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

“蒙席，若您在暗示什么……”

“我什么都没暗示，梅尔齐先生。我只是在自问自答罢了。这是我的天性。我是个好奇的人。有人对我说，有时太过好奇了。”

一名仆人端着一盘精致的点心走过。特里武尔齐随手拿了一件，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弗朗切斯科。

“请告诉我，先生，”这位高级教士继续说道，“弗朗索瓦国王曾颁给师父归化信函的这个说法……您确定吗？”

“绝对确定。这在我于他去世后写给达·芬奇兄弟们的信中也有提及。”

“有意思。因为您瞧，我在巴黎有一位通信人，一位学识渊博的同僚，能接触王室档案。他最近给我写信说，王室大法官府的登记档案中，没有一份归化信函以达·芬奇的名义登记。”

弗朗切斯科感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特里武尔齐已经进行过调查了。他已向法国的信息源核实过了。这场表面上偶然的对话，实际上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审问。

“档案也许并不完整，”弗朗切斯科努力保持镇定地答道。“文件是会遗失的，尤其是在战乱时期。这些年来，法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

“想必如此，想必如此，”特里武尔齐点了点头，附和道，但那点头丝毫看不出他有几分信服。“但无论如何，这令人不安。国王颁授的归化信函，是一份重要的文件。理应留有痕迹才对。”

一群宾客走了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弗朗切斯科趁机借口有紧急约会而脱身。但这不过是延后了这场对峙。特里武尔齐已经盯上了他。

接下来的几天里，弗朗切斯科得知这位高级教士正在整个米兰打听有关他的情况。他向那些曾为他出售作品做过中间人的艺术商人，向那些购买了作品的收藏家，向那些拟定过销售合同的公证人一一问询。

“他做事很严谨，”蓬皮欧在他们的一次秘密会面中汇报道，“他什么都记录下来，编成清单，比对证词。他就像是在组建一份指控卷宗。”

“可依据什么呢？弗朗切斯科激动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拥有我师父的作品，一份我合法继承来的遗产？”

“他怀疑你的这份遗产没有你所声称的那样合法。而说实话，他没有说错。若他一旦拿到确凿的证据……”

“没有证据！”弗朗切斯科打断道。“我伪造的那些文件是完美的。那份遗嘱与真迹无法分辨。那些信件无懈可击。他什么都证明不了。”

“问题不仅在于那些实物证据。而在于整个故事的逻辑。特里武尔齐是个善于分析的头脑。他会寻找那些不一致之处，那些对不上的细节。而我们这套说法，无论构建得多么精密，都有它的破绽。”

“哪些破绽？”

“第一，法国档案中缺失归化信函。我们编造了这些信函，以解释达·芬奇如何能够立遗嘱，可若它们在官方登记档案中并不存在，我们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第二，时间问题。你为什么要等六年才把遗嘱在法国登记？这很可疑。第三，那些证人。你声称曾见证遗嘱、或曾接受过师父馈赠的那些人……有些人根本记不清，有些人的说法前后矛盾。”

“这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多年后自然会有遗忘。”

“对你我而言，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可对特里武尔齐来说，这些是一场骗局构建中的破绽。而他，有着足够的才智与韧性去挖掘它们。”

“你的意思是？我该逃离米兰吗？该放弃我所建立的一切吗？”

“不。我建议我们准备一套有力的辩护。加固我们这套说辞的薄弱之处。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办法，在特里武尔齐真正变得危险之前，把他化解掉。”

“怎么化解？”

“有好几个办法。我们可以在他自己的收藏上散布一些疑点，以此败坏他的名声——我听说他有一尊 /古罗马/ 小雕像，很可能是件现代赝品。我们也可以动用你与总督的关系，让他被取消调查授权。或者，我们也可以干脆收买他——每个人都有他的价钱。”

弗朗切斯科转过身来，被这最后一个提议震惊了。

“你是在说贿赂吗？”

“我更愿称之为谈判。特里武尔齐是个收藏家。给他几件出色的物件，他也许就不会那么……热心于他的调查了。”

这个想法令弗朗切斯科感到厌恶，但他无法否认其中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他的价钱。问题在于，特里武尔齐是不是那种价钱可谈的人。

一个星期后，弗朗切斯科收到了特里武尔齐一封正式的信函，邀请他前往主教府「*就已故达·芬奇先生的遗产问题，商讨若干共同关切之事*」。信中的语气客气得体，但这份邀请，实质上无异于一场传唤。

弗朗切斯科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前往赴约，蓬皮欧陪同在侧，被他介绍为自己的法律顾问。他们被接待进了特里武尔齐的私人书房，一间四壁书架林立的朴素房间，一座巨大的深色木雕十字架俯视着一张巨大的书桌。

特里武尔齐以一种面无表情的礼貌迎接了他们。

“梅尔齐先生，博尼尼先生，感谢二位前来。请坐吧。”

他们在这位高级教士示意的那两张并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特里武尔齐坐到书桌后方，双手交叠在身前，摆出一副仿佛法官即将宣读判决的姿态。

“我就开门见山了，”他开口道，“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悄悄调查您那批达·芬奇作品收藏的来源。这次调查，揭示出了几处……令我深感不安的矛盾之处。”

弗朗切斯科感到喉咙一紧，但他努力显得镇定。

“矛盾之处，蒙席？是哪些？”

特里武尔齐翻开摆在他面前的一本登记册，开始以一种检察官般的精确列举起他的种种发现：

“第一，那份著名的归化信函。在法国任何官方登记档案中都不存在。我已请三个独立的信息来源核实过了。第二，遗嘱本身。除了您之外，从未有人见过它。您声称它保存在昂布瓦兹一位公证人那里，可您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它已被登记。第三，某些您声称继承来的作

品，并未出现在王室官员一五一九五年五月编制的达·芬奇财产清单中。尤其是一幅《施洗者圣约翰》和一幅《丽达与天鹅》，众所周知它们在师父去世前不久还在他的画室里。”

他合上登记册，直视着弗朗切斯科的眼睛。

“梅尔齐先生，您如何解释这些矛盾之处？”

弗朗切斯科深吸了一口气。若他表现得太过防御，便会坐实特里武尔齐的怀疑。若他表现得太过傲慢，便会刺激他继续深入调查。必须找到恰到好处的语气：既要足够义愤，显得是真心受到冒犯，又要足够配合，不至于显得心中有鬼。

“蒙席，”他以一种平静的语气开口道，“我理解您对真相的执着。这在一位教会中人身上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但请容我逐点回应您……所关切的这些问题。”

他掰着手指，模仿着特里武尔齐的姿势：

“第一，关于归化信函的问题。它们有可能确实从未被正式记录在大法官府的正式登记档案中。弗朗索瓦国王有时会通过公开诏书授予一些特权，而这些诏书并不走通常的行政流程。师父与国王私交甚笃。他很可能得到过口头的保证，或是一些不出现在官方档案中的私人文件。”

“口头的保证不构成合法的归化，”特里武尔齐反驳道。

“想必如此。可考虑到当时的情境，考虑到达·芬奇与国王之间的私人交情，这样的保证在当时可能已被视为足够。请您记得，师父当时年事已高，又患病在身。手续也许并非他优先考虑的事。”

特里武尔齐似乎并不信服，但他示意弗朗切斯科继续。

“第二，关于遗嘱的问题。它确实存在。我持有一份昂布瓦兹公证人出具的证明，确认它已加封保存在他的档案中。若您愿意，我可以把这份证明拿给您看。”

“证明并非遗嘱本身。”

“的确如此。但这份遗嘱包含着一些我并不希望公开的私人条款。它提及了对一些已不在人世之人的遗赠，一些微妙的家族安排。若将它公之于众，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題，而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題。”

“真方便，”特里武尔齐喃喃道。

弗朗切斯科不理會这句打断，继续说道：

“第三，关于那些未出现在王室清单中的作品。必须理解当时的情境。这份清单是在师父去世后一片混乱之中匆忙制成的。有些作品在师父去世之前便已离开了画室。比如那幅《施洗者圣约翰》，在师父去世前的好几个星期，就已被托付给我保管，师父希望我继续在上面进行创作。因此，清点时它并不在画室里。”

“您有证人能证明这……提前托管的事吗？”特里武尔齐带着怀疑问道。

“有。博纳瓦尔先生，为师父诊治的药剂师。玛格丽特·德·罗昂夫人，经常造访克洛·吕斯庄园。圣弗洛朗坦礼拜堂的教士，常来为师父听告解。他们都能作证，某些作品在师父正式去世之前就已归我所有。”

这是一个大胆的谎言，但弗朗切斯科明白，即便这些证人被问及，他们所给出的回答也会含糊其辞，可以往有利的方向去解读。药剂师和教士都收到过一些「礼物」，这会让他们不愿反驳弗朗切斯科的说法。而两年前已经去世的玛格丽特夫人，则根本无法出面作证了。

特里武尔齐记着笔记，他的笔在纸上摩挲，发出的干涩声响，在这书房的寂静中回荡着。

“这些证人，”他终于抬起眼来说道，“您最近都联系过他们，对吧？为了「唤醒他们的记忆」？”

这是一个陷阱式的问题。承认联系过他们，无异于承认曾试图操纵证词。否认，又是一个很容易被核实出来的谎言。

弗朗切斯科选择了第三条路：

“我确实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书信往来，是的。六年之后，唤起记忆是很自然的事。可我从未向他们暗示过任何虚假的内容。我只是请他们回忆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以一种极为凑巧的方式，他们的记忆竟恰好与您的说法完全一致。”

“蒙席，”一直保持沉默的蓬皮欧此时开口道，“这场谈话已经具有了审问的意味。梅尔齐先生没有任何义务向您做出解释。您是依据什么权威进行这场调查的？”

“依据我良心的权威，博尼尼先生。当我看到暗示可能存在欺诈的种种矛盾之处时，我认为，进行调查是我道义上的职责。若梅尔齐先生问心无愧，就不该畏惧我的问题。”

“他并不畏惧。可他对您的动机存有疑问。您是出于对真相的真挚渴望而行事的吗？还是有别的……更为个人的原因？”

特里武尔齐的脸僵住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您觊觎这批收藏中的某些作品。您曾多次试图购买，均未成功。您这份……调查的热忱，是不是恰恰源自这份挫败感呢？”

这是一记大胆的一击。特里武尔齐从未试图购买弗朗切斯科的任何东西。但这个指控，若公开抛出，可能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

特里武尔齐猛地站起身来，几乎打翻了他的墨水瓶。

“你怎么敢！我是教会中人！我不会被贪欲所左右！”

“当然不会，蒙席，”弗朗切斯科连忙说道。“我的朋友言辞不当。他并非质疑您的操守。可您必须理解我们的处境。您的这些问题，无论多么合情合理，都在营造出一种对我们有害的猜疑氛围。若关于作品来源的流言四起，收藏家们会犹豫是否要购买。”

特里武尔齐缓缓重新坐下，显然内心正陷入一场挣扎。一方面，他的直觉告诉他，弗朗切斯科在撒谎，这整个关于合法遗产的故事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他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只有一些矛盾之处和怀疑。

“梅尔齐先生，”他终于以一种更为平静的语气说道，“我要向您坦白。我认为您的这份遗产，并不像您所声称的那样清白无瑕。我认为，某些文件已被……美化过。也许甚至是伪造的。可我也承认，我并没有蓄意欺诈的正式证据。”

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因此，我会继续我的调查。我会写信给我在法国的联系人，以获取更多信息。我会询问您提到的那些证人。若我找到哪怕一丝确凿的伪造证据，我不会犹豫将此事交由相关当局处理。我说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蒙席，”弗朗切斯科一边站起身来一边答道。“请容我补充一句，我祝您的调查一切顺利。因为您绝不会找到任何能撼动我这份遗产合法性的东西。”

他们在一片紧张的沉默中离开了主教府。走到街上，蓬皮欧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有个麻烦。一个大麻烦。”

“我知道，”弗朗切斯科喃喃道。“特里武尔齐是不会放手的。他就像一只叼着骨头的狗。他会继续深挖，询问，核实。而迟早，他会找到破绽的。”

“那我们就得在他找到那个破绽之前行动。我们要么说服他放弃调查，要么将他败坏得足够彻底，让没有人会当真对待他的指控。”

弗朗切斯科点了点头，但他的心情沉重。这次拜访标志着一段极度焦虑时期的开端。

特里武尔齐离开后，两人把自己关在了这座小宫殿的书房里。

“他知道些什么，”弗朗切斯科紧张地断言道。“或者至少，他有所怀疑。他所威胁要发起的这场调查，可能会揭露一切。”

蓬皮欧深思了良久，才答道：

“特里武尔齐之所以令人生畏，是因为他既聪明又固执。但他也有他的弱点。我们必须找出这些弱点，加以利用。”

“哪些弱点？”

“首先，他的自负。这是一个自认为比别人更聪明的人。若我们给他一个既能奉承他的敏锐、又能把他引向一条错误方向的解释，他也许会顺着去追查。其次，他

的野心。特里武尔齐不过是总督的施赈神父。他梦想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职位，也许是一个主教之位。若我们能让总督明白，特里武尔齐进行这场调查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你是在建议让他的上司把他叫去训斥一顿？”

“正是如此。达瓦洛斯总督很欣赏你。你是他的艺术顾问。若你能让他明白，这场调查给你造成了无端的伤害，特里武尔齐的行事出于个人的嫉妒，而非对正义的关切，达瓦洛斯也许会出面干预。”

弗朗切斯科思忖着这个提议。这有风险。若总督站在特里武尔齐一边，局势将会恶化。但什么都不做，同样危险。

“我会考虑最好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准备好我们的辩护。我伪造的那些文件够不够有说服力？”

“遗嘱和那封写给兄弟们的信非常出色，”蓬皮欧向他保证道，“但其余的部分需要加固。向特里武尔齐提及的那些证词，必须巩固起来。圣弗洛朗坦的教士，博纳瓦尔先生，玛格丽特·德·罗昂夫人……所有人都必须收到承诺给他们的作品，并准备好以一致的方式作证。”

“如何在不引起他们疑心的情况下让他们做好准备呢？若我把他们该说的话解释得太清楚，他们就会明白我是在要求他们撒谎。”

“不需要向他们解释。把那些作品寄给他们，随信暗示他们早已从师父那里收到过这些作品，只是遗忘了。面对一件突然收到的艺术品，大多数人只会高兴不已，根本不会追问。”

弗朗切斯科采纳了这个建议。他悄悄派信使前往法国，带着精心包裹的包裹。给圣弗洛朗坦的教士，他寄去了达·芬奇的三幅植物学图画，并附上一封信：

「敬爱的神父，在整理我已故师父的档案时，我重新发现了这几幅图画，他本来打算在他最后的病中，为感谢您的精神扶持而赠予您。出于对他心愿的尊重，我今日将它们转交给您，虽已迟了数年，但可以向您保证，这确实出自他的手笔与他的心意。」

这番措辞十分巧妙。它暗示师父曾有意赠送这些图画，却未言明这份馈赠是发生在他生前，还是弗朗切斯科如今才代为完成。教士收到这些珍贵的作品后，能凭着一份良心，作证说自己是「在师父在世时」收到过他亲笔所绘的图画，而技术上并未撒谎，却营造出了所需的印象。

他对其他证人也如法炮制。给每个人都寄去了几件不太重要的作品，并附上一封含糊其辞的信。大多数人都心怀感激地回了信，没有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唯有药剂师博纳瓦尔先生表现出了一丝困惑：

「先生，谢谢您这几幅精美的药用植物研究。然而，也许是我的记忆有误，我不记得已故的师父生前曾把它们赠予我。会不会是您如今为纪念他，才将它们送给我的呢？」

这个回复眼看着要毁掉整套策略。若博纳瓦尔作证说自己从未从师父那里收到过任何东西，那将令所有其他的证词都陷入怀疑之中。弗朗切斯科不得不出手应对。

他给这位药剂师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师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曾分赠了许多作品，但有些受赠人在丧亲之痛的困扰下，并未对此留有清晰的记忆。他暗示，博纳瓦尔或许是在悲伤中忘记了这份馈赠。

随后，更为重要的是，他又给博纳瓦尔寄去了第二封信，是一封机密信件，其中他解释说，一场心怀恶意的调查正在进行，一些心存嫉妒的人正试图撼动师父这份

合法遗产的地位。他请求这位药剂师，若他被人问询，务必确认自己是「在师父尚在世时」收到这些图画的。这第二封信颇有风险。它把博纳瓦尔变成了一个心知肚明的同谋。但弗朗切斯科别无选择。他必须确保这位药剂师的证词万无一失。

博纳瓦尔，一个单纯而忠厚的人，同意按所要求的说法作证。在他的回信中，他写道：

「先生，经过深思，并查阅了我的记录，我想起来了，师父确实是在他最后的病中，为感谢我的诊治而把这些研究交给我的。悲伤曾使我的记忆变得模糊，但现在一切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若有任何官方来问询我，我会毫不犹豫地确认这份馈赠。」

弗朗切斯科松了一口气。一位关键证人被稳固了下来。但这次意外让他看清了自己这套构建的脆弱之处。只要有一个证人反悔，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特里武尔齐的调查

特里武尔齐没有浪费时间。一五二五年十一月一到，他便着手他的调查。他先是给他在法国的联系人——让·德·贝莱主教，芒斯教区主教，他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中颇有人脉——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颇为巧妙：

「至为敬爱的神父，我需要您就一桩微妙的事件为我指点迷津，此事关乎一位已故于法国的意大利艺术家的遗产。达·芬奇，这位声名显赫的托斯卡纳画家，于一五一九年在昂布瓦兹去世。他一位如今定居米兰的旧日门生，声称依据国王所颁授的归化信函而得以立下遗嘱，因而继承了他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您能否在王室档案中

核实，这样的信函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否有一份遗嘱曾经登记在案？」

由于米兰与巴黎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次调查耗时数月。在等待回复期间，特里武尔齐在米兰当地展开了他的调查。

他首先询问了达·芬奇在意大利的继承人，师父在托斯卡纳的异母兄弟们。老大朱利亚诺·达·芬奇先生，被以一桩公证事务为由传唤至米兰。特里武尔齐在主教府接见了，向他询问。

“朱利亚诺先生，您是否从您已故的兄弟那里得到过遗产？”

“是的，蒙席，”朱利亚诺答道，“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公证人。我得到了一些家具，一些衣物，还有一笔不多的钱。我和我的兄弟安托尼奥分了这些财产。”

“那艺术品呢？画作，图纸，手稿？”

“有几幅图画。是些没什么市场价值的预备习作。我的兄弟达·芬奇并不富有，与某些人所以为的相反。他大部分重要的作品，在他生前就已经卖掉或送人了。”

“这些遗产，是通过谁转交给你们的？”

“是通过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转交的，他曾是我兄弟最亲近的门生。他把归属我们的物件寄给了我们。”

朱利亚诺离开后，特里武尔齐在他的登记册中记下：

「意大利的继承人们证实收到过一些次要的作品，但对梅尔齐并未流露出任何怀疑。他们的证词价值有限，因为他们在师父去世时并不在法国。」

特里武尔齐接着询问了好几位曾通过弗朗切斯科购得达·芬奇作品的米兰艺术商人和收藏家。所有人都证实

他持有师父的作品，并偶尔出售。但没有一人能提供证明其合法来源的文件。

一五二零年购得那十二幅植物学图画 of 贝纳多·多维齐·达·比比恩纳枢机主教，也被问询了。

“尊敬的阁下，您购买这些图画时，可曾要求梅尔齐先生证明这些作品确实合法属于他吗？”

枢机主教带着一丝恼怒答道：

“特里武尔齐蒙席，我不是一个牲畜贩子，去核实每一头牲畜的来历。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当有人向我提议一些优质的作品时，我审视的是它们的艺术真伪。法律上的合法性，我并不感兴趣。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曾是达·芬奇的门生。他持有他师父的作品是自然而然的事。我看不出有任何怀疑的理由。”

“可若这些作品是偷来的呢？”

“偷自谁人之手呢？师父已经去世了。他没有直系继承人。他的兄弟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那份。弗朗切斯科又能偷了谁呢？法国国王吗？可国王早已拥有《蒙娜丽莎》和其他重要的作品。他对弗朗切斯科出售的那些物件，从未表示过任何异议。”

这个论点，特里武尔齐从许多其他收藏家那里都听到过，效果极为惊人。既然没有原告，又有谁能指控弗朗切斯科盗窃呢？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确实让法国王室占了便宜，但弗朗索瓦一世似乎并不在意此事。没有明显的受害者，一桩罪行便难以追究。

反击

在特里武尔齐进行调查的同时，梅尔齐也没有闲着。他决定先发制人，而不是被动等待。

他的第一步，是请求私下觐见达瓦洛斯总督。这是一位职业军人，行事作风粗犷。他欣赏弗朗切斯科的艺术学识以及他为其收藏搜罗优质作品的能力。

四月的一个早晨，弗朗切斯科前往公爵宫，臂下夹着一幅用红色天鹅绒包裹的小画。他被接待进了总督的私人书房，一间陈设简朴、摆着线条硬朗的西班牙家具的房间。

“阁下，”寒暄过后弗朗切斯科开口道，“我此来是想请教您关于一件棘手事务的意见。特里武尔齐蒙席正在调查我从已故师父达·芬奇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他似乎在质疑其合法性。”

达瓦洛斯皱起了眉头。

“特里武尔齐？我的施赈神父？他有什么权力进行这样的调查？”

“这也正是我所疑惑的，阁下。特里武尔齐是奉您的命令行事吗？还是他擅自越权了？”

总督向来不喜欢有人未经他的授权在他背后擅自行事，冷冷地答道：

“没有人向我请求过许可。若特里武尔齐采取了这一举动，那是他自己的主意。”

“阁下，”弗朗切斯科接着说道，“我担心特里武尔齐蒙席的动机并非那样高尚，并非仅仅出于对正义的追求。他觊觎我收藏中的某些作品。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购买的要求，都被我拒绝了。我担心这场调查，不过是逼我贱价出售的一种施压手段。”

这是个谎言。特里武尔齐从未提出过购买的要求。但弗朗切斯科赌的是，总督不会去核实这个说法，而更愿意相信他的艺术顾问，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施赈神父。

这一赌局赢了。达瓦洛斯本就不太喜欢特里武尔齐——在他看来，此人是个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

“若真是如此，那是不可容忍的。我不能容忍我府中之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滥用其职权。”

“阁下，我并不想给特里武尔齐蒙席带来麻烦。也许我们能让他明白，这场调查已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应当把心思放在他的宗教职务上？”

达瓦洛斯点了点头。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特里武尔齐会受到一番敲打的。而为了向您证明我对您的操守的信任，我愿意接受您似乎已带来的这件作品。”

弗朗切斯科打开了包裹：一幅由他亲手临摹自达·芬奇一幅原作、题为「圣母子」的小画。这不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物件，但制作精良，能满足总督的自尊心。

“阁下，能将它献给您，是我的荣幸。这幅摹本是我在师父本人的指导下所完成的，如今属于您了。”

达瓦洛斯满意地端详着这幅画。他并非一个足够精通的行家，无法分辨摹本与原作的区别，而弗朗切斯科也没有戳破这一点。

“我会把它挂在我的私人卧房里。它将时刻提醒我您的忠诚与才华。”

弗朗切斯科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离开了公爵宫。他成功地让总督站到了特里武尔齐的对立面。但这只是一场战役，不是整场战争的胜利。这位高级教士不会轻易被吓退的。

最后的对峙

几天后，弗朗切斯科收到了一份传唤，「为了澄清他调查中的若干疑点」。特里武尔齐没有放弃。

弗朗切斯科和蓬皮欧前往了主教府。他们被接待进了同一间书房，那正是弗朗切斯科第一次与这位高级教士对峙的地方。

特里武尔齐以一种礼貌的冷淡迎接了他们。

“梅尔齐先生，我已继续进行了关于您那份所谓遗产的调查。我询问了意大利的继承人，好几位收藏家，也写信到了法国核实您所依恃的那份归化信函是否存在。”

“那您发现了什么，蒙席？”

“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意大利的继承人证实了他们收到了一份遗产。收藏家们证实了您持有达·芬奇的作品，但没有一人能证实这些作品的合法来源。至于法国那边，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蒙席，您是依据何种法律权限进行这场调查的？梅尔齐先生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过控诉。”

若您手上有犯罪的证据，您应当把它们交给相关的司法当局。可您并没有这样的证据，不是吗？您只有怀疑和暗示。

紧张的气氛升高了。弗朗切斯科插话以缓和局面：

“蒙席，我理解您对正义的执着。可我向您保证，我这份遗产是合法的。若您愿意，我可以给您看看确立我这些权利合法性的遗嘱与信函。”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他伪造的那些文件的一份副本，以及博罗出具的证明。他把它们放在特里武尔齐的桌上。

这位高级教士久久地端详着它们，翻来覆去地看，寻找着伪造的蛛丝马迹。

“这些文件乍看之下似乎是真的，”他承认道。“但表面上的真实性并非最终的证据。应当请书写专家来检验它们。”

“我对此毫无异议，”弗朗切斯科从容地答道。“您想请谁来检验都行。您会发现它们都是真的。”

这是一次大胆的虚张声势。弗朗切斯科赌的是，特里武尔齐不敢真的请专家来分析这些文件，因为那意味着要公开揭露他的怀疑，并冒着被证明是错的风险。

这个赌局成功了。特里武尔齐不愿意提出一个自己无法证明的指控而丢了面子，宁愿选择拖延。

“我会在决定后续动作之前，等待法国方面的回复。与此同时，梅尔齐先生，我建议你不要出售任何重要的作品。若我的调查揭示出任何不规之处，这些交易可能会被撤销，而您将被要求向买家退款。”

“我记下了您的建议，”弗朗切斯科答道。“但我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我的遗产。”

说完这番话，弗朗切斯科和蓬皮欧离开了主教府。走到街上，蓬皮欧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你玩得真险。若特里武尔齐真让专家检验了你的文件……”

“他不会那样做的，”弗朗切斯科打断道。“他是个教会中人，不是法官。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手段去展开一场真正的司法调查。他所能做的，只是提出问题，寄希望于我会露出破绽。可我不会露出破绽的。”

法国来信

一五二六年七月，特里武尔齐收到了他一直期待的来自法国的回复。德·贝莱主教写道：

「至为敬爱的神父，我已按您的要求对这桩达·芬奇的事件进行了调查。我查阅了审计院的档案，并询问了一五一九年负责办理这位死者财产清点的官员们。以下是我所能确认的：

官方登记档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有归化信函颁授给达·芬奇。我核实了两次，结果都是一样：一五一五年至一五一九年间，没有任何以此人名义登记的公开诏书。

艾蒂安·德洛因斯先生与纪尧姆·德·蒙科尔内先生于一五一九年五月所制定的死者财产清单中，未提及任何遗嘱。这些作品依据适用于未曾归化便去世的外国人的法律，以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的名义被没收。

有好几件重要的作品并未出现在这份清单上，而它们本应在其中，尤其是一幅《施洗者圣约翰》和一幅《丽达与天鹅》，我们知道在师父去世前不久它们还在他的画室里。

这些证据强烈暗示，梅尔齐先生已从王室清单中窃取了作品，并伪造了一份假遗嘱来为其持有辩护。然而，弗朗索瓦国王陛下并未表示任何要追究此事的意愿。国王已经拥有了《蒙娜丽莎》以及好几件其他重要的作品，他并不希望为了追回那些身处意大利的物件而发起代价高昂的诉讼。

总而言之，您有理由怀疑存在欺诈行为，但在无法接触到原始文件的情况下，这份欺诈无法被确定无疑地证明，而即便能够证明，似乎也没有任何人有意愿去追究它。」

特里武尔齐反复阅读了这封信好几遍，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弗朗切斯科确实窃取了这份遗产。另一方面，似乎没有任何官府愿意去追究此事。这位高级教士再次传唤了弗朗切斯科，但这一次，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不再试图揭穿这个造假者。他要谋求一些让步。

“梅尔齐先生，”特里武尔齐在这次会面中说道，“我从法国收到的消息对您并不有利。然而，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明白，有些情境是复杂的。而有时，成文的法律并不能符合道义上的真相。”

弗朗切斯科对这种语气的转变感到意外，谨慎地保持着沉默，等着看这位高级教士到底要说什么。

“以下是我的提议，”特里武尔齐继续道。“我不会继续我的调查。我会公开承认您这份遗产表面上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您要向米兰的教会捐赠您收藏中的一件重要作品。就说十来幅图画吧，把它们收藏在总主教府的图书馆里，供医生和学者们查阅。”

弗朗切斯科明白了这一手段。特里武尔齐在法律上无法揭穿他，于是便转而想要向他勒索。这是一场包裹在友好协商外衣下的敲诈。

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慨。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也许，满足特里武尔齐的要求，胜过继续留着一个危险的敌人。

“蒙席，”弗朗切斯科思索过后答道，“您的提议很有意思。不过，您所觊觎的这些图画，属于我这批收藏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它们的价值无法估量。若我要割舍它们，唯一的条件，是绝对确保您会停止一切调查，并公开维护我这份遗产的合法性。”

“您有我的保证，”特里武尔齐向他担保道。

“一位高级教士的口头承诺，并非一份法律文件，”弗朗切斯科反驳道。“我要一份书面的协议，签字盖印，其中您承诺承认我的遗产，且永远不再质疑我的权利。”特里武尔齐犹豫了。这样一份文件将使他成为同谋。但那些图画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好吧。我的秘书会起草这份协议。”

这份文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制定完成。弗朗切斯科在蓬皮欧的指点下，确保它在法律上滴水不漏。特里武尔齐承诺「承认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先生从已故达·芬奇处所获遗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停止对构成该遗产之作品来源与出处的一切现有及未来调查」。

作为交换，弗朗切斯科将向总主教府捐赠十幅达·芬奇的亲笔图画，以及一百枚杜卡特金币，用于修建大教堂内的一座新礼拜堂。

这份协议于一五二六年八月在证人的见证下签署。对弗朗切斯科来说，这是一场苦涩的胜利。他不得不割舍了几件珍贵的作品，但他从他最主要的一位质疑者那里，换来了对他遗产的官方认可。这份认可，值得所付出的代价。

签署完毕后，特里武尔齐带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微笑对他说道：

“梅尔齐先生，我至今仍不知道您的遗嘱究竟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您是一个非凡聪明、意志坚定的人。师父选人不曾看走眼。”

弗朗切斯科不知该如何解读这番话。这是一份真心的赞美？还是最后一根带着讥讽的刺？他选择不予作答，带着他的文件离开了主教府。

在街上，蓬皮欧忧心忡忡地等候着他。

“怎么样？办成了吗？”

“办成了。特里武尔齐得到了他的赎金。我们换来了我们的安宁。”

“你做得很好。十幅图画换整批收藏的安全，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弗朗切斯科点了点头，但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苦涩。他刚刚割舍的这十幅图画，代表着达·芬奇多年的心血。它们是无可替代的物件。而他把它们牺牲了，只为了买通一个贪婪的高级教士的沉默。

“至少，”蓬皮欧安慰道，“它们会被保存在总主教府的图书馆里。它们不会失传。学者们能够研究它们。”

“若那些神父不把它们当作不敬神明的作品给毁掉的话，”弗朗切斯科苦涩地反驳道。“你知道教会对解剖学是什么看法。他们认为那是对身体的亵渎。”

“特里武尔齐不是个蠢人。他知道这些图画有着科学价值。他会保护它们的。”

弗朗切斯科想要相信这一点。特里武尔齐首先是一个收藏家。这些图画更可能会装饰他的私人书房，而不是公共图书馆。

他很快就交付了承诺的这十幅图画。他挑选了些质量上乘、却并非最为成熟的作品。那些关于心脏的研究仍留在了他手中，展示神经系统或眼球结构的图画也是如此。

特里武尔齐信守了承诺。他在米兰的文化圈子里传开了话，说弗朗切斯科的遗产「完全合法，并有恰当的文件予以证实」。这份来自一位以其学识操守闻名的高级教士的担保，极大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那些原本对购买来源可疑之作品犹豫不决的收藏家们，如今感到安心了。销售重新变得红火起来。他甚至能借着这份重新获得的合法性提高价钱。

但心理上的代价是高昂的。弗朗切斯科意识到，自己将永远处于一个新的、执着的调查者提出正确问题时的摆布之下。他的安全，完全建立在他那些文件的可信度与官府缺乏深挖意愿之间那份脆弱的平衡之上。

婚姻

一五二七年，弗朗切斯科做出了一个将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决定：他结婚了。以他的年纪，是时候成家立业了，哪怕只是为了维持社会体面。像他这样地位的人若一直保持单身，会引起怀疑。人们私下议论，说他有变态的癖好，说他曾与他已故的师父保持过一段过于亲密的关系。

这些流言蜚语，尽管毫无根据——弗朗切斯科与达·芬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师父与门生的关系——却伤害着他的名声。结婚是让这些流言平息的最佳办法。

妻子的人选，是由实际考量所主导的。他想找一位出身良好、却没有过多财产的女子，一位能带来体面身份、却不会对她的种种活动提出太多问题的女子。他在安杰莉卡·兰德里亚尼身上找到了这样的对象。

安杰莉卡二十四岁，是一个家道中落的伦巴第小贵族家庭中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一名退役军人，早已把家族大部分的财产在赌桌上挥霍殆尽。安杰莉卡没有丰厚的嫁妆，这减少了她攀上一门好亲事的机会。对她而言，嫁给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总督的艺术顾问，坐拥一座漂亮宫殿——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他是在公爵宫的一场招待会上认识她的。她是一位面容令人愉悦却算不上出众的年轻女子，举止得体，才智并不出众，却也够用。她看上去很温顺，不太好奇，安于现状。这正是他所寻求的。

订婚仪式于一五二七年四月举行，婚礼则在六月。仪式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举行，随后是在梅尔齐宫殿举行的一场宴会。约有五十位宾客出席：米兰贵族成员，艺术家，商人。达瓦洛斯总督本人也亲临了这场盛事。

蓬皮欧是弗朗切斯科的证婚人。在他的致辞中，他称颂了新郎的品德，并表达了这段结合能得到许多子嗣的祝愿。

新婚之夜对弗朗切斯科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欢愉，不如说是一场考验。他必须履行他的夫妻义务，但他的心不在其中。安杰莉卡在最为严苛的传统中长大，被动地顺从着，既不表现出愉悦，也不表现出不悦。

弗朗切斯科和安杰莉卡建立起了一套体面的夫妻生活规律。他们同床共枕，一起用餐，一同参加宗教仪式。但真正的情感亲密从未在他们之间生根。这是一份务实的安排，而非一份出于爱意的结合。

安杰莉卡表现出了自己是一位能干的妻子。她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监督着仆人们，以优雅的举止接待宾客。她从未对丈夫的种种活动提出过令人为难的问题，也从未试图去理解他那批艺术收藏的种种奥秘。

弗朗切斯科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宫殿的阁楼——他存放最珍贵宝藏的地方——严禁安杰莉卡进入。那是他的私人领地，她永远不得踏足。安杰莉卡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规定，正如她接受丈夫所决定的一切一样。

子女

一五二八年，安杰莉卡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们为他取名奥拉齐奥。抱着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弗朗切斯科感受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情感。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一种未曾被谎言与欺骗所玷污的情感。

这个无辜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也会被这份家族的秘密所触及吗？弗朗切斯科希望不会。他想要自己的孩子们在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生活，真心相信这份家族遗产的合法性。

但与此同时，必须有人知道真相。必须有人在他死后继续这场骗局。这个两难的困境，将困扰他数十年。

一五三零年，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弗朗切斯科小弟，人称切科，以区别于他的父亲。而后一五三二年，安杰莉卡日夜期盼的女儿伊丽莎白塔诞生了。

有了三个孩子，梅尔齐宫殿真正成了一个家。孩子们的叫喊声在走廊中回荡，玩具堆满了房间，乳母和家庭教师你方来罢我登场。弗朗切斯科，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他那批收藏博学而寂静的氛围中，如今不得不适应这份家庭的喧闹。

他成为了一位关心孩子、却又略显疏离的父亲。他会在晚上陪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看图画——从不是达·芬奇的原作，总是他自己的临摹本——教他们绘画和几何的入门知识。

长子奥拉齐奥，展现出敏锐的智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年纪轻轻，他便对家族财富的来源提出了令人为难的问题，对那个人人都在谈论的伟大达·芬奇留下的神秘遗产提出了追问。

“父亲，”一天晚上，正当弗朗切斯科为他掖被子时，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阁楼里有这么多画作和文件？为什么我不能去看它们？”

“等你长大些，你会看见它们的。眼下，你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它们的价值和重要性。”

“可这是大师的遗产，不是吗？那位教会了你一切的师父？”

“是的，我的孩子。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是你的。而你必须像我守护它一样去守护它。”

“守护它，不让谁得到？”

弗朗切斯科犹豫了。该如何向一个五岁的孩子解释，这份家族遗产建立在一场盗窃和一份伪造之上呢？

“不让那些不理解艺术之价值的人得到。不让那些想要毁坏或分散师父所创造之物的人得到。你明白吗？”

奥拉齐奥点了点头，却并没有真正理解。但这些谈话在他年幼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一种明白家族存有一个秘密、一件重要的事情将来会向他揭示的意识中成长着。

弗朗切斯科小弟，这个幼子，与他的长兄大相径庭。他是一个欢乐、无忧无虑的男孩，对游戏和马匹的兴趣远胜于艺术或书本。弗朗切斯科明白，这个儿子永远不会成为这份遗产的守护者。是奥拉齐奥，将担起这份重担。

至于伊丽莎白塔，她像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们一样成长着，被教育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弗朗切斯科待她温柔，但他从未想过要让她知晓这份遗产的秘密。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里，家族的秘密是从父传子，从不传给女儿。

繁荣与巩固

一五四零年代，是一段相对繁荣的岁月。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他所渴求的社会体面。他的子女们健康地成长着。他那批达·芬奇作品的收藏，远未因出售而缩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值。

因为弗朗切斯科已经明白了艺术市场的一条根本法则：稀缺创造价格。他卖得越是节制，他所保留的那些作品价值就越高。全欧洲的收藏家们如今都在争夺哪怕一幅出自达·芬奇之手的次要图画的荣幸。

他成为了一位卓越的艺术品商人。他在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客户网络：罗马的枢机主教，法国的王侯，威尼斯的银行家，那不勒斯的贵族。每一笔出售都经过精心策划，以在把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使利润最大化。

蓬皮欧继续扮演着中间人与顾问这一关键角色。多年来，两人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蓬皮欧成了萨莱从未能真正做到的那种知己：聪明，谨慎，可靠。

每逢星期五晚上，蓬皮欧都会前来梅尔齐宫殿共进晚餐。餐后，趁安杰莉卡带着孩子们退下之时，他们便把自己关进弗朗切斯科的书房，商谈生意。

“我收到了法尔内塞枢机主教的一封信，”一五三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蓬皮欧宣布道。“他想购得一系列建筑图纸。他愿意开价高达两百枚杜卡特。”

“法尔内塞？那位刚刚当选教皇的枢机主教？”

“正是他。他已取名保罗三世。想想看，若这些图纸能被教皇本人买下，它们的价值会攀升到何等地步！”

弗朗切斯科思忖着。卖给教皇，代表着一个非凡的机遇。教皇的担保将使他这批收藏的合法性变得彻底无懈

可击。但这同样有风险。梵蒂冈拥有相当强大的调查手段。若一场调查揭露了这场骗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不知道。梵蒂冈可能会就来源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

“恰恰相反。教皇法尔内塞是一位热忱的艺术爱好者，不是个宗教裁判官。他想为自己的私人收藏购得达·芬奇的作品，而不是要调查它们的来历。而且，想想教皇的赞助能给你带来的保护。谁又敢去攻击一个连教皇都购买其作品的人呢？”

这个论点说服了弗朗切斯科。这笔交易被安排了下来。他挑选了十五幅达·芬奇的建筑图纸——防御工事的方案，穹顶的研究，教堂的设计。这些不是重要的作品，但制作精良，足以令一位教皇级别的收藏家满意。

这笔出售于一五三六年一月在罗马进行。弗朗切斯科在蓬皮欧的陪同下前往。这是他自一五一三年至一五六年间追随达·芬奇以来，第一次重访这座永恒之城。

罗马已经变了。这座城市依然带着一五二七年那场可怕的洗劫的伤痕，当时帝国的军队曾数周之久肆意劫掠、破坏这座城市。但重建已在进行之中。到处都在拔起新的宫殿，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坚韧。

他们在梵蒂冈受到了对高级艺术品商人应有的礼遇。教皇保罗三世在他的私人图书馆接见了他们。

他久久地审视着呈上来的图纸，把它们对着光线端详，与他已经拥有的其他达·芬奇作品作对比。

“这些图纸令人赞叹。一眼便能认出师父的手笔。这份线条的精确，这份几何学上的严谨……是的，这些确实是真正的达·芬奇作品。”

“陛下的眼力堪称行家，”弗朗切斯科以应有的恭敬答道。

“我们生前曾认识达·芬奇，你知道吗。当时我们还是枢机主教，他曾为我们的前任利奥十世效力。一个非凡的人，虽说也极为反复无常。他能同时开启一百个项目，却没有一个能完成的！”

弗朗切斯科对这段轶事礼貌地笑了笑。教皇继续说道：“不过，告诉我们，梅尔齐先生，像您这样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是如何继承了这样一批收藏的呢？师父去世时，您才……多大来着，二十九岁？”

这个问题，看似随和地提出来，实际上是一次试探。弗朗切斯科立即明白了这一点。他必须给出足够详尽的回答以满足教皇的好奇心，但又不能透露过多。

“陛下，我有幸侍奉师父长达十三年之久。从我十六岁一直到他去世。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门生。我是他的助手，他的秘书，几乎是他的义子。师父没有直系继承人。他认为把他大部分的作品遗留给我是合适的，因为他知道我懂得如何保存它们。”

“那么，是一份遗嘱了？”

“是的，陛下。以合法的形式撰写，在公证人面前，依照法国的法律。”

“啊，法国……一个有幸拥有《蒙娜丽莎》的王国。我们曾试图为我们的收藏购得它，但弗朗索瓦国王断然拒绝割舍它。他声称这是他最钟爱的一幅肖像！”

谈话转向了其他艺术话题。教皇谈起了他对梵蒂冈的规划，他打算委托绘制的壁画，他希望购得的雕塑。弗朗切斯科敏锐地回应着，展现出他的专业造诣。

教皇同意以两百五十枚杜卡特金币的价格购买这十五幅图纸——比最初谈及的价格多出了五十枚。弗朗切斯科不仅成功地卖给了教皇，还获得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价钱。

离开梵蒂冈后，蓬皮欧和弗朗切斯科在一家罗马小酒馆里庆祝他们的成功。

“教皇上钩了。现在，你可以说教皇本人都为你这批收藏背书了！”

“我并没有完全撒谎。遗嘱确实存在。它是假的，这只是个技术细节罢了。”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每一笔出售，每一次成功的谎言，都让他成为的这个人与他年少时曾梦想成为的那个人之间的鸿沟，又加深了几分。

一五五零年：向奥拉齐奥揭示真相

一五五零年，奥拉齐奥二十二岁。他已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青年：能干，博学，性情稳重。他曾学习古典文学，绘画，建筑。他对达·芬奇的作品尤其感兴趣，不停地向他的父亲追问关于师父技法的问题，关于他的种种发现，关于他的天才。

弗朗切斯科怀着复杂的感情打量着他的儿子。奥拉齐奥将是接管这份遗产的理想接班人。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他揭示真相。而弗朗切斯科多年来一直惧怕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触发点来自奥拉齐奥的一项提议。一天晚上，晚餐过后，这位年轻人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父亲。

“父亲，我有个提议。特雷佐的那块地正在出售。那是一块极为肥沃、极为壮丽的领地，能带来丰厚的收益。可若要购买它，我们需要卖掉一部分的收藏。”

弗朗切斯科感到一阵不安。出售一部分收藏，会引起关注，会唤醒疑心，会有让这座谎言的大厦轰然倒塌的风险。

“这些作品不出售，”他冷冷地答道。

“可父亲，我们有几百件呢！卖掉五十来幅图画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这能让我们购得能让家族更加富庶的土地。”

“你不明白，奥拉齐奥。这些作品是特殊的。它们不能就这么被卖掉，毫无戒备。”

“为什么？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不过是达·芬奇的图画，诚然出色，可我们拥有这么多！为什么要这样神秘？”

弗朗切斯科明白，时候到了。他不能再回避这些问题了。奥拉齐奥已经足够年长，足够成熟，可以知道真相了。而若他日后要继承这份遗产，他就必须知道，他们的财富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地基之上。

“坐下吧，我的孩子。我们要进行一场我拖延了太久的谈话。”

弗朗切斯科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讲述了达·芬奇之死，异邦人财产没收权，那场抢救作品的绝望决定，盗窃的那一夜，那份假遗嘱的伪造，那些年的谎言，特里武尔齐事件，那一连串的出售。

奥拉齐奥默默地听着，他的脸从惊讶转为难以置信，再转为惊骇。他望着父亲，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他。

“您撒了三十年的谎？”他喃喃道。“这整套关于合法遗嘱的说辞……全是假的？”

“是的，”弗朗切斯科承认道。“我撒谎，是为了保护这份遗产。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可若真相败露，我们将失去一切！我们的名声，我们的财富，甚至也许还有我们的自由！”

“正因如此，你必须谨慎行事。你所设想的那种大规模的出售，是绝对不可能的。它会引起关注，唤醒疑心。”

奥拉齐奥双手抱着头。

“父亲，您把我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如今必须承担这个秘密，活在恐惧之中，轮到我自己去撒谎。”

“我知道，”弗朗切斯科悲伤地答道。“可这是必要的。总得有人知道。总得有人在我死后继续守护这份遗产。”

“那我的孩子们呢？我的孙辈们呢？他们都必须背负这份重担吗？”

“只要有必要，就得如此。直到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让没有人能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为止。也许一个世纪。也许两个。”

“两个世纪的谎言，”奥拉齐奥喃喃道。“您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怎样的遗产啊。”

“这是天才的遗产，”弗朗切斯科反驳道。“若没有我们，它早就失传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吗？”

奥拉齐奥没有回答。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书房，留下弗朗切斯科独自面对他的悔恨。

和解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弗朗切斯科与奥拉齐奥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奥拉齐奥躲着他的父亲，在家庭聚餐时几乎不与他交谈。安杰莉卡感觉到了这份不安，却不知其中的缘由，试图让他们重归于好。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她问弗朗切斯科，“为什么奥拉齐奥待你如此冷淡？”

“一些关于家产管理的分歧，”弗朗切斯科答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会过去的。”

但这并没有过去。奥拉齐奥似乎无法接受那个摧毁了他心目中父亲理想形象的揭示。

是蓬皮欧，他的健康正迅速衰退，出面调和了这对父子。一五五二年二月，他约谈了奥拉齐奥，进行了一次私下的谈话。

“年轻人，”这位年迈的雕塑家对他说道，“你以从未面对过不可能之选择的年轻人的严苛，来评判你的父亲。你的父亲面对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任由达·芬奇的天才被分散、被遗失，还是采取一场超出法律范围的行动去挽救它。他选择了后者。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但从人性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偷了东西，”奥拉齐奥反驳道。“他撒了谎。他欺骗了那些信任他的人。”

“他挽救了本会失传的珍宝。你父亲所抢救出的这些手稿，蕴藏着比医学科学超前好几个世纪的发现。若那些法国的官员没收了它们，它们最终会烂在某个地窖里，被老鼠啃食。多亏了你的父亲，它们得以保存，被人研究，被人传承。”

“代价是什么？以我们家族的荣誉为代价吗？”

“荣誉？”蓬皮欧带着一丝哀伤的微笑重复道。“我的孩子，荣誉是一种奢侈，只有那些从未面对过撕心裂肺之抉择的人，才能负担得起。你的父亲没有这份奢侈。他必须在道德良知与守护天才之间作出取舍。他选择了天才。你能因此责怪他吗？”

奥拉齐奥沉默不语，陷入了思索。

“而如今，”蓬皮欧继续说道，“你正面对着同样的选择。要么你揭露真相，摧毁你的家族；要么你继续这份谎言，守护这份遗产。你将如何选择？”

“我不知道，”奥拉齐奥承认道。“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花点时间去想想。可在你思考的这段时间里，不要因为你的父亲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就惩罚他。他独自背负这份重担已经三十年了。他至少应得到你的同情，即便得不到你的赞同。”

这次谈话对奥拉齐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重新与父亲往来。彼此的交流重新变得可能，尽管仍显得紧张。

一天晚上，奥拉齐奥回到了弗朗切斯科的书房。

“父亲，”他以一种疲惫的语气说道，“我想过了。我会做您所要求的事。我会守护这个秘密。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证据，所有同谋的名字。我必须确切地知道陷阱在哪里，好去避开它们。”

弗朗切斯科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把奥拉齐奥引入了这场骗局的种种微妙细节之中。他给他看了那些假造的文件，向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伪造

它们的，向他透露了那些次要同谋的存在，教会了他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出售作品的技艺。

奥拉齐奥学得很快。一旦他接受了自己的处境，他在隐瞒方面便展现出了与他父亲同样的娴熟。这个秘密被传承了下去。这场谎言将继续下去。

封存的文件

一五五五年，弗朗切斯科做出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决定。他撰写了一份完整的文件，讲述了从达·芬奇去世到当下的整个故事。这份文件将被封存，保存在家族的档案中，只在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真相能够安全地被揭示之时，才由后世子孙开启。

梅尔齐花了好几个星期撰写这篇文章。他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份对事件的简单记述。他想要解释自己的动机，自己的疑虑，自己的种种辩解。他想要后世能够理解，他为何这样行事，他又希望能够成就些什么。

这份文件是这样开头的：

「致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后将读到这些文字的你，我想讲述达·芬奇遗产真正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世人所知的那个大相径庭。」

我叫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从一五零六年到一五一九年，整整十三年间，我是达·芬奇最亲近的门生。我曾在他身边生活，向他学习，如同儿子爱着父亲那样爱着他。当他于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在法国的昂布瓦兹去世时，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抉择。

法国的法律，透过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将一个未曾归化便去世的外国人的全部财产判归王室所有。达·芬奇从未获得过归化信函。他的整份遗产因此本应归属法国国

王。那些重要的作品——《蒙娜丽莎》，《圣安妮》——已被没收，如今属于王室的收藏。

但在他去世后的那一夜，我的同伴萨莱和我，作出了将某些作品从即将进行的清点中抽离出来的决定。我们藏起了包含科学研究的手稿，精确度无与伦比的解剖学研究，关于飞行与水利的论著。我们还抽走了《施洗者圣约翰》和《丽达与天鹅》。

这算是一场盗窃吗？从法律上说，是的。从道义上说，我一直相信不是。这些作品若不这样做，本会失传，被分散，被毁坏。达·芬奇的天才本会被削残，失去他的科学层面——这一层面，也许比他的艺术层面更为重要。」

弗朗切斯科的这份记述延续了几十页，详尽记录了每一个环节。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伪造那份假遗嘱的，是如何炮制那些伪造的信件往来的，是如何应对特里武尔齐事件的，是如何在维持合法假象的同时出售那些作品的。

这份文件以一段哲思性的反思作为结尾：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对了。这个问题每天都困扰着我。我撒了谎，偷了东西，欺骗了别人。我给我的后代加上了一份可怕的重担。但我也挽救了本会失传的珍宝。

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之后，那个打开这份文件的人，会拿它怎么办呢？他会将它公之于众，从而揭露真相，摧毁我们家族的声誉吗？还是会将它继续深藏，让这场谎言延续得更久？

我无法指定这个决定。每一代人都必须做出自己道德上的抉择。我唯一能说的是，我依照我的良知行事了，即便这良知并不完美。我努力去服务于美与天才，即便使用了值得商榷的手段。

但愿后世评判我。我接受这一切。」

弗朗切斯科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标注了日期：「*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米兰，一五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他用红色的火漆封了印，盖上了自己的私印，随后把它放进一只上了锁的金属匣子里。

他召来了奥拉齐奥，郑重地把这只匣子交给了他。

“这份文件里记载着我们这份遗产的全部真相。它只能在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这场揭示不再能伤害家族之后才被开启。也许要一百年后。也许更久。”

“我怎么才知道那个时刻到了呢？”奥拉齐奥问道。

“你不会知道的。这将由你的后代来决定。你的角色，是把这只匣子传给你的长子，并附上同样的嘱咐。就这样一代传一代，直到有人有勇气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

奥拉齐奥恭敬地接过这只匣子，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握之物那份象征性的重量。

“我会忠实地传承下去的，”他承诺道。

衰落

一五六零年代，见证了弗朗切斯科体力的衰退。七十岁的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佝偻着背、步履蹒跚的老人。但他的头脑依然清醒，他仍在继续监督着这批收藏的管理与偶尔的出售。

蓬皮欧已于一五五八年去世。他的死深深地打击了弗朗切斯科，因为他失去了与达·芬奇那个时代最后一位在世的联系。蓬皮欧不仅仅是一个同谋或朋友。他曾是他的知己，他的顾问，若没有他在道义上的支持，弗朗切斯科很可能无法维持他这份双重生活这么多年。

安杰莉卡也于一五六二年去世，被一场几天内便夺去她生命的高烧所吞噬。弗朗切斯科为她真心地悲痛，尽管他们的婚姻从未是一段炽烈爱情的结合。她曾是一位忠贞的妻子，一位尽心的母亲，一位能干的女主人。她本该得到比嫁给一个背负着无法与她分享之秘密的男人更好的命运。

弗朗切斯科如今活在他的回忆之中。他花费许多时辰待在阁楼的那间秘密画室里，凝视着达·芬奇的作品，重读那些手稿，回忆着他在师父身边度过的那些岁月。

那幅他即便有过诱人的出价也从未出售的《施洗者圣约翰》，在这间私人画室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常常凝视着它，沉浸在对那道仰望天空的目光、那抹神秘的微笑、那根指向高处的手指的凝视之中。

“你会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师父？”他有时会对着画作喃喃自语。“你会认可我的谎言吗？还是会谴责我？”

画像没有回答。但弗朗切斯科喜欢想象，达·芬奇会理解，会宽恕。师父一向懂得依据境况调整自己的原则。他会明白，有时，为了服务一份更崇高的善，就必须接受违反寻常规则。

奥拉齐奥常常来探望他年迈的父亲。多年来，他们的关系已大为改善。奥拉齐奥最终接受了传给他的这份重担，如今，他以与父亲同样的谨慎与娴熟经营着这批收藏。

“父亲，您今天感觉如何？”奥拉齐奥在一五六九年秋天的一次探访中间道。

“老了，我的孩子。老得很了。我的骨头疼，我的视力在衰退，我的双手在颤抖。可我的头脑依旧清醒。我依然能够享受我们所挽救的这些奇迹。”

他们站在《施洗者圣约翰》前，一同凝视着这件弗朗切斯科曾发誓永不出售的杰作。

“您从未后悔过吗？”奥拉齐奥问道。“经过了这一切，所有这些谎言，所有这些活在恐惧中的岁月？”

“我后悔曾不得不撒谎，曾不得不活在恐惧之中，曾把一个可怕的秘密强加给我的家族。但我不后悔挽救了这些作品。看看你的周围。这难道不是一份足够的正当理由吗？”

“我愿意相信这一点，父亲。这样我才能继续背负这个秘密活下去。”

“你会做到的。你比你想象的更坚强。而有一天，当你把这个秘密传给你自己的儿子时，你会明白我为何这样做。”

弗朗切斯科之死

一五七零年一月，弗朗切斯科感到自己的大限将至。他已卧病好几个星期，被一场医生们无法治愈的顽固高烧所削弱。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他让人把奥拉齐奥叫到床边。

“我的孩子，”他以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时日无多了。在我离去之前，我想对你说几句最后的话。”

奥拉齐奥跪在床边，把父亲那只枯瘦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别这么说，父亲。您会康复的。”

“不会了，”弗朗切斯科打断道。“我是自己的医生。我认得出这些征兆。死亡近了。我必须向你传达我最后的指示。”

他吃力地咳嗽了几声，才继续说道：

“十五年前我托付给你的那只封存的匣子……你还留着吗？”

“是的，父亲。它安全地存放在我的私人档案中。”

“很好。当你感觉时机到来时，你要把它传给你的长子。你要把我现在对你说的话告诉他：这个秘密，既是一份重担，也是一份荣耀。是重担，因为它迫使人撒谎，迫使人活在恐惧之中。是荣耀，因为它使我们成为一份无与伦比之宝藏的守护者。”

“我会告诉他的，”奥拉齐奥承诺道。

弗朗切斯科闭上双眼，集中着他的力气，说出他最后的话语。

“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守护达·芬奇的遗产。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我存在的理由。如今，这份使命是你的了。”

“要多久，父亲？要几代人才能不再背负这个秘密？”

“我不知道。也许五代。也许十代。也许两百年后，三百年后，会有人有勇气打开这只匣子，揭示真相。又或者，这个秘密将被永远守护下去。我无法预言。”

他最后一次睁开双眼，以一种与他身体的虚弱截然相反的强度凝视着他的儿子。

“无论发生什么，奥拉齐奥，向我保证一件事：这些作品必须存续下去。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哪怕我们的名声受损，哪怕我们的姓氏蒙羞，都无关紧要。可师父的作品必须得到保存。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向您保证，父亲。这些作品会存续下去的。”

弗朗切斯科露出一丝微弱的微笑，因这份承诺而感到宽慰。

“那我可以安心地离去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交由天主与后世了。”

他闭上眼睛，陷入了沉睡，此后仅在他去世前几个小时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

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于一五七零年一月十六日安详辞世，距达·芬奇去世已五十一年。他享年七十九岁。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守住了自己的秘密，只向他的儿子奥拉齐奥透露过，并把他死后的这份自白，托付给了一份将由后世子孙有朝一日开启的封存文件。

葬礼极为隆重。大主教亲自在大教堂主持了弥撒。西班牙总督出席了仪式。数十位来自艺术与政界的显要人物纷纷赶来，向这位曾是达·芬奇挚爱门生、忠实守护着他遗产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葬礼的悼词中，人们颂扬了弗朗切斯科对他已故师父的忠诚，他为保存这位天才作品所付出的奉献，他对米兰文化机构的慷慨捐赠。没有人提及那些阴影地带，那些关于他这批收藏确切来源的未解之谜。

身着丧服的奥拉齐奥，怀着复杂的心情听着这些颂词。他的父亲，并非一份合法遗嘱忠实的继承人。他曾是一个大胆的窃贼，一个才华横溢的造假者，一个成功的骗子。

但他也曾是一位拯救者。若没有他的介入，那些无价的珍宝早已失传。这份双重性——罪犯与英雄，窃贼与守护者——将从此定义奥拉齐奥所继承的这份遗产。

葬礼过后，待所有宾客散去，奥拉齐奥独自一人来到阁楼的那间秘密画室。他凝视着父亲耗费了半个多世纪保存下来的这些作品。

这一切，都是靠着谎言才得以挽救的。这一切，也将靠着谎言的延续才得以存续下去。奥拉齐奥如今成了这重

双重真相的守护者：作品本身的真实性，与它们来源的虚假性。

他取出了那只装着父亲那份封存文件的金属匣子。他掂量着它，一时间被诱惑着想要打破封印，读一读这份死后留下的证词。但他忍住了。他的父亲说得很清楚：这份文件是留给未来子孙的，不是给他的。

“再会了，父亲，”他在这间空荡的画室中喃喃道。“您的重担如今是我的了。愿我能像您一样，把它背负得同样出色。”

他走下通往阁楼的楼梯，小心地把身后的门关上。这间秘密的画室重新陷入了寂静与昏暗之中，守护着它的珍宝与秘密，直到未来的数十年，数个世纪。

接下来的岁月里，奥拉齐奥以与他父亲同样的谨慎和娴熟经营着这份遗产。他偶尔向精挑细选的收藏家出售一些次要的作品。他维持着这批收藏合法性的虚构假象。他把这个秘密的知情权传给了他自己的长子，卡洛。

这个秘密就这样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每一代人都在其上添加了自己的一层伪饰与辩解。到了十七世纪，正当这件事似乎已消散在时间的迷雾之中时，卡洛·梅尔齐依照他祖父弗朗切斯科的嘱咐，决定打开那份封存的文件。

这份揭示在家族内部引起了震动。有些成员提议将这份死后的自白公之于众。另一些则表示反对，唯恐由此招致的法律后果与家族蒙羞。

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这份文件将被保存在家族档案之中，但其内容不予公开。这个决定，既延续了这场谎言，也为历史保留了真相。

这份双重性将定义梅尔齐家族此后的数个世纪。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与弗朗切斯科同样的抉择：延续谎言以守护这份遗产，或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揭示真相。而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所有人都选择了维持这场谎言，从而成为了这场拯救了天才的大胆盗窃事件死后的同谋。

这个秘密将代代相传，穿越数个世纪，历经战争、革命、政治动荡而幸存下来。十八世纪，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它将带上一层爱国主义的意涵：保护意大利的遗产不受法国的劫掠。十九世纪，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它将成为意大利文化抵抗的一个象征。二十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将在轰炸与占领中幸存下来。

每个时代都会重新诠释这场骗局的意义，使其适应自身的价值观与关切。但这个秘密本身将保持完整无缺，被那些明白某些真相必须继续隐藏、才能让美得以存续下去的守护者所保护着。

几个世纪的流转中，这批收藏将逐渐分散开来。一系列接续的出售，遗赠给种种机构，以及策略性的捐赠，将使弗朗切斯科于一五一九年挽救下来的作品，最终散落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中。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乌菲兹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都将拥有源自梅尔齐这场谎言的物件，却从未知晓它们真正的来历。

那幅弗朗切斯科曾发誓永不出售的《施洗者圣约翰》，将一直留在家族中，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八三六年，梅尔齐家族最后一位直系后代维托里奥，将以一笔可观的价钱把它卖给卢浮宫。这幅画将在法国的收藏中与《蒙娜丽莎》重逢，为这个近三个世纪前展开的循环，画上句点。

这段历史，远未终结。它才刚刚开始。而在此后的四百五十年间，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的这场谎言，将继续守

护着达·芬奇的天才，直到最终，在二零二五年，真相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但即便到了那时，这个问题仍将悬而未决：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究竟是一个窃贼，还是一位拯救者？一个罪犯，还是一位英雄？答案，一如既往，将取决于是谁在提出这个问题，又出于什么目的。

因为历史，正如艺术一样，从来不是简单的。它由种种灰色地带、无从选择的抉择、服务于真相的谎言、以及毁灭美的真相所构成。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早已明白这一点。也正因如此，他的这场谎言，才得以延续了这么久。

第四章：谎言的构架

巴黎，贝尔蒂耶的办公室，2024年10月7日

皮埃尔·贝尔蒂耶疲惫地合上了案卷。摊在他桌上的这些指控性文件，构成了一份无可辩驳的控诉：弗朗索瓦一世敕令目录九卷的复印件，十九世纪历史学家之间的往来书信，对那份所谓遗嘱的语文学分析，笔迹比对研究。

马尚俯身望向屏幕，上面显示着一篇一八九三年发表的数字化文章。

“这是什么？”

“阿纳托尔·德·蒙泰隆的一篇文章。《达·芬奇的遗嘱》，发表在美术协会联合会的会刊上。整件事中最离奇曲折的一段历史。”

“比其余的部分还离奇？”

“您自己判断吧。”

贝尔蒂耶靠回椅背，双手交叠。

“十九世纪末。达·芬奇的这份遗嘱流传于世，但仅有意大利文的译本。从未有人见过法文原件——本应于一五一九年寄存在昂布瓦兹公证人处的那份。”

“那间公证事务所当时还在吗？”

“在。从十五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始终由同一个家族经营。博罗家族世代相传，父传子，都担任公证人。这份非凡的延续性意味着，若遗嘱真的曾寄存在那里，原始的笔录理应就在那儿。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试图去查阅它。”

马尚皱起了眉头。

“都没成功？”

“每一次都遭到了礼貌却又斩钉截铁的拒绝。蒙泰隆本人也碰了壁。当地知名的回忆录作者舍瓦利耶神父，省档案保管员夏尔·德·格朗梅松……所有人都被打发走了。蒙泰隆是这样写的：「我们既彬彬有礼、又不失体面地被一句断然的拒绝打发了回去」。”

“以什么借口？”

“那些老一套的搪塞：古老的档案尚未分类整理，即将搬迁，承诺日后再作查询……蒙泰隆写道：「我们对此心领神会」。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这份文件呢？”

“一八八五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博罗家族绝嗣了。最后一位家族传人去世，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这间事务所首次易主。新来的公证人，一位名叫马丁的先生，继承了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他让一名书记去整理清点。这名书记发现，那些最古老的档案，也就是十六世纪的那些，是存放在几只木桶里的。”

“木桶？”

“这是当时的常见做法。蒙泰隆援引了那位大史学家雅克-奥古斯特·德·图的例子，他也是这样存放他的藏品的。坚固，防潮，还能防潮防鼠。在其中的一只桶里，在一堆堆旧合同之中，这名书记发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文件。”

他把手指滑过屏幕。

“「并非原始的笔录，而是一份十七世纪的旧纸本抄件，显然是因为这份文件非同寻常的稀奇与重要而抄录下来的」。”

“一份十七世纪的抄件。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

“确切地说，是一个半世纪。而且是法文的，不是意大利文的。这暗示着一份法文原件曾经存在过。这名书记把这份文件转交给了一位名叫斯科里布的先生，罗莫朗坦学院的绘画老师。”

“罗莫朗坦？为什么是那里？”

“师父曾于一五一六至一五一七年间在那里逗留，为一座从未建成的王家行宫工程效力。斯科里布于一八九三年在美术协会大会上展示了这份文件。”

馆长站起身来，开始踱起步来。

“让我梳理一下。数十年来，博罗家族一直拒绝任何人接触他们的档案。而一旦这个家族绝了嗣，事务所换了手，就发现了一份抄件？这也太巧了吧。若博罗家族真持有原件，何必要保密呢？”

“蒙泰隆以某种方式回应了这一点。他写道：「如今我们已知，十六世纪的旧笔录本再也找不到了，原件已不可挽回地遗失了」。”

“多么委婉的说法啊。这一发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人认为有必要抄录这份遗嘱。一份重要到值得被抄录的文件，但它也许存在着某些问题。否则，为什么不保留原件呢？原件在十七世纪与十九世纪末之间失踪了。这是一场……时机恰到好处的失踪。”

“恰到好处？”

“因为一份晚出的抄件什么也证明不了。无法进行认真的鉴定，无法进行古文字学分析，也无法检验墨水、纸张、印章。只是一份间接的证词。这个关于木桶的故

事，既维持了曾有原件存在过的幻觉，又使得任何核实变得不可能。”

“您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博罗家族销毁了原件？”

“我什么都无法证明。可请想想这个时间脉络。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严守着他们的档案。他们拒绝了最有资质的历史学家的查阅请求。然后家族绝嗣了，事务所换了手，仿佛凑巧一般，人们找到了一份既无法鉴定、却又能让这个传说延续下去的抄件。”

“有点牵强附会，但也并非不可能。”

“这与整体的模式完全吻合。每一次深挖，我们都能找到蛛丝马迹，却从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这正是一场构建精妙的骗局的特征。”

马尚重新坐了下来。

“博罗家族为什么要保护这场骗局呢？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有好几种假设。首先是职业保密的义务。一名公证人不会揭露前任所办事项中的违规行为。这会让整个行业蒙羞。其次是压力。梅尔齐的后代可能收买了他们的沉默。这不会是第一次，一个望族运用其影响力来销毁令人为难的文件。最后，是最简单的一种推测：他们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可查的。原件从未存在过。十七世纪那份抄件本身就是伪造的，是为了强化这个传说而制造出来的。”

“事件的经过令我感到困惑。三个世纪的绝对沉默，随后突然间，恰恰就在整个欧洲对达·芬奇的兴趣爆发之际，就在好奇的人们开始提出正确的问题之际，人们找到了一份抄件。”

“您抓住了核心。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标志着达·芬奇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古斯塔夫·于赞纳出版了他的传记，夏尔·拉瓦松-莫利安编纂了学院所藏的手稿。达·芬奇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刻，这份遗嘱重新浮出水面。”

“太完美了，反而不像是真的。若您是博罗家族，若您手握一个家族秘密，什么时候是揭露它的最佳时机呢？”

“试想他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份遗嘱有问题。也许甚至知道它是假的。可他们不能说出来，否则会损害他们职位的荣誉。于是他们保持了沉默。而后，最后一位博罗去世了。这个家族绝嗣了。再也不需要保护家族的秘密了。可要如何在不牵连家族名声的情况下把它揭示出来呢？这个木桶的故事，便成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我开始明白了。他们无需揭露任何东西。是新来的公证人发现的。博罗家族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尊严得以保全。而十七世纪的这份抄件，又让这层暧昧得以维持。”

“一场完美的脱身策略。这个秘密被揭露了出来，可没有人能指控博罗家族撒过谎。他们只是保存了一份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真实性质的文件而已。”

“就连这次发现都是精心策划的？”

“不如说是被人促成的。最后一位博罗知道自己将会绝嗣而死，事务所会易主。他也许把这份文件留在了一个日后会被发现的地方。不能太容易被发现，那会引起怀疑。但也不能太难被发现。众多木桶中的一只，一个尽职的书记在盘点清点时终将开启的一只。而里面，是一份古老到足以令人信服、却又新近到能够读懂——尤其

是，晚出到没有任何认真的鉴定可能进行——的复印件。”

他从抽屉里取出了另一份文件。

“您看。一份一八六零年编制的该事务所档案清单，比最后一位博罗去世早了二十五年。您猜猜看，能在里面找到什么？”

“没有提及遗嘱吗？”

“毫无提及。这份清单十分详尽。它列出了数百份十六世纪的文件。但只字未提达·芬奇的任何遗嘱。所以，要么它被藏在了一个连官方清点都无法找到的地方，要么它在一八六零年还不存在，要么，它存在，但当时的那位博罗选择了不提及它，因为他知道，他的时机终会到来。”

“太令人晕眩了。一场牵涉数十人的阴谋。”

“不是一场阴谋。是一场传承。每一代博罗都从上一代那里接下了这个秘密。*「我们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达·芬奇的棘手文件。只有梅尔齐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才*能查阅它。*把这个嘱咐传给你的继任者」*。不需要详细的解释。只需要一条简单的指令，一代传一代。”

“就从来没有人打破过这条链子吗？”

“对他们来说，这条嘱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众多秘密中的一个而已。”

“若这个理论成立，那就意味着博罗家族早就知道这份遗嘱是假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谋。”

“未必是主动的同谋。也许只是一个心知肚明的守护者。试想：约一五二五年时，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当时在米兰，他需要为自己的假遗嘱找到一份验证。他去找了昂布瓦兹的公证人纪尧姆·博罗，这个家族的始祖。”

“然后他对他说：「您好，我来登记一份假遗嘱」。”

“当然不是。他把这份文件当作真迹呈上。但纪尧姆·博罗，可不是个昨天才出生的人，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一些不同寻常的措辞，一些对不上的细节。比如，缺失归化信函，而这条信息公证人是知道的。弗朗切斯科有五六年的时间来打磨他的说辞，但某些技术上的细节暴露了这份文件是晚出伪造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是一位米兰绅士。他也许有钱来收买沉默。博罗同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份「遗嘱」保存在他的档案中，加以封存，但不予以认证。这给了他一种保障。若事情有朝一日出了岔子，他总能说自己已保留了这项不规行为的证据。”

马尚开始来回踱步。

“真是个引人入胜的理论。”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有许多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博罗家族固执地拒绝开放档案。一八六零年清单中的缺失。恰在家族绝嗣之后的这次时机凑巧的发现。而尤其是，这是一份十七世纪的抄件，而非十六世纪的原件。”

“为什么说「尤其」？”

“因为一份十七世纪的抄件，正是完美的折中方案。它证明了这份文件确实存在过。这正是既想揭示又想隐瞒真相时会做的事。”

“最令我着迷的，是这场构建的巧妙之处。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恰好能找到足够多的信息来维持这个传说，却又永远不够彻底证实它。”

“这就是骗局的艺术。绝不完全撒谎。留下痕迹，但要不不确定。创造出一套能够超越其创造者而存续下去的系统，因为它不依赖于某一个人，而依赖于一个机构。”

“博罗家族充当了这个机构。”

“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个机构性的担保人。而不仅仅是一些会随自己一同带着秘密死去的个体同谋。而是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机构。”

贝尔蒂耶继续说道：

“这也正是这件事三年来一直令我着迷的原因。这不只是一份假文件。这是一整套谎言的构架，一场如此精妙的构建，以至于它延续了五个世纪。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不仅仅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窃贼。他是一位以极其长远的眼光进行谋划的战略家。”

“就算您的理论成立……”

“即便我在某些细节上出了差错，整体的框架依然成立。这份遗嘱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无法是真迹。而它被保存与传承的方式，也暗示着一种刻意维持不确定性的意愿。”

“试想您是一五一九年时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您二十九岁。您刚刚失去了您的师父。您没有个人的财产。您的家族因为您把青春浪费在追随一位艺术家、而没有去谋求军旅或行政上的前程而鄙视您。而突然间，您发现自己拥有了一批能让您成为富人、备受尊敬的作品。”

“若您能证明它们合法地归您所有的话，”马尚反驳道。

“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遗嘱，您不过是个窃贼。有了遗嘱，您就是一位合法的继承人。于是您想到了伪造一份假遗嘱。可您很聪明。您知道操之过急是致命的。您让事情先平静下来。您带着您的珍宝回到意大利。您等待着。也许等了五年，六年。而当您需要为出售一部分收藏正名时，您才拿出这份遗嘱。不能太早。梅尔齐正

是这样做的。这份遗嘱在他的往来信函中首次被提及，是在一五二五年。”

“您认为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伪造这份文件？”

“去伪造它，而更重要的是，去构建一整套能够佐证它的证词网络。梅尔齐是有学识的。他明白交叉证据的重要性。仅凭一份遗嘱是不够的。需要有人能够说：「是的，我曾亲眼看见达·芬奇撰写这份遗嘱」，或「是的，我曾亲耳听见达·芬奇表达过这些最后的意愿」。”

“可要如何找到这样的证人呢？”

贝尔蒂耶重新走向他的书桌，打开了另一份档案。

“您看看这些信件。这是梅尔齐家族成员在一五二零到一五三零年间的往来信函。其中能找到一些提及「忠实的朋友」的地方，这些人「记得」达·芬奇的种种意愿。克洛·吕斯庄园的仆人，「听见」师父谈及他的继承人。一位当地的神父，曾「见证」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所有这些证词，都奇迹般地汇聚向同一个结论：达·芬奇想把一切都遗留给弗朗切斯科。”

“被收买的证人？”

“也许并非全部如此。有些人也许真心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达·芬奇确实对弗朗切斯科怀有很深的情谊。他也许曾把他称作自己精神上的继承人。这些人可能把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解读为了法律上的承诺。而弗朗切斯科也许还鼓励了这种解读。这里一句话，那里一次私下的透露。「师父常常对我说……」，「达·芬奇希望……」。传说就这样一点点地构建起来。而当遗嘱出现时，没有人真正感到惊讶。所有人都「早已知道」弗朗切斯科是那位继承人。”

马尚走近了书桌。

“这是一种极高水平的心理操纵。”

“弗朗切斯科是个贵族。他曾受过外交、精妙说服艺术的教育。他的父亲乔瓦尼·梅尔齐，曾是米兰民兵队长。一个惯于宫廷阴谋、权力游戏的家族。弗朗切斯科不过是把这些本领运用到了他自己的处境之中罢了。”

“可有一件事令我感到不解，”马尚反驳道。“若弗朗切斯科真如此高明，他为什么不去伪造一份假的归化信函呢？那样，他的谎言就能天衣无缝了。”

贝尔蒂耶微笑起来。

“好问题。我对此思考良多。第一种假设。伪造王室的信函，比伪造一份私人的遗嘱要危险得多。王室的档案是有人看守、有人监视的。要在这些档案中插入一份文件，需要有法国国家最高层面的同谋。这对一个在宫廷中毫无人脉的年轻米兰贵族来说，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种假设呢？”

“更为微妙。也许弗朗切斯科根本不需要归化信函。他的计划并不要求达·芬奇归化为法国人。恰恰相反，缺乏归化对他反而有利。”

“怎么说？”

“请想想。若达·芬奇已经归化，他的财产便会受法国法律的约束。他的遗嘱本应被正式登记，被核实，被法国当局验证。这一切都无法伪造。但若达·芬奇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去世的，那他的遗嘱便适用于意大利的法律，宽松得多。它可以私下撰写，无需过于严苛的手续。弗朗切斯科只需在意大利找一位配合的公证人，把它登记备案即可，远离法国当局的视线。”

“可这也意味着他的财产会落入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的适用范围之内。”

“正是如此！这正是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弗朗切斯科从未打算追讨留在法国的那些财产，尤其是《蒙娜丽莎》。那些反正都已经失去了。不，他所觊觎的，是他随身带回意大利的那些作品与手稿。这些作品逃过了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因为在达·芬奇去世那一刻，它们已不在法国领土之内了。”

马尚沉默了片刻，消化着这些信息。

“所以弗朗切斯科牺牲了《蒙娜丽莎》和其他留在法国的作品，来挽救他已经偷走的东西？”

“正是如此。他做了一个务实的计算。与其试图保留一切、冒着全盘皆输的风险，他放弃了那些反正也无法保留的东西。他把精力集中在为他手中已有的东西正名上。一个聪明的战略性撤退。”

贝尔蒂耶重新坐了下来，交叉着手指。

“但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元素。我找到了一封弗朗切斯科·梅尔齐与他父亲乔瓦尼之间的往来信件。信中，弗朗切斯科提到了「*师父托付的珍贵遗产*」，并向他父亲请教「*保存与增值它们的最佳方式*」。这封信的语气，是一个正试图为自己的地位正名的人的语气，而不是一个安然享有其权利的继承人的语气。”

“您有这封信吗？”

“一份抄件。原件在米兰的国家档案馆。您看这一段。”

他把一份复印件递给了马尚。

“「父亲，我肩负着一份重大的责任。师父的作品如今由我保管，我必须确保无人能够质疑我保有它们的权利。我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巩固我的地位，但我担心有些人会试图与我争夺这份遗产。请就我应采取的行动为我指点」。”

“「一些措施」，”马尚重复道。“这可能指的正是那份遗嘱的伪造。”

“或者至少是它的准备工作。这封信写于一五二一年，即达·芬奇去世后的两年。弗朗切斯科当时仍在构建他的防御体系。这份遗嘱要到四年后才会出现在正式文件之中。”

“他父亲有回信吗？”

“可惜没有。或者至少，我没有找到。但乔瓦尼·梅尔齐这份沉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后弗朗切斯科没有再给父亲的任何一封信中明确提及这份遗产。仿佛这个话题在这次通信之后便被搁置了。要么吉罗拉莫已经给予了首肯，要么他命令儿子对此事保持沉默。”

“我们挖掘得越深，弗朗切斯科·梅尔齐这个人的形象就变得越复杂。他并非传说中那个忠诚而天真的门生。他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谨慎地筹划着每一个步骤。”

“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贝尔蒂耶答道。“别忘了当时的背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充满阴谋、权谋、背叛的世界。梅尔齐家族本身，也曾在米兰、威尼斯与法国的战争之间灵巧地周旋于各派系之间而幸存下来。弗朗切斯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对他而言，伪造一份假遗嘱以保护他的遗产，也许并非一种罪行，而是一种实际的必要之举。”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荣誉问题？”

“也许吧。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是达·芬奇真正的精神继承人。他所伪造的这份遗嘱，不过是对一个早已存在的道义现实予以正式确认。他不是偷窃师父，他是在完成他真正的心愿。”

“一种方便自己的合理化。”

“所有的骗子都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弗朗切斯科的情形中，其中很可能确实有一部分真相。达·芬奇是爱着他的。他曾把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技法、自己的手稿都托付给了他。弗朗切斯科很可能真心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份遗产。”

贝尔蒂耶打开了另一份更厚的档案。

“我汇编了所有关于达·芬奇与弗朗切斯科之间关系的同时代证词。当然有瓦萨里，他把弗朗切斯科描述为「最受宠爱的门生」。但也有同时代人的信件，当时编年史中的记载。由此浮现出的，是一幅复杂的画像。”

“在哪个意义上复杂？”

“达·芬奇似乎对弗朗切斯科怀有真挚的情谊，但对萨莱，对其他门生也是如此。他不是那种只有一个宠儿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教诲、自己的秘密分配给多个人的人。弗朗切斯科诚然重要，但并非独一无二。”

“这就让他把一切都遗留给弗朗切斯科这一说法变得不那么可信了。”

“正是如此。若达·芬奇真的想要立一份遗嘱，他很可能会把他的财产分给好几位继承人。弗朗切斯科得到科学手稿，萨莱得到某些作品，也许还有别的人得到其余的部分。他把自己艺术遗产的绝大部分都留给了一个人这一说法，与我们所了解的他的性格是相悖的。”

“您建立起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档案。可我们始终缺乏一份决定性的证据。您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些线索，一些矛盾之处，一些文件的缺失。没有任何一样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份遗嘱是假的。”

“这正是精心构建的骗局的问题所在。就其定义而言，它们是为了经受审视而设计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有

一辈子的时间去打磨他的谎言。他销毁了不利的证据，制造了有利的证据，收买了沉默。五个世纪之后，我们试图从一些碎片中重建真相。”

“那要如何说服科学界呢？”

“靠积累。单独一条线索什么也证明不了。两条线索也说明不了什么大道理。但十条线索，十五条线索，二十条线索，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到了某个时刻，证据的分量就变得压倒性了。”

贝尔蒂耶站起身来，开始一条条列举起来。

“第一：在法国王室档案中完全没有归化信函。第二：遗嘱文本本身的种种矛盾。第三：昂布瓦兹公证档案三个世纪的沉默。第四：正当历史学家们开始提出问题之际，一份抄件恰逢其时地被发现。第五：蒙泰隆私下表达出的种种怀疑的证词。第六：一八六零年博罗家族档案清单中对这份遗嘱只字未提。第七：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往来信件中暗示他正在「巩固自己地位」的种种说法。第八：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的适用，证明了达·芬奇并未归化。第九：萨莱在达·芬奇去世后神秘消失的怪异行为。这每一个要素，单独来看都可能有一个无辜的解释。可它们全部加在一起呢？它们构成了一系列极难反驳的推定。”

“问题是，”马尚反驳道，“您是在要求人们相信一场持续了五个世纪的阴谋。这可不是小事。”

“这不是一场有组织的阴谋意义上的密谋。这是一系列个体的决定，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人做出，这些决定共同维持了这场谎言。弗朗切斯科制造了这份假件。博罗家族同意保护它。十七世纪的抄写员在不质疑其真伪的情况下复制了它。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因为这个传

说很美而不断重复它。没有人在统筹这一切。这是一套自我维持的系统。”

“就像一个自我延续的都市传说一样。”

“完全正确。都市传说之所以能延续，不是因为有一个组织有序的群体在传播它们，而是因为它们回应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它们在情感上太让人满意了，以至于人们不愿意去质疑它们。”

马尚坐了下来，久久地思索着。

“您知道整件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什么呢？不是骗局本身，而是我们集体不愿正视它的意愿。五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历史学家研究过达·芬奇，审视过他的遗嘱，可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说：「等等，这说不通」。”

“因为质疑这份遗嘱，就是在质疑整整一套史学体系。这就是承认好几代专家都错了。这就是要摧毁一个美丽的传说。人们不喜欢这样。他们更愿意延续一个令人心安的错误，而不愿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可您却要这样做。”

“我别无选择。历史的真相比知性上的舒适更重要。即便令人不安，说出真正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职责。”

外面，街道上传来了车流的喧嚣声。午后的光线渐渐黯淡下去，在成堆的文件上投下橙色的阴影。

“皮埃尔，”马尚终于说道，“我有时在想，您是不是也在构建自己的传说。五百年后，别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审视您的研究，自问您是否也成了自身偏见的牺牲品。”

“有这个可能，”贝尔蒂耶承认道。“历史从来不是最终定论的。每一代人都会透过自己所处时代的棱镜重写过

去。我们尽己所能，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工具与方法。若五个世纪之后，有人发现了新的证据，推翻了我的理论，那也很好。这说明历史研究仍在不断进步。”

“您已经做好了接受自己可能出错的准备了？”

“当然。一个不愿在新证据面前修正自己结论的历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狂热者。但依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依据我们手头的这些文件，我确信达·芬奇的遗嘱是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所伪造的一份假件。”

马尚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现在我们来谈谈方程式的另一部分吧。弗朗索瓦一世对《蒙娜丽莎》的据为己有。您去年跟我说过，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在法律上颇具争议，如今《蒙娜丽莎》的取得，甚至可以说达·芬奇所有由弗朗索瓦一世获得的作品，都可能重新受到质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贝尔蒂耶开始了一段长篇的解释。

“罗马帝国时期，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拉卡拉允许外国人在缴纳百分之十的税款后转移他们的财产。这相当公平。但罗马于公元四七六年陷落之后，一切都倒退了。到了封建时代，九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人们引入了异邦人财产没收权，那时它还只是一种适度的税收而已。”

“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切都因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化而彻底改变！一四七五年，路易十一颁布了一道敕令，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套体系。此后，未持有归化信函便死于境内的外国人，其财产将被国王全数没收。这一原则成了「王国的一条通则」。”

“所以正是在这个时候，弗朗索瓦一世据有了《蒙娜丽莎》？”

“正是如此。达·芬奇去世时，国王便运用这条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以牺牲合法继承人的利益为代价没收了这幅画。但问题就在这里：这次据有违反了自然法。”

“自然法？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每一个人都天生固有的权利总和：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这些权利是普遍的，不可更改的。弗朗索瓦一世本应遵守这条自然法，可他违反了它。日后，一七八九年的立宪派把财产权称作「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异邦人财产没收权最终被废除了吗？”

“是的，逐步废除的。大革命于一七九一年废除了它。巴雷尔·德·维厄扎克谴责了这条「残暴的准则」，即外国人「自由地活着，却像农奴一样死去」。可惜，一八零三年的民法典部分地重新引入了它，附加了对等条件。直到一八一九年，它才被彻底废除。”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异邦人财产没收权违反了一七八九年宣言第十七条，该条款把财产权保护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它还与第一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相悖。宪法委员会已于二零一年确认了这一点。一项优先合宪性问题甚至可以针对一四七五年的那道敕令，尽管它由来已久。”

马尚打断了他。

“等等。您在谈论合宪性，可法国宪法是近代的东西。它如何能溯及既往地适用于十六世纪的事件呢？”

“很好的反驳。答案是微妙的。宪法原则，那些关涉基本权利的原则，被视为具有普遍且超越时间的效力。它们不创造这些权利，它们承认这些权利。财产权在一七八九年之前，甚至在一四七五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些是自然权利，是人的境况所固有的。路易十一的敕令并没有取消它们，而是违反了它们。而这一违反，至今仍是受到质疑的。”

“所以《蒙娜丽莎》的据有，在法律上是可以被质疑的？”

“不仅仅是可以质疑：它是不存在的！最高行政法院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一项存在严重且明显违法情形的行为，应被视为不存在。依照「*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法谚，一项通过欺诈手段取得的行为不产生任何权利。这种不存在的行为，在法律上从未真正存在过。”

“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项不存在的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且可在任何时候被宣告无效。它不创造任何既得权利。因此，《蒙娜丽莎》被纳入国有财产的过程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连公共收藏不可处分与不可通过时效取得的规则，都对此不具对抗力。”

“您是说《蒙娜丽莎》应当归还给达·芬奇的继承人？”

“正是如此！以一条与基本原则相悖的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为掩护而进行的这次据有，构成了对财产权的实质性侵犯。这种非法状态已延续了五个世纪。法国的《文化遗产法典》其实也规定了，若「*不当列入清单*」，应予以除名。”

“这是一个大胆的论点，它质疑了法国持有这些作品数个世纪的合法性！”

“诚然大胆，但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问题依然是：法律能否纠正一场如此古老的历史性不公呢？”

马尚陷入了沉思。贝尔蒂耶刚才向他所解释的一切，让他感到若有所思。若这套推理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那这将打开一片极为广阔的前景。达·芬奇的遗嘱不仅很可能是假的，法国对他作品的据有，也有可能是非法的。

“皮埃尔，”他缓缓说道，“您意识到自己在暗示什么了吗？若您这套法律论证被接受，这将不仅仅涉及《蒙娜丽莎》。所有目前留在法国的达·芬奇作品都可能被要求归还。”

“我对此十分清楚。这正是为何这件事如此具有爆炸性。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一份文件真伪的学术争论。我们谈论的，是法国持有史上一些最伟大杰作的合法性问题。”

“卢浮宫绝不会放走这些作品的。”

“很可能不会。但问题不在于卢浮宫愿不愿意接受。问题在于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合法的。这无关乎保护一个机构的利益，无论它多么显赫。这关乎的是确立真相。”

贝尔蒂耶站起身来，双手背在身后，来回踱步。

“安托万，请理解我。我不是想毁掉卢浮宫、剥夺法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偶像者。但我深信，文化机构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它们不能仅仅因为方便，就继续保有来源可疑、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作品。”

“可时效……”马尚反驳道。“经过了五个世纪，取得时效的原则想必是适用的吧？”

“正是这里，法律分析变得引人入胜之处。取得时效的前提，是一项在起源上有效的法律行为。一项不存在的行为无法适用时效，因为它在法律上从未存在过。这就好比我给了一张假钞。即便过了五十年，这张钞票依然是假的。当非法性是实质性的、触及基本原则时，时间不会把一项非法行为转变为合法行为。”

“您是在区分普通的违法与实质性的违法？”

“是的。一项程序上的错误，一个次要的形式瑕疵，可以由取得时效来弥补。但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对宪法原则的损害，永远不能仅仅因时间的流逝而被合法化。否则，我们就会创造出的一套体系，让最严重的侵权行为反而因其年代久远而得到奖赏。”

马尚缓缓点了点头。

“我开始明白您的推理了。可具体来说，谁能向法庭提出这项主张呢？达·芬奇没有直系后代。”

“两位意大利研究者近来发现了至少十四位仍在世的达·芬奇后代，是他异母兄弟们的血脉。这些旁系的后代，在法律上是具有起诉资格的。”

“您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

“我不知道。有些人也许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达·芬奇的后代。有些人也许不愿意与法国政府和卢浮宫展开这样一场既复杂又昂贵的法律诉讼。但在法律上，他们是有权这样做的。”

“若真有人这样做，那管辖法庭会是哪里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私法问题。原则上，管辖法庭应是法国法庭，因为这些作品目前在法国。但也有支持意大利法庭甚或国际法庭管辖的论据。更别提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外交牵涉了。但老实说，我不认为我们很快就

会看到一场诉讼。其影响将会太过深远。若承认异邦人财产没收权与基本原则相悖，那将为其他数以千计、以类似方式在数个世纪中取得的作品与财产打开索赔的大门。”

“所以这一切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目前是的。但重要的是，要确立这个原则。要证明这次据有并不合法。要让人明白，卢浮宫拥有《蒙娜丽莎》以及达·芬奇的其他作品，是基于一场建立在不公正法律之上的历史性的意外。”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做？继续拆解这个传说？”

“不，我会呈现一套有坚实证据支撑的另一种版本。人们可以自由地去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

“这场骗局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的认知。我们原本把他看作一个忠诚的门生，也许有些投机取巧，趁着师父去世之机侵占了几件作品。但若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若他建立了一套如此精妙的系统，涉及公证人，预先规划好了秘密的传承，那他也就是一位第一流的头脑。”

“这几乎让他成了一个比达·芬奇本人更有意思的人物。”

“别把这话说得太过了。达·芬奇依然是达·芬奇。可是，没错，弗朗切斯科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门生。一个聪明、有学识、能够进行复杂操纵的人。他曾研习过法律。他知道如何制造出一份看似真实的文件。而他，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几乎。可并非完全成功。因为这套系统有一个破绽。”

“哪一个？”

“法国王室档案中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弗朗切斯科能够掌控意大利那边所发生的一切。他能确保昂布瓦兹的公证人们守住秘密。但他无法在法国国王的登记档案中制造出虚假的记录。他无法伪造出从未存在过的归化信函。正是这一点出卖了他。若归化信函真的存在，若人们真在王室档案中找到了它们，我们的整套理论便会土崩瓦解。可它们并不存在。而这一点，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弗朗切斯科精心策划了一场极为精密的骗局，可他无法改写官方的历史。”

“所以您的调查最终建立在一种缺失之上。建立在若官方历史属实、本该存在却并不存在的文件之缺失之上。”

“我这项研究的悖论所在。我用不存在的东西来证明某件事。这在理智上令人感到沮丧，但当面对这样一场骗局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贝尔蒂耶打开了他还未曾展示过的最后一份档案。

“还有一个我尚未提及的元素。我找到了一封信，是一位名叫卡洛·赞格里洛的艺术爱好者写的，他曾先后从弗朗切斯科及其子奥拉齐奥手中购得几份达·芬奇的手稿。这封信写于一五八五年，寄给一位西班牙收藏家。赞格里洛在信中提到，他所购得的一些手稿上带有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的批注，这些批注看起来「像是想为他对这些文件的持有作出正当性辩护」。”

“正名性的批注？在什么意义上呢？”

“赞格里洛没有给出细节，但他觉得这很奇怪。他写道：「一位合法的继承人，为何要不断地为自己的持有作出辩解呢？这就好像他想要说服某个人，又或者是想说服他自己」。这是一个曾亲手接触过这些文件的人所作出的敏锐观察。”

“这些批注还存在吗？”

“有一些还在。我曾在米兰审视过好几份《大西洋古抄本》的手稿。其中确实能找到弗朗切斯科添加的一些边注，是在达·芬奇死后添加的，写着诸如「继承自师父」或「依其最后遗愿而得」之类的话。这些是反复出现、语气坚持的断言，仿佛弗朗切斯科想要把他持有的合法性刻进石头一般。”

“这是一个心中有愧之人的行为？”

“又或者，是一个预见到未来会有人质疑、想要提前准备好辩护的人的行为。弗朗切斯科是个有条不紊的人。他从不把任何事交给运气。每一份被批注的手稿，都成了他这份正名档案中额外的一份材料。”

马尚走近前来审视这些批注的复印件。

“您有请人分析这些批注的笔迹吗？以确认它们确实出自弗朗切斯科之手？”

“有，请了两位独立的专家。两人都确认这确实是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的笔迹。墨水与纸张也与一五二零至一五三零年这段时期相符。这些批注是在达·芬奇去世后的那几年间添加上去的。”

“所以弗朗切斯科当时就已经在构建他这套合法性的叙事了。”

“正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安然享有其权利的继承人的行为。这是一个明知自己地位岌岌可危、想要竭尽一切手段去巩固它的人的行为。”

贝尔蒂耶合上了那份档案。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呢？那份十七世纪的抄件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它是否与已知的意大利文版本完全一致？有没有别的版本，额外的细节？”

“好问题。可惜蒙泰隆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这些细节。他只是说那是一份抄件。”

“真令人沮丧。”

“这整件事中的一切都令人沮丧。每一次以为抓住了一份决定性的材料，它便从我们手中溜走。就像在追逐一个影子。”

“但这个木桶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这场骗局，若真是骗局，是被设计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的。构建它的人明白，他们必须留下一些痕迹，但不能太多。让文件流传，但不是原件。制造证词，但要无从核实。搭建一套保护系统，但不能显得可疑。这是一份精妙的平衡，而且保持得极为出色。”

马尚抱起了双臂。

“您几乎让我开始钦佩这场骗局了，若这真是一场骗局的话。”

“哦，可我确实钦佩它！这是那种类型中的一部杰作。一场构建极为精妙的建筑。若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真是这一切的策划者，他以自己的方式确实是一位天才。他明白，谎言必须有它的破绽，它的阴影地带，它次要的矛盾之处。因为这正是现实中所能找到的样子。一份过于完美的文件反而会引起怀疑。”

“若您是对的，若这一切都是一场诈欺性的构建，那这将是艺术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

“不是「之一」。是最大的。因为它成功地骗过了所有人。历史学家们，专家们……甚至连卢浮宫都毫不质疑地接受了某些作品的来源。”

“而如今，您要拆毁这套构建了。”

“我要揭示真相，”贝尔蒂耶反驳道。“这是不同的。而老实说，我并不确定这是一件好事。”

“怎么说？”

“因为这场谎言，挽救了这些作品。若梅尔齐没有偷走那些画作和手稿，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们能存留至今吗？它们能得到如此悉心的保存吗？”

“您在为这场盗窃辩护吗？”

“我只是指出，其结果是模棱两可的。这场骗局服务了艺术的事业。这在道德上令人不安，但从历史上说，这是不容否认的。”

“这几乎让人感到悲哀。这样一套构建，最终却要被拆解。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一位教授在档案中找回真相。”

“别为这些骗局的策划者感到太多悲伤。他们已经跑赢了一大段路。五个世纪，不是件小事。而真相，总是会浮现出来的。这是历史的法则。”

“总是吗？”

“总是。迟早，一份文件会重新浮出水面，一份证词会被发现，一个矛盾之处会变得过于明显。谎言可以延续很长时间，却无法永恒。”

马尚关掉了屏幕。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马尚问道。

“现在？我们去吃晚饭。我今天思考得够多了。”

两人都站起了身来。马尚穿上了他的外套，贝尔蒂耶则小心地把文件分别收进各自的档案夹里。

“最后一个问题，”马尚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道。“若这份遗嘱是假的，具体会带来什么变化呢？卢浮宫会被迫归还作品吗？会有法律后果吗？”

“不，若没有司法裁决，不会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后果。而且，要归还给谁呢？一五一九年被偷的法国政府吗？达·芬奇的直系后代吗？他没有直系后代。剩下的，是那些出自他兄弟血脉的旁系继承人。如今仍有几位健在。”

“那为什么还要揭露这一切呢？”

“因为历史应当依照它实际发生的样子被讲述，而不是依照人们希望它发生的样子被讲述。因为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无论他是窃贼还是英雄，都值得让他的故事为人所知。因为达·芬奇，值得比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浪漫传说更好的对待。”

他们走出了办公室，搭上了电梯。电梯到了。门发出金属摩擦的吱嘎声开启了。走进之前，马尚转向贝尔蒂耶。

“您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认为您是对的。这份遗嘱是假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是个骗子。博罗家族守护了他的秘密三个世纪。而如今，多亏了您，世人终将得知真相。”

“也许吧。若我揭露这个故事时，有人愿意听我说的话。”

“人们会听的。这样一个故事，人们不可能听而不闻。”

当他们走进大厅时，马尚忽然停了下来。

“我刚想到了一件事。那份在木桶里找到的十七世纪的抄件。它现在在哪里呢？”

“蒙泰隆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说明。他提到它曾在一八九三年的大会上展示过，但那之后呢？”

“正是如此。一个黑洞。我们知道它于一八八五年被发现，一八九三年被展示，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它又一次消失了。”

“您认为我们能找到它吗？”

“得去找找看。也许在安德尔-卢瓦尔省的省档案馆。或者美术协会。又或者那位曾展示过它的斯克里布先生的后代那里。”

“我明天就去打听。若这份抄件仍然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它对我们的档案来说将是一份关键材料。”

“关键，也危险。若它确实存在，若我们能对它进行鉴定，它要么会证实我的怀疑，要么会将其彻底推翻。”

“您害怕我们可能会发现的东西吗？”

“不，不是害怕。我建立起了一套建立在证据缺失之上的坚实理论。若有实物证据浮现，它可能会改变一切。要么它们会证实这份抄件本身就是一份晚出的伪造品，那会强化我的理论。要么它们会揭示出，一份法文原件确实曾经存在过，那我就得重新审视我全部的论证了。”

“我很难相信，在您之前，从未有人想过去寻找这份抄件。”

“也许有人这样做过。也许它曾被找到，又再度遗失。又或者，也许有人故意让它消失了，因为它揭示了太多的东西。”

“这又给这个谜团添上了新的一层。”

“正是这一点，让这件事如此令人着迷。每一个答案，都会打开十个新的问题。”

他们沿着塞纳河默默走了几分钟，河水映照着桥上的灯光。游船满载着游客缓缓驶过，探照灯扫过一座座历史

悠久的建筑立面。艺术桥上，几位音乐家正演奏着爵士乐。这座城市依旧生机勃勃，对两个人正试图解开的过去的种种谜团浑然不觉。马尚终于打破了沉默：

“有个问题从昨晚起一直困扰着我。您打算如何揭露您所发现的一切呢？一部传统的学术著作？一篇科学论文？而尤其重要的是，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呢？”

“这正是我这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自问的问题。我有两个选择。传统的路线：把我的发现发表在一份科学期刊上，附上所有的脚注，所有的参考文献，所有严谨的方法论要求。这也许能触及全世界两百来个人。一些会在其他专业文章中讨论我论点的专家们。也许十年后，我的理论会开始在学术界得到接受。”

“那另一个选择呢？”

“为大众读者写一本书。以一部叙事性调查、小说的形式，把我的研究讲述成一个故事，有悬念，有逐步的揭示，有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本不仅讲述我发现了什么、还讲述我是如何发现它的书。研究的过程本身，成为了情节。”

“您想把您的研究小说化吗？”

“不如说，是让它变得平易近人。事实依然是事实。我引用的文件是真实的。我提到的档案确实存在。但呈现它们的方式，可以要么令人生厌，要么引人入胜。我可以谈「对弗朗索瓦一世敕令目录的分析揭示了归化信函的缺失」，也可以讲述我如何花了三天时间翻遍九卷布满尘埃的档案，我日益增长的挫败感，以及当我明白这种缺失意味着什么时那一刻的顿悟。”

“问题在于可信度。若您只出版一本面向大众的书，您会被指责为哗众取宠。学界会说您是在追求轰动效应，

而非做学问。若您只出版一篇学术文章，除了那一小圈专家之外，没有人会听说它。”

“正因如此，我认为两者都要做。我先出版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这能确立我的可信度。这能表明我不是一个信口指控的业余爱好者。而后，我再出版一本叙事性的书，采用同样的事实，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现。这本书会为想要深入研究的读者指向那篇文章。文章赋予书以合法性，而书则将文章通俗化。”

“您在两方面下注，却不损害任何一方。”

“正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篇文章会发表在，比如说，「莱布尼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会刊上，那里有一个审稿委员会。二十来页，三十来个脚注，全套的学术家伙什。我也会把它发布在一个面向法学的网站上，比如「正义之村」，那是律师、法官、法律史学家们经常查阅的地方。我会避开那些太过循规蹈矩的刊物，比如《达洛兹》，《年鉴》，或者《近现代史评论》。但我会选择在「学术网」上广泛传播，那是一个美国的学术网络平台，能让研究者们彼此联系，追踪各自的研究，交流知识。而六个月后，这本书就会问世。大约两百五十页，事实依据同样严谨，但以叙事的形式呈现。”

“您考虑找哪家出版社呢？”

“不是一家传统的出版社。他们的做法本质上是商业性的。他们想要的是畅销书，能取悦最广大读者的书。我们这个题材对他们来说太小众了。而且，他们的流程漫长得没完没了。从手稿被接受到出版，可能要过去两年。他们的目标纯粹是财务上的，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伽利玛出版社曾拒绝了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手稿《茫茫黑夜漫游》，最终这部作品被一家

非常小的出版社德诺埃尔接受出版。塞利纳成名之后，最终又被伽利玛重新收入麾下。”

“您在想着谁？”

“没有特定的谁。我拒绝去玩这套惯常的游戏。市面上有成百上千家伪出版社，提供自费限量印刷。卖不出去的书，数量众多，最终都被送去化浆了。而那些大型出版机构，每个月都会收到成百上千部手稿，几乎全部遭到拒绝。这已经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生意。只有那些具备巨大销售潜力的作品才会被留下。剩下的，连读都没被读过，就被扔进了垃圾堆。不，我更倾向于数字自出版。在线平台，比如亚马逊，Kobo，苹果图书，谷歌图书。”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将是决定性的。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国际的曝光度，以电子书的形式发行，纸质版按需印刷。不用管理库存，不用去说服出版商，不用去谈判版权。我掌控着从手稿到销售的整个流程。而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能在几周之内上市，而不是两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

他们来到了一家小小的意大利餐厅，坐到了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侍者给他们端来了菜单和面包。有那么几分钟，他们默默地研读着菜品。点完餐后，贝尔蒂耶重新拾起了这个话题。

“我开始看清这本书的结构了。我先从达·芬奇之死开篇。我讲述克洛·吕斯庄园的氛围，弗朗切斯科和萨莱的在场，那份紧张感。然后我转向清点的过程，一分钟一分钟地展开，带着悬念：弗朗切斯科会不会被发现？接着，我沿着这条线索穿越数个世纪：这份遗嘱是如何被维系下来的，博罗家族是如何保护它的，十九世纪的历

史学家们是如何几乎发现真相的。最后，我以我自己的调查作结，我在档案中逐渐揭示真相的过程。”

“这听起来像一部历史悬疑小说，可这一切都是真的。”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读者们会知道自己读的不是虚构小说。我所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真实发生过，或者至少，根据我所掌握的文件，很可能发生过。”

“可要如何处理那些不确定的地带呢？那些我们不完全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时刻？”

“我会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会在构建叙事的同时保持知性上的诚实。读者们永远不会被误导，分不清哪些是确凿的事实，哪些是合理的推测。”

侍者端来了他们的菜。贝尔蒂耶点的是米兰式炸肉排，马尚点的是培根蛋面。在他们用餐的过程中，这套出版策略的构思继续展开。

“对那篇学术文章来说，主线会是什么呢？”马尚问道。
“归化信函的缺失？对遗嘱的语文学分析？异邦人财产没收权？”

“三者都有，但要以累积的方式构建。我先从遗嘱本身的分析入手：矛盾之处，时代错乱，措辞上的问题。接着，我呈现王室档案中归化信函的缺失，并详细解释我的研究方法。而后，我解释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及其法律后果。最后，我以博罗家族与木桶的故事作结，展示出这场骗局是如何穿越数个世纪维系下来的。每一个元素都在强化其他元素。单独来看，每一个论点都可能受到质疑。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便构成了一系列极难反驳的推定。”

“您意识到自己会因此树敌吗？有些历史学家一生都在捍卫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有些博物馆馆长的名声正建立

在他们所给出的鉴定之上。有些收藏家拥有据称由梅尔齐继承而来的作品。”

“我知道。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我是对的，而我相信我是对的，那就必须要有勇气说出来，不论后果如何。我不能仅仅因为我的发现令人不安，就保持沉默。”

“若您错了呢？若有新的文件浮现，证明达·芬奇确实获得过归化信函，证明这份遗嘱是真的呢？”

“那我就是错了。而我会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会修正我的结论。可至少，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迫使学界重新审视了一份被接受了数个世纪、却从未经过真正审视的文件。即便我的理论被驳倒，我也推动了研究的进步。科学正是这样运作的。通过假设，通过检验，通过可能的反驳。这是唯一在知性上诚实的立场。历史只有在人们敢于质疑既定的确信之时，才会取得进步。若所有人都满足于重复已经被说过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前进。”

晚餐的余下时间用来讨论一些实际的细节。文章中的脚注应该如何编排？是否应该收入文件的照片复制件？如何确保拉丁文和古意大利文的翻译准确无误？谁能在提交之前审阅一遍手稿？

他们于晚上十点左右走出了餐厅。巴黎的夜晚温和宜人，街道依然热闹非凡。

“好好回去吧，”贝尔蒂耶说道。“也想想我们今晚谈过的这些事。明天，我会开始动笔，若您愿意的话，我会把初稿交给您审阅、修改。先写那篇学术文章。书稍后再说。”

“我很乐意接受。可您确定要投身这场冒险吗？一旦您发表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您会被贴上「质疑达·

芬奇遗嘱真实性之人」的标签。有些人会把您看作历史修正主义者。”

“我很确定。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守住了他的秘密五个世纪。是时候有人来揭露它了。”

他们在街角分了手。马尚朝地铁走去，贝尔蒂耶则朝他的公寓走去。在他的脑海中，句子已经开始自行组织起来，论点已经开始成形。他已经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轮廓，以及随后会问世的那本书。到家后，他毫无睡意。知性上的兴奋太过强烈了。他坐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开始敲打起来。文章的标题：《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对蒙娜丽莎有争议的据有及其后果——就达·芬奇后代可能提出的该画作所有权之主张而言》。

正文开头：「当达·芬奇完成蒙娜丽莎的肖像之时，他必然远远不曾想到，在他死后，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将援用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将它据为己有，而他的门生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在很可能凭空捏造了一封伪造的信件和一份伪造的遗嘱之后，将侵吞他的其他画作。他更是远远不曾料到，他的这幅肖像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上最昂贵、最著名的一幅画作，被防弹玻璃罩保护着，陈列在一座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参观者的博物馆之中……」

两个小时不间断的写作，贝尔蒂耶确立了他论证的主要脉络。停笔时，已近凌晨一点，他疲惫不堪，却也十分满足。五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构成了这篇文章的骨架。在关掉电脑之前，他新建了一份文档，暂时命名为「小说」。在这份空白的文档中，只有一条简短的备注：「第一章——克洛·吕斯庄园的主人。第二章——国王的密探。第三章——欺瞒的岁月。第四章——谎言的构架」。他凝视着这几行字看了几秒钟，随后关掉了一切，

去睡了。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睡得如此深沉，没有被烦扰的梦境所打扰。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早晨，贝尔蒂耶在约九点半时迎来了安托万·马尚。这位馆长腋下夹着一只厚厚的硬纸文件夹。

“我整晚都在思考我们的谈话。我已经开始为那篇学术文章搜集文件了。都在这儿了。”

贝尔蒂耶打开了文件夹，开始翻阅这些文件。

“出色的工作。我看到您甚至找到了我找了好几个星期的蒙泰隆和格朗梅松之间的往来信函。”

“它就在国家档案馆，在学术团体档案里。我今天早上开馆就去了。”

“您星期六早上八点就去档案馆了？”

“我睡不着。索性去干点有用的事。您看看我挖到了什么。”

马尚拿出了一封写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二日的手写信的复印件。

“这是格朗梅松写给一位历史学家同僚、名叫莱昂·帕吕斯特的信。听听这一段：「博罗家族仍旧固执地拒绝我们查阅他们十六世纪的档案，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有一种不悦的感觉，觉得他们在隐瞒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是担心我们会发现他们前任行为中的某种不规之处吗？还是他们在保护某位权贵？蒙泰隆和我有着同样的怀疑，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使他们松口。公证人的职业秘密，是一座不可攻破的堡垒」。”

贝尔蒂耶抬起了眼来。

“太棒了。格朗梅松早在一八八九年就有所怀疑了。比那份抄件公开展示还早四年。这证实了在木桶被发现之

前，学界内部早已流传着怀疑的声音。这封信必须收入这篇文章之中。它证明了这场骗局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裂痕。这一上午都用来整理文件，构建论证。撰写，核对参考文献，提出改写方案。一直持续到傍晚，这套论证被有条不紊地建构起来。他又写出了八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构成了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

“干得漂亮。照这个节奏再干一个星期，这篇文章就完成了。那本书呢？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

“等这篇文章寄给期刊、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之后。我想先把学术上的这一步确立下来，再投身叙事这场冒险。”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下午，他们来到了国立艺术史研究院。杜朗夫人，一位约莫六十岁、戴着半月形眼镜的女士，在档案查阅室接待了他们。

“两位先生，我已经把我们所有关于阿纳托尔·德·蒙泰隆的资料都取出来了。够你们忙上一整天了。”

大查阅桌上，堆着十来只灰色的档案盒。

“我们特别在寻找与达·芬奇遗嘱有关的一切。笔记，草稿，个人的印象，他可能私下对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表达过的疑虑。”

“我把你们留在这里工作。若有任何需要，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里。你们可以给文件拍照，但当然不能用闪光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仔细翻阅着这些档案。蒙泰隆的往来信函数量庞大：与其他历史学家、博物馆馆长、收藏家、档案保管员之间往来的数百封信件。是马尚在近下午四点时，取得了那项重大的发现。

“皮埃尔！您看这个！”

他手里拿着一封写于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五日的手写信，几乎就在那份遗嘱抄件在大会上展示之后的几个星期。

“这是一封写给他的朋友保罗·芒兹的信，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兼历史学家。听着：「亲爱的保罗，关于斯克里布在最近那场大会上展示的那份达·芬奇遗嘱的抄件，我有一些严重的保留意见，未能在公开场合表达，以免制造一场不快的风波。这纸张确实似乎是十七世纪的，这一点我承认。可这墨水在我看来颇为可疑。太黑，太均匀，作为一份据称在木桶中存放了两个世纪的文件而言，保存得未免太好了。我所查阅过的十七世纪文件，其墨迹大多已经泛黄，略有褪色。而且，这份文件竟恰好在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原件缺失之际重新浮出水面，实在是太巧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太过完美，不能不引人生疑。我担心，我们所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份晚出的伪造品，也许是十九世纪初的产物，其目的是填补文献上的空白，以回应我们所提出的那些令人为难的问题。可若没有对墨水和纸张进行深入的化学分析，便无法确知。而又有谁敢要求进行这样一场分析呢？又有谁敢在公开场合，去质疑一份由一位受人敬重的教授、以如此隆重的仪式在一群学者面前展示的文件呢？那将招致骂名，被指控为破坏偶像者」。”

贝尔蒂耶小心地拿起这封信，反复读了三遍。

“蒙泰隆本人怀有深深的疑虑！而他不敢公开表达出来！安托万，您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了吗？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之一，正是那位公布这项发现的人，私下里却认为这是一份假件！”

贝尔蒂耶和马尚继续着他们的挖掘。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三封信，蒙泰隆在其中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始终以一

种绝对私密的方式，且总是以最好不要引发公开争议这一结论收尾。

他们在傍晚时分走出了研究院，带着大量的复印件。

“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就连当时最有资格的同代人，都怀有严重的疑虑，”贝尔蒂耶自豪地说道。

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即把这些新发现整合进了文章之中。他一直工作到深夜。近午夜时分，他停了下来。

“安托万，我想我们的文章已经完成了。十六页正文，二十二条脚注。这很扎实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陆续收到了三位审阅者的回复。他们的意见总体上是正面的，附带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基于这些反馈，贝尔蒂耶大幅充实了他关于异邦人财产没收权的部分，并对博罗家族沉默一事的解读作了更为细腻的处理。二零二五年一月初，这篇文章准备就绪了。贝尔蒂耶把它投给了「莱布尼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此同时，他也安排在「学术网」和「正义之村」上进行发布。

“现在得等待了。审稿委员会至少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那本小说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写。”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贝尔蒂耶全身心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写作中。二零二五年四月末，这部小说接近完成。大约两百五十页。五月初的一个晚上，马尚提议道：

“现在需要一个有力的书名了。”

经过了好几个提议之后，马尚忽然抬起了头。

“我有个主意。「遗嘱是假的」，您觉得怎么样？”

贝尔蒂耶让这个书名在脑海中回荡了一会儿。

“是的。完美。直接，挑衅，引人入胜。”

六月用于细致的校对。二零二五年八月末，那封盼望已久的邮件到了：这篇文章获准发表。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这部小说的手稿被提交至自出版平台。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遗嘱是假的》正式在线出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部小说开始传播开来。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译本相继问世。评论褒贬不一，但总体上是正面的。贝尔蒂耶以一种豁达的心态接受了这些评论。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他向马尚吐露道：“人不可能讨所有人的欢心。重要的是，信息传达到了。人们如今知道了，达·芬奇的这份遗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尾声

巴黎，卢浮宫，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皮埃尔·贝尔蒂耶独自站在《蒙娜丽莎》前，站在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国事厅里。几个星期前，卢浮宫刚刚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盗窃案。这场盗窃发生在德农馆一楼的阿波罗画廊。九件法兰西王室的珠宝与冠冕被盗走了。窃贼们弄掉了欧仁妮皇后的王冠，随后它被发现时已经受损。案发地点距离《蒙娜丽莎》仅仅几米之遥。

他这部小说出版已过去了一个月，那篇文章发表也已过去了四个月。这位夫人依旧在那里，隐在她那层防弹玻璃之后，从容不迫，神秘莫测。归根到底，是谁偷了她，谁继承了她，谁卖了她，谁买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存续了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几分钟后，马尚也来到了他身边。

“还好吗？您看上去若有所思。”

“我在想事情。想着这三年来所走过的这段路。想着那些发现，那些疑虑，那些逐渐构建起来的确信。”

“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揭示了真相，或者说，至少是我版本的真相。”

他们周围，成百上千的游客拥挤着，拍着自拍，惊叹不已。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这幅画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他们走出了国事厅，穿过一间间画廊。在走廊里，他们遇见了一群高中生。

“这就是《蒙娜丽莎》，”老师解说道，“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幅画。达·芬奇于一五零三年至一五零六年间在佛罗伦萨绘制了这幅画，随后把它带到了法国，他于一五一九年在法国去世。这幅画被遗赠给了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此后一直属于法国的收藏。”

他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这个官方的说法，依旧不动声色地被讲述着。要多久，它才会改变呢？

“您知道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吗？”马尚喃喃道。“也许再过几个世纪，您这本书，也会变成弗朗切斯科那份假遗嘱对我们而言的模样。众多版本中的一个。”

“您说得对。历史一直在被不断地重写。我写下了我的版本。日后还会有别人写下他们的版本。”

他们穿过了金字塔。巴黎在他们周围延展开来。

“皮埃尔，最后一个问题。经过了这一切研究……您依旧认为弗朗切斯科·梅尔齐盗窃这些作品是错误的吗？”

“弗朗切斯科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依照十六世纪的道德准则行事。我们却用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去评判他。谁是对的？两者都对。两者都不对。这取决于视角。”他走了几步，才继续说道。

“可以确定的是，若没有弗朗切斯科的胆识，我们也许就不会拥有这些非凡的科学手稿了。异邦人财产没收权公正吗？不公正。这场盗窃有正当理由吗？大概没有。可结果就摆在那里。杰作得以保存，被人研究，被数以百万计的人欣赏着。”

“这本该是您写进小说结语里的话。”

“不。我所写下的更好。我陈述了事实。可我把道德上的评判，留给了读者。是罪人还是英雄？是窃贼还是拯救者？每一位读者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才是历史小

说真正的力量所在。它提出问题，而不是硬塞给你答案。”

“那现在呢？您接下来的调查会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可我确信，在某个布满尘埃的档案里的某处，另一个真相正等待着被发现。另一场骗局正等待着被拆解。另一个故事正等待着被讲述。”

“而您会在那里，去讲述它。”

“我们会在那里的。您和我。因为历史正是这样运作的。每一代人接过火炬。每一位研究者，延续着前人已经开始的工作。”

他们沉默了片刻。

“我该走了，”马尚说道。“可谢谢您，皮埃尔。感谢一切。感谢您让我参与了这场冒险。感谢您向我证明了，即便在二十一世纪，人们依然能作出重大的历史发现。”

他们握了握手，随后分道扬镳。再过几个小时，博物馆就要闭馆了。游客们将会离去。守卫们将会巡视。而《蒙娜丽莎》将留在那里，在黑暗之中，不对任何人微笑，守护着她的秘密。弗朗切斯科·梅尔齐制造了一场延续了五个世纪的骗局。皮埃尔·贝尔蒂耶刚刚将它揭示了出来。可归根到底，这个秘密真的重要吗？这幅画的美，会因此而减损吗？它所激起的那份感动，会因此而变得不再真实吗？当然不会。其余的一切，不过是喧嚣与骚动。所有人类的历史，最终都会消融在时间之中。可作品长存。美长存。那抹神秘的微笑，穿越了数个世纪。窗外，巴黎正涌动着她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别的历史学家会审视我们这个时代。会发现别的秘密。会写下别的版本。而这，正是应然的样子。这意味着，对真相的追寻永无止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贡献要作出，而

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不会有终结的一天。贝尔蒂耶自顾自地笑了笑，随后加快了脚步。他与妻子有个晚餐的约会——在这三年痴迷的岁月里，他对她疏忽了太多。是时候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至少，暂时如此。直到下一个谜团再次向他召唤。
